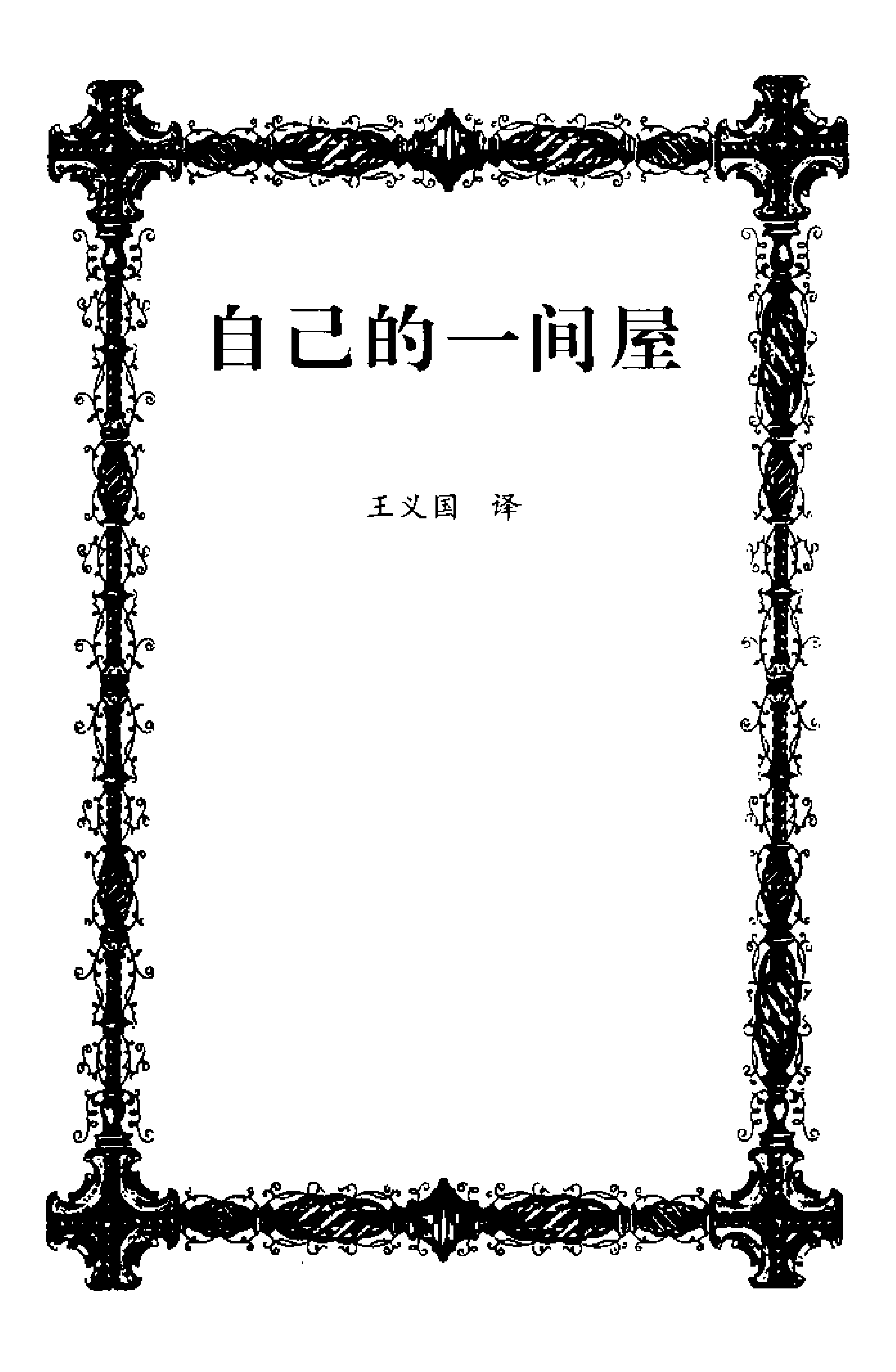


自己的一间屋

王义国 译

第一章[1]

但是，你们可能会问，我们是请你谈妇女与小说——而这又与自己的一间屋有什么关系？我会尽力说明的。当初你们要我谈妇女与小说时，我在一条河的岸边坐了下来，并且开始对这些话的意思感到疑惑。它们可能纯粹意味着对范妮·伯尼[2]所作的些许评论，对简·奥斯汀[3]所作的稍多的评论，对勃朗特姐妹[4]的称赞以及对积雪覆盖的霍沃思寓所所作的素描，如果有可能的话就米特福德小姐[5]说上几句俏皮话，恭敬地略微一提乔治·艾略特[6]，论及盖斯凯尔夫人[7]，这样一来就可大功告成。但是再一看来，这些话又并非那么简单。妇女与小说这个题目可能意味妇女以及她们像什么样子，这也可能是你们出这个题目的本意；也可能意味着

---

① 本文系以两篇论文为基础撰写而成，那两篇论文曾于1928年分别宣读于纽纳姆学院的艺术学会和格顿女子学院的"一个又一个该骂的事情"学会(theOdtaa)。这两篇论文太长，当时未能全部宣读，以后又经过更改和扩充。——作者原注

② 范妮·伯尼 (Fanny Burney, 1752 - 1840)，英国女作家，作品多写涉世少女的经历，《埃维莉娜》是其代表作。

③ 简·奥斯汀 (Jane Austen, 1775 - 1817)，英国女作家，代表作为《傲慢与偏见》。

④ 勃朗特姐妹：即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和安妮·勃朗特。霍沃思(Haworth)位于英格兰西约克郡，1820年，P·勃朗特牧师带妻子和六个孩子到此。其附近的一处牧师住宅自1928年起建为勃朗特学会博物馆。

⑤ 米特福德 (Mary Russell Mitford, 1787 - 1855)，英国女剧作家、诗人和散文作家。

⑥ 乔治·艾略特 (George Eliot, 1819 - 1880)，英国女作家，代表作有《亚当·比德》和《织工马南》。

⑦ 盖斯凯尔夫人 (Elizabeth Gaskell, 1810 ~ 1865)，英国小说家，代表作为《玛丽·巴登》。

妇女和她们所写的小说；也可能意味妇女以及描写她们的小说；也可能意味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上述三者错综复杂地混在了一起，因而你们想要我从这个观点来考虑它们。但是当我开始以这最后一种方式考虑这个话题时——这似乎是最为有趣的方式，我很快就看出，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我应该永远也不能得出一个结论。我理解，我应该永远也不能履行一位讲演者的所谓第一责任——在一个小时的谈话之后递给你们一个纯粹的真理的天然金块，包在你们笔记本的页张之间，永远地存放在壁炉台上。我所能够做的，只是在一个次要的问题上向你们提供一种见解——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的话，她就必须有钱和自己的一间屋，而且你们将会看到，这就使得妇女的真正性质和小说的真正性质这个重大的问题悬而未决。我已逃避并在这个问题上得出一个结论的责任——就我而言，妇女和小说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但是为了补偿起见，我打算尽我所能向你们表明，我是怎样形成了有关房间和金钱这一见解的。我打算在你们的面前，把导致我产生这个想法的思路尽可能充分而又自由地展开。也许，如果我把在这个说法背后的想法、偏见透露出来，你们就会发现，它们与妇女有某些关系，并且与小说也有某些关系。不管怎么说，当一个题目极具争议性——有关性别的任何问题都是如此——这时也就不能指望人们说出真相。人们只能够表明，他是怎样得以拥有他确实拥有的不管什么见解。人们只能给他的听众这样一个机会：当他们察觉到演讲者的局限、偏见、癖性时，他们可以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在这儿，虚构有可能比事实包含更多的真相。因而我打算利用一位小说家所拥有的一切特权和自由，把我来到这儿前两天的故事告诉你们——我被你们搁在肩膀上的题目压得抬不起头来，我思索着这个题目，让它在我的日常生活内外运转。我没有必要说，我就要描述的事情并不存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是一种杜撰，费恩汉姆也是一种杜撰，“我”只是代表着某个并不真实存在的人的一个方便术语。谎言将会从我的嘴唇里流淌出来，但是也许有某些真实与这些谎言混淆在一起，须由你们把这真实找出来，并且判定它的任一部分是否有保留价值；如果没有，你们当然就会把它整个儿扔进废纸篓里，并且把它完全忘却。

因而这就是我（叫我玛丽·贝顿，玛丽·塞顿，玛丽·卡迈克尔，或者你们愿意叫的任何名字——这无关紧要），于一两个星期以前，在10月晴朗的天气里，坐在一条河的岸边，想得出了神。我所说的那个衣领，也就是妇女与小说，以及对一个激起各种各样偏见和激情的题目得出某个结论的需要，压得我的头低到了地上。左边和右边长着某种灌木，是金黄色和绯红色的灌木，那灌木火一般的颜色，鲜艳夺目，甚至就像炉火燃烧一般。在更远处的河岸上，柳树的头发披在它们的肩膀上，它们在无休无止的悲叹中哭泣着。河水把它从天空、桥梁和燃烧般的树木中所挑选出来的不论什么东西都反照了出来，而当那位大学本科生划着船穿过那些倒影时，那些倒影又再次合拢了起来，完全合拢了起来，就好像那位本科生从未到过那儿一般。在那儿，一个人满可以一整天坐着，沉浸于思考之中。思考——这是给它的一个它配不上的高雅称呼——已经把它的钓线垂到水流里去了。钓线摆动着，一分钟又一分钟地摆动着，在倒影和杂草当中四处摆动着，让水把它举起来又沉下去，到最后——你知道就是那么轻轻的一拉——在一个人钓线底端的一个思想突然聚集了起来，然后是谨小慎微地把它拖进去，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摆开来。唉，摆在青草之上之时，我的这个思考显得多么微小，多么无足轻重，它就像那种鱼，高明的渔夫把它又放回水中，这样它就有可能长得肥一些，并且有朝一日值得烹烧和食用。现在我将不用那个思考来使你们费神，虽

然如果仔细看的话，你们可以在我说话的过程中自己把它找出来。

但不管它是多么微小，它却有着其独特的神秘性质——如果把它放回到脑海之中，它就立即变得使人非常激动，并且重要；而当它猛冲并下沉，而且四处闪光之时，它又形成了思想的一种极大的汹涌和波动，结果若想平静地坐着则是断无可能。我正是这样，发现自己正在极为迅速地走过一块草地。立即就有一个男人的身影出现了，来拦截我。一开始我也并不明白，一个看来离奇古怪的人，穿着一件常礼服和一件晚上穿的衬衫，他做的手势所针对的是我。他的脸上露出了恐惧和愤怒的表情。来帮了我忙的是本能而不是理智。他是位教区执事，我是个女人。这儿是草皮，那儿是小路。只有研究员和学者们才被允许到这儿来，砾石路是留给我的地方。这种念头是刹那之间产生出来的。当我在小路上重新站稳时，教区执事的胳膊也就落了下来，他的脸上呈现出其通常的安详，而且尽管草皮比砾石路走起来舒服，却也做不出非常大的伤害。针对不管什么大学的研究员和学者们，我所能提出的惟一指控就是，他们的草皮被连续不断地压了 300 年之久，而在保护他们的草皮时，他们又碰巧把我的小鱼吓得不知藏到哪儿去了。

使得我如此大胆擅自闯入草地的到底是什么念头，我现在记不起来了。安宁的精神就像一片云一样从天空降了下来，须知如果说安宁的精神居住在什么地方的话，那就是在一个晴朗的 10 月的上午，居住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庭院和四方场地里。漫步走过那些学院，走过那些古老的大厅之时，当时的不愉快也似乎得到了缓和；躯体似乎被包容在一个神奇的小玻璃房间里一般，声音不能穿透这个房间，而头脑由于与事实毫无接触（除非你又擅自进入草地），也就可以自由地沉浸于任何与这个时刻相和谐的冥想之中。就好像某种机缘一般，有关一篇描写在漫长的

假期中重访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旧文的零星回忆，又使人想起查尔斯·兰姆[1]——萨克雷[2]把兰姆的一封信放在他的前额时说道：圣徒查尔斯。确实，在所有死去的人当中（我把我当时的想法告诉你们），兰姆是最令人愉快的人之一，人们会想对他说：那么告诉我，你是怎么写出你的随笔来的？因为在我看来，他的随笔甚至胜过麦克斯·比尔博姆[3]的散文一筹——尽管比尔博姆的散文造诣很深——这是由于那种疯狂闪烁着的想象的缘故，它是天才在散文中央所产生的闪电般的劈啪声，它使他的散文出现了瑕疵，并不完美，但却装饰着亮晶晶的诗的意境。那么大约在100年以前，兰姆来到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当然他写了一篇随笔——题目我记不起来了——它讲的是，他在这儿看到了弥尔顿[4]一首诗的手稿。那大概是《利西达斯》，兰姆写道，当他想到是否可以更换《利西达斯》中的任何一字时不禁大为震惊。在他看来，想到弥尔顿会更换那首诗中的用字就是一种亵渎神圣的行为。这使我记起了《利西达斯》中我所能记起的字句，并且以下述猜测自娱：即哪一个字是弥尔顿更改过的，为什么要更改。我接着又想到，兰姆所看到的那份手稿就在只有几百码之外的地方，因而人们可以步兰姆的后尘，穿过四方院，来到保存着那个珍宝的那家著名的图书馆。除此之外，当我把这个计划付诸于实施时，我又想起，也正是在这家著名的图书馆里保存着萨克雷的《亨利·埃斯蒙德》的手稿。批评家们经常说，《亨利·埃斯蒙德》是萨克雷的最完美的小说。但是就我所能记得的而言，那种矫揉

---

① 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1775～1834），英国散文家，著有《伊利亚随笔集》等。

② 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英国小说家，《名利场》是其代表作。

③ 比尔博姆（Sir Max Beerbohm，1872～1956），英国漫画家和作家。

④ 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英国诗人，其代表作为《失乐园》。《利西达斯》写于1637年，为悼念好友夭折而作，堪称英语短诗中最杰出的作品。

做作的风格，以及它对18世纪的模仿，却是束缚人的，除非18世纪的风格对萨克雷来说确实是自然的——这个事实人们看看手稿便可予以证实，并且看一下，这些更动是否有利于风格或者是见识。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又须决定什么是风格以及什么是意义，这个问题——不过这时我实际上已来到了那扇直接通向那家图书馆的门的面前。我一定是把它打开了，因为一个表示不赞成的、头发银白的和蔼绅士立即就走了出来，他就像一个挡路的守卫天使一般，不过身上飘扬的是黑色的长袍觇产上白色的羽翼。这位绅士一边挥手让我回去，一边低声表示遗憾，说只有在有学院的学术委员会委员陪同或者带有介绍信时，女士方可获准进入本图书馆。

一个著名图书馆被一个女人诅咒，这对这个著名图书馆来说完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它德高望重，心绪平静，其全部珍宝都安全地锁在它的胸膛之内，它沾沾自喜地睡着，而且就我而言，它将永远这样睡下去。当我气冲冲地走下台阶时，我发誓，我将永远也不会激起那些回声，我将永远也不会再次要求获得那种周到款待了。离午餐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又可以做些什么呢？在草坪上漫步么？坐在河边么？当然这是一个可爱秋日的上午，树叶翩然闪着红色落到了地上，因而不论是在草坪上漫步还是坐在河边，都不是件什么苦事。但是音乐又传到了我的耳边，某种宗教仪式或者庆祝活动正在进行。当我从小教堂的门前走过时，风琴如泣如诉地发出了庄严的乐声。在那种静谧的空气之中，甚至基督教精神的忧伤听上去也更像是对忧伤的回忆，而不是忧伤自身；甚至那架古老风琴的呻吟声也被平静所环抱了。倘若我有那种权利我也无意进入，而这一次教堂司事大概又会阻止我，也许要我受洗礼的证明，或者教长的介绍信。好在这些壮丽建筑物的外部通常就像其内部一样美丽。除此之外，注视着教堂的这些会众也够有趣的了，他们聚集了起来，走进去又再次走

出来，在小教堂的门口忙碌着，就像蜜蜂在蜂巢的入口处一样。许多人穿戴着大学方顶帽和长袍，有些人肩披着肄业生的毛皮制的金色缨子，其余的人有坐在巴思轮椅里被人推着的，还有的人尽管并未年过中年，却似乎已被劳累压成了非常奇特的模样，令人油然想起那些在穿过水族馆里的沙子时费劲地喘着粗气的大螃蟹和淡水螯虾。当我依着墙的时候，那大学实在就像一个避难所，庇护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人，若是听凭那些人在斯特兰德大街[1] 的人行道上为生存而战斗的话，他们很快就会被淘汰。有关以前的系主任和以前的学监的以前的故事又回到了我的脑海之中，但是我还没有鼓足勇气吹口哨——据说当时一听见口哨声，以前的教授便立即拔腿就跑——这时那些令人崇敬的会众已经走了进去。小教堂的外表还是照旧。你们知道，小教堂的穹顶和小尖塔晚上点着灯，几英里之外在山那面都看得见，就像一条总是在航行而又老达不到目的地的帆船一般。想当年，据推测，这个四方院，连同其平整的草坪、其厚实的建筑以及小教堂自身，也是沼泽湿地，当时青草飘动起伏、猪用鼻子拱土觅食。我想，一队队的牛马一定是从远方的郡里用四轮运货车把石头拉来，然后无穷无尽的人工又把那些灰色的大石头平稳地举上去，一块又一块地垒了起来，我现在就是站在那些灰色石块的阴影里。然后油漆工把玻璃装在窗子上，而砖瓦匠则是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在那个房顶上用嵌装玻璃用的油灰和水泥、铲子和镘刀忙碌着。每星期六一定有人从一个皮制的钱口袋里把金币和银币倒出来，倒到那些老工匠的手里去，因为他们大概要在晚上喝啤酒，玩撞柱游戏。我以为，一定有川流不息的金币和银币随时流进这个院子里，以便使石头无休止地运进来，使泥瓦匠们无休止地工作着，

① 斯特兰德大街（the Strand），在伦敦的中西部，与泰晤士河平行，以旅馆和戏院著称。

去整平、开沟、挖掘和排水。不过当时是信仰的时代，于是金钱被慷慨地大量提供出来，以便把这些石头放置在一个深深的地基上；而当房子建好之时，更多的金钱又从国王、王后和地位显赫的贵族的金库里提供了出来，以确保一定有人在这儿唱圣歌，有学子在这儿受教育。有人赏赐土地，也有人缴纳什一税。而当信仰的时代结束时，理性的时代[1]又到来了，于是金币和银币同样的流动仍然在继续着：奖学基金设置了起来，课程的基金被捐赠了；只不过此刻金币和银币的流动，并不是源自国王的金库，而是源自商人和工厂主的钱箱，源自那些人的钱包，比如说，他们靠工业发了财，于是在他们的遗嘱中把其财产的一个慷慨的部分回送了过来，在他们学到其手艺的大学里捐赠更多的教席、更多的课程基金、更多的奖学基金。因而就有了图书馆和实验室，就有了天文台，就有了现在立在玻璃架子上的由价格昂贵而又精致的器械构成的光彩夺目的设备，而几个世纪以前，这儿是青草起伏、猪用鼻子拱土觅食。当然，当我在庭院四处漫步时，由金币和银币构成的基础似乎是足够深的，人行道在野草之上铺得是足够结实的了。头顶浅盘的男人们忙碌地从一个楼梯间走向另外一个楼梯间。艳丽的鲜花在窗口花坛上盛开。留声机里的乐曲从里面的房间里嘟嘟地传了出来。若想不进行深思是不可能的——不管那可能是什么深思，它反正是被打断了。钟敲响了，该设法去吃午餐了。

一个奇特的事实就是，小说家们习惯于让我们相信，午餐会总是因为所说出的某些妙趣横生的话，或者是所做出的某个非常明智的事情，而值得纪念。但是他们却难得为所吃的食物赞一词。小说家惯例的一个组成部分，便是不提及汤和鲑鱼以及小鸭

---

① 理性时代（the age of reason），以理性和常识占优势为特征的时代，尤指英国和法国的18世纪时。

子，就好像汤和鲑鱼以及小鸭子根本就并不重要一般，就好像未曾有人吸过一支雪茄喝过一杯葡萄酒一般。然而，这儿我将冒昧公然违抗那个惯例，告诉你们，这一次的午餐先上的是鳎鱼，它陷进一个深盘子里，学院的厨师在它上面浇了一层床罩似的煞白的奶油，只是它的四处留有棕色圆点的印记，就像雌鹿肋腹上的斑点一般。在那以后上的是山鹑，但如果你们以为那是摆在一个盘子上的两只无毛的棕色的鸟的话，你们就错了。那些山鹑数量众多而且各种各样，它们带着其调味汁和凉拌菜的全部随员而来，不论是辛辣的还是甜的，全都井然有序。伴随它的土豆片，薄如硬币但又不像硬币那么硬；伴随它的包子甘蓝，就像玫瑰花芽一样呈现着叶状但又更鲜美多汁。烤山鹑及其随员一被吃完，那位一声不响的男佣人，也许就是表现得较为温和的教区执事本人，便在我们面前放置了甜食，甜食用餐巾环绕着，就像一堆白糖从波浪中涌了出来。倘若把这甜食称之为布丁并因而把它与米以及木薯淀粉联系起来，那简直是对它的一种侮辱。与此同时，玻璃杯里黄色的酒和红色的酒泛滥成灾，喝干了，又被斟满。这样一来，在脊椎——那是灵魂的所在——的中央，所逐渐点亮的，并不是我们称之为才智的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琐碎而又高度刺激的光彩——那种才智在我们的唇边啪啪地进进出出，而是那种更为深刻、更为敏锐和更为隐蔽的光辉，那是理性交流色彩浓艳的黄色火焰。没有必要匆忙。没有必要目光露出喜悦。没有必要成为你本人之外的任何人。我们都要进天堂而且有凡·戴克[1] 为友——换句话说，当人点着一支好烟、坐进窗座处的坐垫当中时，生活似乎是多么美好，生活的回报似乎是多么甜蜜，这个怨恨或者那个不满似乎是多么微不足道，友谊和与同类人的

---

① 凡·戴克（Sir Anthony Vandyck，1599－1641），佛兰德斯画家，1632－1641年任英王查理一世的宫廷画师，尤以贵族肖像画著称。

交往又是多么值得赞美。

倘若凑巧手边有一个烟灰缸，倘若并未因为没有烟灰缸而把烟灰敲落在窗外，倘若事情与实际情况略有不同，那么大概就不会看见一只没有尾巴的猫。那只突兀出现的被截去尾巴的动物悄悄地走过那个四方院，这个景像侥幸凭着某种潜意识的灵性，而对我改变了其情感之光。就好像有人放下来一个遮蔽光之物一般。也许那美酒已让我不胜酒力了。当然，当我注视着这只马恩岛猫[①] 在草坪的中央停了下来、好像它也在探究宇宙时，有某种东西似乎欠缺了，有某种东西似乎是不同了。但当我听着别人谈话的时候，我自问：所欠缺的是什么，所不同的又是什么？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得不使自己想到房间以外的事情，返回到过去，确实是到了战前，并在我的眼前放置了在离这些房间不是非常远的房间里所举行的另外一个午餐会的模型；但又是不同的。一切均是不同。与此同时谈话在客人当中进行着，客人人数众多而且年轻，有些是这个性别的，有些是那个性别的；谈话顺利地进行着，谈话惬意地、自由地、有趣地进行着。而当谈话进行之时，我把这次交谈与那另外一次交谈的背景进行了比较，而当我把这两次交谈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时，我就毫不怀疑，此即为彼的后代，是其合法的继承人。什么也没有改变；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同的，只不过——这时我竖起耳朵听着，但却并非完全是在倾听那些正在说出来的话，而是在倾听话语背后的细声细气或者说是气流。是的，就是这儿——变化就在这儿。在战前，在像这样的午餐会上人们会说出完全相同的事情来，但是听上去却会不同，因为在那些日子里所说出的那些事情被一种嗡嗡声所陪伴着，那种嗡嗡声并不清晰，但却和谐悦耳、使人激动，它改变了

---

① 马恩岛（Manx），亦译曼岛，位于爱尔兰海中。马恩岛猫是一种短毛家猫，虽然内部有几节残留的尾椎骨，但外部没有尾巴，因此成为特别的品种。

话语本身的价值。人们能够为那种嗡嗡声配上词么？也许在诗人的帮助下就能够。一本书摆在我的旁边，我把它打开，完全是不经意地翻到了丁尼生[1]。这儿我发现丁尼生在唱道：

一滴晶莹的泪珠落了下来
　落自门口的那株西番莲花[2]。
她来了，那是我的宝贝儿、我亲爱的；
　她来了，那是我的生命、我的命运；
红玫瑰喊叫道，"她走近了，她走近了"；
　白玫瑰哭泣道，"她来晚了"；
飞燕草倾听着，"我听着，我听着"；
　百合花低语道，"我等着。"

难道这就是战前男人们在午餐会上所嗡嗡吟哦出来的歌曲吗？那么女人们呢？

我的心像一只歌唱着的鸟
　它的巢在一根被弄湿的嫩枝上；
我的心像一棵苹果树
　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它的树枝；
我的心像一枚彩虹般的贝壳
　它在平静的大海里戏水；
我的心比所有这一切都要高兴
　因为我的爱人已来到我的身边。

---

① 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英国桂冠诗人（1850年受封）。
② 西番莲花（passion-flower），其花被认为与耶稣所戴的荆棘冠相似。

难道这就是战前女人们在午餐会上所吟哦出来的歌曲吗?

想到在战前的午餐会上人们甚至是压着嗓子哼着这样的歌曲，也就有非常滑稽之处，因而我突然大笑了起来，并且不得不指着那只马恩岛猫来为我的大笑作出解释——那个可怜的动物，没有尾巴，站在草坪的中央，确实显得有点儿滑稽。它确实是生来如此吗，抑或是在事故中失去了尾巴？这种无尾猫，尽管有些人说是生存在马恩岛上，然而却比人们所认为的更为罕见。它是一种奇怪的动物，与其说是美丽不如说是别致。一只尾巴竟会产生出这么大的区别，这是奇怪的——你们知道，这一类的话不过是大家吃完午饭各自寻找大衣和帽子时说的话。

这一次午餐会，由于主人的盛情款待，一直持续到很晚的时候。那个美丽的10月白昼正在褪色，当我在林阴道当中走过时，树上的叶子正在落下。一扇又一扇的门似乎在我的身后轻轻地而又断然地关上了。数不清的教区执事把数不清的钥匙塞进运转顺利的锁里，这座宝库在另一个夜晚又得以安然无恙。走过林阴道以后，便来到一条马路上——马路的名字我忘记了——如果你往右拐的话，它便会把你带到费恩汉姆去。不过时间还多得很，到七点半的时候才吃正餐。而且在吃了这么一顿午餐之后也几乎可以不吃正餐。奇怪的是，一鳞半爪的诗歌竟在头脑里起了作用，使得双腿随着它的节奏在马路上移动，当我朝赫丁利迅速迈步走去的时候，这些话——

一滴晶莹的泪珠落了下来
　落自门口的那株西番莲花，
她来了，那是我的宝贝儿、我亲爱的——

在我的血液中歌唱着。然后，在河水被拦河坝搅动的地方，我又转向另外一个音步，唱道：

我的心像一只歌唱着的鸟
　它的巢在一根被弄湿的嫩枝上；
我的心像一棵苹果树……

人在黄昏时分常会大喊起来，我就是那样大声喊叫道：多么伟大的诗人啊，他们是多么伟大的诗人啊！

我以为，我是怀着一种为我们自己时代而感到的嫉妒心情，继而想知道，人们是否能够诚实地说出两位现在还在世的诗人的名字，他们就像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①] 当时那样伟大，尽管这些是比较愚蠢和荒谬的。当我朝着那些起着泡沫的河水望去时，我想，把他们进行比较显然是不可能的。那种诗歌之所以激动得人这样狂放、这样痴迷，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赞颂了人们所曾有过（也许是在战前的午餐会上曾有过）的某种感情，因而人们不费力地、亲近地作出了反应，而不用费心去检查那种感情，或者把它与人们现在所拥有的任何一种感情进行比较。但是现在在世的诗人所表达的，实际上是一种此刻正在被制造出来又从我们身上夺去的感情。人们一开始并没有把它认出来，往往由于某种原因人们还惧怕它，人们急切地注视着它，同时又妒忌和怀疑地把它与人们所曾经知道的旧感情进行比较。现代诗歌的困难也就由此而产生，而正是由于这个困难，任何优秀现代诗人的诗歌人们都不能记住连续两行以上。由于这个原因——也就是我的记忆力弃我而去——这场争论由于缺乏材料而变得索然无味了。但是当我接着朝赫丁利走去时，我继续问道，我们为什么不

①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Christina Rossetti，1830—1894），英国“先拉斐尔派”女诗人，其抒情诗富于宗教感。

在午餐会上压着嗓子吟哦了呢？为什么阿尔弗雷德[1] 不再歌唱道

她来了，那是我的宝贝儿、我亲爱的。

为什么克里斯蒂娜不再作出反应

我的心比所有这一切都要高兴
　因为我的爱人已来到我的身边？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归咎于那场战争？当1914年8月枪炮开起火来时，是不是男人和女人的脸在彼此的目光中非常清晰地表明，浪漫精神已被杀死了吗？自然，在炮火的光亮中看见我们的统治者们的脸是令人震惊的（这对女人来说尤其是如此，这是因为她们对教育存有幻觉等等）。他们显得是这样丑陋——德国的、英国的、法国的统治者们——这样愚蠢。但是不管人们会归咎于什么地方，归咎于谁，那种激发得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如此感情强烈地歌唱着他们的爱人到来的幻觉，在现在比当时是要罕见得多了。人们现在只需去阅读，去观看，去倾听，去记忆。可是为什么要说“归咎”呢？如果那是种幻觉的话，那么又为什么不去赞扬那个毁灭幻觉并将真实置于其恰当位置的灾难、不管那是什么灾难呢？须知真实——这些点标志着，当我在寻找真实的时候，我忘记该拐弯到费恩汉姆去了。是的，确实，何谓真实、何谓幻觉？我问我自己。比如说，现在这些房子在薄暮之中昏暗朦胧，并由于它们的红色窗子而显出节日气氛，但是到了上午九点钟的时候，它们又由于其甜点心和鞋带子而显得粗俗炽

① 阿尔弗雷德是丁尼生的教名。

热肮脏，这些房子的真实又是什么呢？还有那些柳树、那条河流以及那些一直延伸到河边的花园，它们现在由于悄悄笼罩在它们上面的薄雾而模糊不清，但在阳光中却金光灿烂——有关它们何谓真实、何谓幻觉？我不用你们为我的反复思考而伤脑筋了，因为在前往赫丁利的路上并没有找到结论，而且我还要你们设想，我很快就发现我忘记拐弯了，于是又往回走，再拐弯朝费恩汉姆走去。

我已经说过，那是10月的一天，因而我就不敢改变季节并且描述垂悬在花园墙上的丁香花、描述番红花、郁金香花和别的春季的花，从而丧失你们的尊重并且危及小说这个美丽的名字。小说必须贴近事实，而且事实越真实小说就写得越精彩——我们是这样被告知的。因而那仍然是秋天，树叶仍然是黄色的，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落得比以前稍微快了一点儿，因为现在是晚上（精确地说是7点23分）而且一阵微风（精确地说是西南风）已经刮了起来。但是尽管如此，仍然有某种奇特的事情在起作用：

> 我的心像一只歌唱的鸟
> 　它的巢在一根被弄湿的嫩枝上；
> 我的心像一棵苹果树
> 　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它的树枝——

也许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话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这种荒唐的幻觉——它当然只是一种幻觉而已——即丁香花正在花园的墙的上方摇曳抖动，黄粉蝶正在四处疾飞，空气中花粉弥漫。一阵风刮了起来，我不知道是从哪个地方刮来的，但它却把嫩树叶子吹了起来，因而空中闪起了一片银灰色。那是黄昏时分，种种颜色得到了强化，紫红色和金黄色在窗玻璃上燃烧着，就好像一个易激动的心脏的跳动一般；这时由于某种原因世界的美被揭示了出

来，然而又很快就要消亡（现在我推门走进了花园，因为门是轻率地敞开着而且附近又似乎并没有教区执事），那个很快就要消亡的世界的美有两个刀口，一个是笑声的刀口，一个是悲痛的刀口，它们把心脏切成两半。费恩汉姆的花园在春天的薄暮之中展现在我的面前，荒芜而又空旷，很高的青草稀疏地散布着又不经意地抛动着，在青草当中有黄水仙花和野风信子，也许即使在花开最盛的时候它们也并非井然有序，现在则是被风吹得摇曳多姿，那是它们在与它们的根进行较量。大楼的窗子在惊涛骇浪般的红砖当中呈弧形，就像船上的窗户一样，它们在迅速飞翔的春天的云朵下面从柠檬色变成了银白色。有个人躺在帆布吊床里，还有个人飞快地跑过草地，但是在这个光线之中他们只不过是幻景，一半是被猜测出来的，一半是看见的——难道就没有人让她停下么？——然后在露台上出现了一个弯曲的身影，好像是突然冲出房间来呼吸空气，来看一眼这个花园，她令人望而生畏却又谦恭，前额巨大又衣衫破旧——难道这有可能是那位著名的学者、有可能是H.J.本人吗？一切皆是昏暗，然而又是强烈，就好像薄暮抛掷在花园上的那条围巾被星星或者刀剑给扯成数块——某种可怕的现实的闪光正以其自身的方式从春天的心脏里跳了出来。因为青春……

这儿是我的汤。正餐正在巨大的餐厅里被摆了上来。现在远非春天，事实上是10月的一个夜晚。大家都聚集在巨大的餐厅里。正餐已经准备好了。这儿是汤。那是清淡的肉汁汤。在那当中没有可以搅动起幻觉之处。人们完全可以透过这透明的汤看到有可能就印在这盘子上的任何图案。不过并无图案。盘子是无装饰的。接下来上的是牛肉以及伴随着它的绿叶菜和土豆——这是一种家常的三位一体，令人联想到在泥泞的市场上牛群的臀部、以及叶子边上拳曲并且变黄了的嫩芽，还有讨价还价和降价出售，以及在星期一上午拎着网线袋的女人。鉴于供应充足，而且

煤矿工人无疑吃的东西要少一些，因而没有理由对我们的日常食物不满。接下来上的是李子干和蛋奶糕。而如果有人抱怨说，虽然有蛋奶糕来缓和一下，李子干也仍然是一种不慈悲的蔬菜（李子干不是水果），这种蔬菜就像守财奴的心一样多筋，它所渗出的液体就像守财奴的静脉里流动着的液体一样，那些守财奴舍不得喝酒、舍不得穿暖达80年，然而又舍不得施舍给穷人，如果有人这样抱怨的话，那么他就应该经过深思后认识到，有些人的慈悲甚至也就等于李子干。接下来上的是饼干和奶酪，此时水罐子被随便地递来递去，因为饼干的本性就是干燥，而这些是地地道道的饼干。这就是一切。这顿饭结束了。每一个人都嘎嘎地把椅子推到后面，双开式弹簧门猛烈地前后摇荡着，不久大厅里一点食物的影子都没有了，而且毫无疑问又为第二天早晨的早餐作好了准备。英格兰的青年们沿着走廊走去，登上楼梯，闹闹嚷嚷，唱着歌曲。一位客人，一位陌生人，是否可以说（因为我在费恩汉姆这儿所拥有的权利，并没有多于我在三一学院、或者萨默维尔、或者格顿、或者纽纳姆、或者克赖斯彻奇所拥有的权利）“饭不好”，或者说（现在我们，也就是玛丽·塞顿和我，正在她的会客室里）“难道我们本来不是可以在这儿单独吃吗?”因为如果我说出任何那种话的话，我就是在窥视和探究一个家庭的经济情况，而在陌生人的面前，这个家庭又带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欢乐和勇敢的外表。不，这种话什么也不能说。确实，交谈片刻之间变得索然无味了。既然人的心情是那个样子，心脏、躯体和头脑全都混合在一起，而不是装在各自分隔的空间里，须知100万年以后它们毫无疑问将被装在各自分隔的空间里，这样一来，饭吃得好不好也就极大地影响到话谈得好不好。人若是吃不好，也就不能够思考得好、爱得好、睡得好。脊椎里的那盏灯用牛肉和李子干是点不着的。我们大概全都要上天国去，而且我们希望，凡·戴克将在下一个路口迎接我们——那个路口，也就是在

一天的工作结束时牛肉和李子干在它们之间所酿成的那种引起怀疑且又合格的心境。所幸我的那位教科学的朋友有一个碗橱，里面有一个大肚瓶子和几只小玻璃杯——（不过那首先就应该有鳎鱼和山鹑）——因而我们也就得以靠在炉火的旁边，并且对一天的生活所带来的某些伤害作出补救。大约一分钟以后，我们便随便地把那些奇特而又有趣的事情谈来谈去，那些事情是在一个特定的人不在场时在头脑中产生的，并且自然在再次相聚时会被讨论——一个人结婚了，而另外一个人却没有结婚；一个人想着这件事情，另外一个人则想那件事情；一个人从所有的知识当中得到了改善；另外一个人则是令人吃惊地变坏——同时还发了许多空论，对人性以及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令人吃惊的世界的特征议论一通，而这些议论又是那些谈话的自然结果。然而，在说着这些事情之时，我又满心羞愧地意识到，有一股潮流主动地上涨了，并且把每一件东西都带到其自身的目的地。人们可能会是在谈论西班牙或者葡萄牙，谈论图书或者赛马，但是不论说的是什么，它的真正兴趣却全然并非在于此，而是大约五个世纪以前在一个高屋顶上的砖瓦匠们的一个场景。国王们和贵族们用大麻袋把珍宝带来，并把珍宝倾倒进地底下。这个场景总是栩栩如生地进入我的头脑，并和另外一个场景并排摆着，那是皮包骨头的母牛、一个泥泞的市场、枯萎的绿叶菜以及老年人多筋的心脏——这两幅图画尽管互不连贯互不相联而且荒谬可笑，却总是一起前来互相斗争，并且使得我完全听凭它们的摆布。除非这整个交谈要被曲解，否则最好的做法就是把我头脑中的想法暴露在空中，这时如果凑巧的话那想法就会枯萎碎裂，就好像当人们在温莎打开那个棺材时那位死去的国王的头一样。于是我扼要地告诉塞顿小姐，在所有那些年月里，砖瓦匠们一直呆在小教堂的房顶上，国王们、王后们以及贵族们肩扛着成麻袋的金币和银币，他们又把金币和银币铲进土地里，然后，我猜想，我们自己时代的

金融巨子又来了，并把支票和债券放在另外一些人曾经放下过金锭和粗制金块的地方。我说道，那些东西全都埋在那儿的那些学院的下面；但这所学院，也就是我们现在坐着的地方，在其华丽的红砖和花园的荒芜凌乱的草下又埋着什么东西呢？在我们吃饭用的普通瓷器以及（这儿我还没有来得及阻止，话便冲口而出）那牛肉、蛋奶糕和李子干的后面，又有着一种什么样的力呢？

唔，玛丽·塞顿说道，大概是在1860年那一年——噢，可是你们知道那个故事，她说道，我猜测她是因为述说而感到厌倦。然后她告诉我——房间被租用了。委员会开会了。信封写上了姓名地址。通知起草了；会议举行了；信件宣读了；某某人作出了这么大的许诺，相反，某某先生则是一个便士也不给。《星期六评论》一直是非常无礼。我们怎样才能筹集一笔款子来租办公室呢？要不要搞一次义卖？难道我们不能找一位漂亮的姑娘，让她坐在最前排吗？让我们查检一下在这个问题上约翰·斯图尔特·穆勒[①] 所说的话吧。难道没有人能说服某报的主编刊登一封信？我们能不能请某某夫人在那封信上签个名？某某夫人眼下不在城里。大概，60年前就是这样做的，那是个非同寻常的努力，而且在那上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而且只是在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斗争和最大的困难之后，她们才把三万英镑募集了起来。[②]因而显然我们不能饮葡萄酒、吃山鹑，用不起头上顶着汤盘子的仆人，她说道，我们不能拥有沙发和单独的房间。“舒适的设施”她引

① 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著有《逻辑体系》、《政治经济学原理》、《论自由》、《功利主义》等。

② “我们被告知，我们起码得要三万英镑。……考虑到在大不列颠、爱尔兰和各殖民地中只有一所这样的学院，并且考虑到为男子学校募集到巨款又是多么轻而易举，因而这并不是一笔大数目；但是考虑到真正希望妇女受到教育的人其数量是何等之少，这个数目又不算少了。”——斯蒂芬夫人，《埃米莉·戴维斯与格顿学院》。——原注

用了一本什么书上的话说道，“只好以后再说了。”[①]

那些妇女年复一年地工作着，却又发现难以把2000英镑积累起来，她们用尽了气力才得到了三万英镑，想到此，我们突然嘲笑起我们女人的那种应受指摘的贫困。那么，我们的母亲们一直是在做着什么，以至于使得她们没有财富可留给我们？是在往她们的鼻子上擦粉吗？是在朝商店里看吗？是在蒙特卡洛的阳光下招摇过市吗？壁炉架上有几张照片。玛丽的母亲——如果那是她的照片的话——有可能在她有空的时候是个荡妇（她和教堂里的一位牧师生了13个孩子），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她放荡淫糜的生活在她的脸上留下的痕迹也就太少了。她是个相貌平平的人，是一位披着彩格呢披巾的老妇人，那披巾用一个刻花的大别针给别住了；她坐在一把柳条椅上，鼓励一只长毛垂耳狗看着照相机，带着一种觉得有趣而又紧张的表情，因为她知道，照相机的快门一按那只狗就一定要动。倘若她当初是做生意的，倘若她当上了人造丝的制造商或者证券交易所的一位富豪，倘若她给费恩汉姆留下了二三十万英镑的话，那么我们今晚就会舒服地坐着，而且我们交谈的话题就会是考古学、植物学、人类学、物理学、原子的性质、数学、天文学、相对论、地理学。倘若塞顿太太和她的母亲以及她母亲的母亲就像在她们之前的父亲们和祖父们一样，也学会了挣钱的伟大艺术，并设置了与她们自己的性别用处相称的研究员职位和讲师职位、奖金和奖学金的话，那么我们就可能非常说得过去地单独在这儿吃掉一只禽鸟和喝上一瓶葡萄酒，我们就可能以并无不适当的自信，期待着在一种慷慨捐赠的职业庇护之中度过愉快而又体面的一生。我们可能会是在探索

---

① 能够积攒起来的每一个便士都被留出来以便用在建筑上，因而舒适的生活设施只好以后再说了。——R. 斯特雷奇，《事业》。——原注

或者写作，在地球上受人尊敬的地方闲逛，坐在帕台农神殿[1]的台阶上冥想，或者在十点钟去办公室办公，并于四点半舒舒泰泰地回家来写上点小诗。只是，如果塞顿太太和与她同样的人在15岁的时候就做生意的话，那就不会有玛丽了——这就是我这篇议论中的说不通之处。我问道，玛丽对此有何想法？在窗帘之间是10月的夜晚，静谧而又可爱，正在变黄的树上挂了一两颗星。她是不是情愿牺牲她分内应享受的那一份秋夜，牺牲她对在苏格兰的游戏和争吵的回忆（因为他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尽管是个大家庭），她从未厌倦于对它的赞扬，这是由于其空气合适而且糕饼质量好，而她之所以须作出这种牺牲，又是为了凭着钢笔的一划费恩汉姆就可能被捐赠以大约五万英镑吗？须知，要为一所学院捐款必然会带来对家庭的完全压制。发一笔财同时还要生13个孩子——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得住。考虑一下这些事实吧，我们说道。首先在婴儿出生以前有九个月的时间。然后婴儿诞生。然后要花上三四个月的时间为婴儿哺乳。在给婴儿哺乳之后自然要花上五年的时间和孩子一块儿玩耍。似乎你们不能够让孩子们在街上乱跑。有人在俄国看见孩子们毫无管束地乱跑便说，那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景象。人们还说，人性是在一岁到五岁之间成形的。我说道，倘若塞顿太太一直是在挣钱的话，那么你会对游戏和争吵有何种回忆？你会对苏格兰有什么了解，对苏格兰的清新的空气、糕饼以及所有其他的一切有什么了解？但是问这些问题是毫无用处的，因为你就会根本也从未存在过。除此之外，若是问下面的问题也是毫无用处的，那问题就是，倘若塞顿太太和她的母亲以及她母亲的母亲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并将其置于学院和图书馆的基础之下的话，那就会发生什么事情，这

[1] 帕台农神殿（Parthenon），雅典卫城上供奉希腊雅典娜女神的主神庙，建于公元前5世纪，被公认为是多利斯柱型发展的顶峰。

是因为，首先，挣钱对她们来说是不可能的，而且其次，倘若那是可能的话，法律也拒不给她们拥有她们所挣的不管什么钱的权利。只是在最近的48年以来，塞顿太太才拥有了她本人的一个便士，而在那以前的所有的世纪里，那个便士就会是她丈夫的财产——也许这种见解也促成了使塞顿太太和她的母亲和母亲的母亲被拒之于证券交易所的大门之外。她们有可能说，我所挣到的每一个便士将被从我的手中取走，并将按照我丈夫的智慧来处理掉——也许是为了在巴利奥尔[①]学院或者国王学院里设置一项奖学金或者捐赠一项研究员职位，这样一来，即使我能挣钱，那么挣钱也并不是一件非常令我感兴趣的事情。我最好还是把挣钱这件事留给我丈夫去做吧。

无论如何，不管应不应该责备照片上那位正看着那只长毛垂耳狗的老妇人，毫无疑问之处在于，由于某种原因，我们的母亲们是非常严重地对她们的事物处理不当。没有一个便士能够被用在"舒适的生活"上，被用在山鹑和葡萄酒、教区执事和草皮、图书和雪茄、图书馆和闲暇上。她们所能做的，充其量就是用没有装饰的泥土修起没有装饰的墙。

我们就是这样站在窗子旁交谈着，同时低下头来，望着我们下面这座著名城市的圆屋顶和塔楼，有成千上万的人每天晚上都在这样看。在秋天的月光下，这座城市非常美丽，非常神秘。旧时的石头显得非常洁白和神圣庄严。人想到所有那些聚集在下边的书，想到挂在有护墙板的房间里的年老的高级教士和知名人士的画像，想到会在人行道上射出奇怪的球形体和新月形的彩色窗子，想到铭刻着文字的牌匾和纪念碑以及碑文，想到喷水池和青

① 巴利奥尔（John de Balliol，？—？1269），诺曼人出身的苏格兰权贵，当时不列颠最富的地主之一，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的创始人，1251～1255年为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的监护人。

草，想到面对着四方院的各个静谧的房间。而且（请原谅我的想法），我也想到那值得赞美的一缕缕烟和饮料和深深的扶手椅以及令人愉快的地毯；想到作为奢侈、清净和空间的产物的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和高贵。当然我们的母亲们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出可与所有这一切相媲美的任何东西——我们的母亲们发现要把三万英镑积攒起来是困难的，我们的母亲们为圣安德鲁斯的牧师们生了 13 个孩子。

因而我返回我的客栈，当我走过黑暗的街道时我想着这个，想着那个，在一天的工作结束后人都会这样想的。我思索着，为什么塞顿太太没有钱留给我们，贫穷对头脑有什么影响，财富对头脑有什么影响，而且我想到了那天上午我所看见的那些肩上披着肄业生毛皮制的金色缨子的古怪的老绅士们，而且我记起了，如果有人吹口哨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就会跑，而且我想到了小教堂的风琴发出低沉而有回响的声音，想到了图书馆关闭的房门，而且我想到，被拒之于门外是多么地令人不愉快，而且我想到，被锁进在里面也许更为糟糕，而且，当想到一个性别的安全和富足以及另一个性别的贫穷和无保障、想到传统以及传统的欠缺对作家头脑中的影响时，我最后想到，该把一天被弄皱的外壳，连同其争论、其印象、其愤怒、其笑声一起卷起来，掷进树篱里去。有一千颗星星在空阔的蓝色天空当中一闪而过。人似乎是独自呆在一个神秘莫测的社会当中。所有的人都睡着了——俯卧着、平躺着，一言不发。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街道上似乎没有一个人在走动。甚至旅馆的门也是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触摸下反弹着打开了——没有一位杂役在熬夜以便给我照着亮去就寝，时间是太晚了。

第 二 章

如果我可以要求你们跟随着我的话，那么场景现在已经改变

了。树叶仍然在坠落，不过现在是在伦敦，而不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而且我必须要求你们想象，有一个房间，就像成千上万个房间一样，它有一个窗子，那窗子越过人们的帽子和运货车以及汽车而与其他的窗子遥遥相望，而房间内的桌子上有一张白纸，上面用大字写着“妇女与小说”，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不幸的是，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吃过午餐和正餐之后，其必然的后果竟是对大英博物馆的一次访问。人必须把在所有这些印象中的个人的和偶然的东西给过滤掉，这样才能经过努力获得那种纯净的液体，也就是真理的香精油。须知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那次访问和那次午餐以及正餐引起了一大堆问题。为什么男人喝酒而女人却是喝水？为什么一个性别是如此富足而另一个性别却是如此贫穷？贫穷给小说带来了什么效果？什么条件对艺术作品的创作来说是必要的？——成千个问题立刻全来了。但人需要的是答案，而并非问题，而答案只有通过请教博学之士和不带偏见的人才能获得，博学之士和不带偏见的人使自己免除了口舌的争吵和身体的搅扰，而将其推理和研究的结果发表在大英博物馆里可以找到的书籍之中。我拿起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铅笔，自问道，如果真理在大英博物馆的书架上找不到的话，那么真理又在何处？

我这样作好了准备，又是这样自信和有求知之心，于是着手去追求真理。那天虽然实际上并不潮湿，却也阴沉，大英博物馆四邻的街道满是敞开的煤炭投入口，一袋袋的煤正朝投人口倾倒着。四轮马车正在停下，并把一些用绳子扎住的箱子放置在人行道上，箱子里装的大概是一家瑞士人或者意大利人全家的服装，他们大概是预备冬天在布卢姆斯伯里[①] 一带的公寓里寻找好运或者是在寻求避难，或者是寻找某种合意的权宜之计。有些人用手推车推着花木在街道上招摇而行，他们的嗓子照例是嘶哑的，

① 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伦敦一区名，20世纪初曾为文化艺术中心。

他们中有的人喊，有的人唱。伦敦像一个工厂，伦敦像一台机器。我们都像织布的梭子，在朴实的底子上被人穿来穿去，以便织出些花样来。大英博物馆是这家工厂的另外一个部门。双开式弹簧门猛一打开，人就站在一个巨大的穹顶下面，就好像是那个巨大的秃顶前额里的一个思想一般，而那个前额上又绕上了一条写满了名作家姓名的精美带子。人走到柜台边，拿起一张纸条，打开一卷目录，而且……这儿的五个点标志着不连接的五分钟的惊愕、惊奇和困惑。你们知不知道，在一年的过程中有多少本书写的是女人？你们知不知道，有多少本书是男人写出来的？你们是不是意识到，你们或许是天地万物中被讨论得最多的动物？我是带着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铅笔前来的，打算读上一个上午，以为到那个上午结束时我满可以把真理转移到我的笔记本上。但是我想，要应付所有这一切，我得成为一群大象和无数的蜘蛛才行。我是绝望地提及了这些据称是寿命最长和眼睛最多的动物。我甚至得有钢的爪子和铜的喙，方可刺穿那个外壳。我怎样才能找到埋在这一大堆纸里的那一点儿真理呢？我问自己，并且在绝望中开始用目光在那个长长的书名单子上上下打量。甚至那些书的名字也给了我思考的材料。性别及其性质完全可以吸引医生和生物学家，但是令人吃惊和难以解释的却是这个事实，即性别——也就是说女人——也吸引了令人愉快的随笔作家、敏锐的小说家、获得了硕士学位的年轻人，吸引了没有获得任何学位的男人，吸引了除了他们不是女人之外并无明显资格的男人。这其中有一些书，乍一看来轻浮而又没正经；但另一方面，有许多书则是严肃的和带有预言性质，是有道德的和忠告性的。只是读读这些书名便令人联想到，有不计其数的男教师们、不计其数的牧师们登上他们的讲台和布道坛，长篇大论，滔滔不绝，远远超过平常给予讲这个题目的时间。这是一个最为奇怪的现象，而且显然——这

儿我查阅了字母 M 那一栏——那一栏只限于男性[①]。女人并不写有关男人的书——这是一个我不能不带着欣慰予以欢迎的事实，因为倘若我不得不首先阅读男人写的有关女人的所有的书，然后又不得不阅读女人写的有关男人的所有的书的话，那么以前100 年才开一次花的世纪树就会开上两次花，然后我才能开始动笔。因而我完全是随心所欲地挑选了十来本书，把我的那些纸条放在一个金属丝制的浅盘子上，然后在我的座位上等着，四周是对真理的香精油的其他寻求者。

会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奇特的差异，我心中纳闷，同时在由英国的纳税人为别的目的而提供的那些纸条上画着便士硬币。根据这个图书目录来判断，与男人之与女人相比，为什么女人这样更令男人感兴趣？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事实，我的精神开了小差，脑子里想象着那些花费时间写作有关女人的书的男人的生活，他们究竟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结婚了还是没有结婚，是红鼻子还是驼着背——无论如何，感到自己是这样的关注对象令人仿佛有点沾沾自喜，只要那种关注并非全是由有残疾的人和体弱的人所给予的——我就是这样无谓地思索着，到最后一大堆书山崩似地滑落在我面前的桌子上。现在麻烦产生了。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受过在研究方面的训练的学生毫不怀疑，有某种方法可以像牧羊一样带着他的问题走过所有的分散注意力之处，一直到他的问题撞上它的答案，就好像一只羊跑进羊圈一样。例如，我旁边的那个学生正在勤奋地抄录着一本科学手册，我确信，他每过十来分钟便从基本的矿砂里挖掘出质纯的金块。他所满意地发出的微弱的咕哝声很是表明了这一点。但不幸的是，如果人并没有接受过大学训练的话，那么问题也就远非被赶进它的羊圈，而是就像一群惊恐万状的羊，在一大队猎犬的追逐之下，乱哄哄

① M 是英文男性（male）一字的字首字母。

地四下逃窜着 教授们、男教师们、社会学家们、牧师们、小说家们、随笔作家们、记者们，以及那些其惟一的资格就是他们不是女人的人们，他们追逐着我的简单而又单一的问题——妇女为什么贫穷？——到后来那个问题又成了50个问题，到后来那50个问题发狂地跳进水流的中央，随波逐流而去。我笔记本里的每一页都潦草地书写上了笔记。为了向你们表明我当时的心境，我将把一些笔记念给你们，应该说明的是，页上的标题只不过是用正楷大写字母写的“妇女与贫穷”，但接下来则大体上是：

中世纪妇女的状况
斐济群岛妇女的习惯
妇女被当作女神来崇拜
妇女的道德感较男人为弱
妇女的理想主义
妇女更为勤恳
南太平洋诸岛妇女处于青春期之时
妇女的动人之处
妇女被当作祭品而献祭
妇女脑子体积小
妇女的更深的下意识
妇女身上的汗毛不那么多
妇女在脑力、道德和体力上低下
妇女对孩子的爱
妇女寿命更长
妇女肌肉无力
妇女的钟爱之情强烈
妇女之虚荣心
妇女的高等教育

莎士比亚之妇女观
伯肯黑德勋爵[1] 之妇女观
英奇教长[2] 之妇女观
拉布吕耶尔[3] 之妇女观
约翰生博士[4] 之妇女观
奥斯卡·布朗宁先生之妇女观……

这儿我歇了口气，并且在页边的空白上切实地加上了一句，塞缪尔·巴特勒[5] 为什么说，“聪明人从来不说他们对女人的看法”？而显而易见的是，聪明人除了女人从来不说别的事情。但是，当我仰靠在椅子上，看着那个巨大的穹顶——我是其中的一个思想，不过这思想现在又有点儿窘困——时，我又继续想到，非常不幸之处在于，聪明人从未对女人有相同的看法。蒲柏[6] 作如是说：

大多数女人全无性格。

拉布吕耶尔则是作如是说：

女人爱走极端，不是比男人好就是比男人坏。

他们俩是同时代人，又都是敏锐的观察家，然而见解却截然对

---

① 伯肯黑德（Lord Birkenhead，1872～1930），英国政治家、律师和著名演说家。
② 英奇（William Ralph Inge，1860～1954），英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
③ 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ere，1645～1696），法国作家。
④ 约翰生（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作家、评论家、辞书编纂者。
⑤ 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英国作家。
⑥ 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英国诗人。

立。妇女到底能不能受教育呢？拿破仑认为她们不能。约翰生博士的看法正相反[①]。她们究竟有没有灵魂？有些野蛮人说她们没有灵魂。而另外一些人则相反，他们断言女人几乎就是神并因而崇拜女人[②]。有些圣贤认为她们的脑子要浅薄一些，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她们的意识要深刻一些。歌德尊重她们，墨索里尼鄙视她们。不管你朝哪个地方看，男人们都是在思考着女人，而且想法不同。我断定，要想把它完全弄清楚是不可能了，同时又怀着妒意瞥了一眼隔壁的那位读者，他正在做着最为整洁的摘要，摘要的上端往往是字母A、B或者C，而我自己的笔记本却是笔墨泛滥，乱糟糟地潦草记下一些矛盾的话语。这是令人苦恼的，令人困惑的，令人屈辱的。真理全从我的指缝里滑走了，每一滴真理都逃脱了。

我考虑，我不能就这样回家去，在妇女与小说的研究上加上一句：女人身上的汗毛少于男人，或者南太平洋诸岛居民的发育年龄是9岁——抑或是90岁？以此作为一种重大的贡献，即使是由于书写时注意力分散而字迹漫漶，不堪卒读。在经过一个上午的工作之后拿不出更有分量、更可示人的东西是不光彩的。如果我没有能领会以往有关妇女的真理（为了简洁我不得不用女人一词的字首字母W而称之）的话，那么又何必为将来的妇女而烦恼呢？那些绅士专门研究妇女以及妇女对任何可能方面上的影响——对政治、孩子、工资、道德等的影响，不管他们人数是多

① "'男人知道他们不是女人的对手，因而他们选择女人中的最软弱者或最无知者。倘若他们不这样认为的话，他们永远也不会害怕知识与他们同样多的女人。'……为了对女性公正起见，我认为承认下述才是坦率的，即在接下来的交谈中，他告诉我，他说的话是认真的。"——鲍斯威尔，《赫布里底群岛游记》。——原注

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1740～1795），苏格兰作家，著有《约翰生传》。

② "古代日耳曼人认为女人身上有某种神圣之处，因而就像请教传神谕者一样去请教她们。"弗雷泽，《金枝》。——原注

弗雷泽（Sir James Frazer，1854～1941），英国人类学家。

么众多又是多么博学，向他们请教都似乎纯粹是浪费时间。还不如不打开他们的书。

但是当我沉思默想之时，我又在百无聊赖之中，在绝望之中无意识地画了一幅画，而我本来是应该像我隔壁的那位读者一样作出结论的。我是在画出一张脸，一个人形。那是冯·X教授的脸和人形，冯·X教授正在写他的不朽巨著，书名是《论妇女在心理上、道德上和身体上的低劣》。在我的图画中他并不是一个对女人有吸引力的男人。他身体笨重，长着一个大下巴，而为了与此达到均衡又长着非常小的眼睛，他的脸非常红。他的表情表明，他是有些激动地工作着，这使他用笔在纸上刺戳着，就好像写作的时候他正在杀死某个害虫，但即使当他把它杀死之时这也未令他满意，他必须继续杀死它，但即使如此，也仍然存在着令他愤怒和生气的理由。我看着我的画问道，那会不会是因为他的妻子？是不是她爱上了一位骑兵军官？那位骑兵军官是不是身材修长、风度优雅并且穿着仿阿斯特拉罕羔羊皮的衣服？姑且采用弗洛伊德[1]的理论，他是不是在孩提时代遭到了一个漂亮姑娘的嘲笑？因为我认为，即使在其孩提时代这位教授也不可能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孩子。不管那原因是什么，在我的素描中，当他写着那本论述妇女在心理、道德和身体上的低劣的大书时，那位教授显得非常愤怒，非常丑陋。画图画是结束一个徒劳无益的上午的工作的一种懒散方式。然而正是在我们的懒散之中，在我们的梦幻之中，那个被淹没在水中的真理却有时露出了水面。当我看着我的笔记本的时候，在心理学上的一种基本训练——那不必用心理分析的名义来抬高身价——向我表明，那位愤怒教授的素描是在气头上画出来的。当我做梦的时候愤怒一把抓住了我的铅

[1]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心理学创始人。

笔。可是愤怒在那儿做了些什么呢？兴趣、混乱、消遣、厌倦——所有这些情感我都能探测出并说出其名字来，在整个上午这些情感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是不是愤怒这条黑游蛇潜伏在这些情感当中？是的，那幅素描说道，愤怒这条黑游蛇是潜伏在其中。它使我明白无误地注意到了那一本书，那一个短语，它把那个恶魔给激怒了，那就是教授有关女人在心理上、道德上和身体上的低劣的陈述。我的心砰砰乱跳。我的面颊滚烫发烧。我气得满脸通红。我的生气尽管是件傻事，但却不足为奇。谁也不愿意被告知自己天生就比一个小个子男人逊上一筹——我看了看我身旁的那个学生，他喘着粗气，戴着一条打好了结的领带，而且有两个星期没有刮脸了。人总有某些愚蠢的虚荣心。那只不过是人性使然而已，我考虑到，并且开始在那位愤怒教授的脸上画上硬币图案和圆圈，到最后他就像一片燃烧着的灌木丛或者一颗火焰似的彗星——反正像一个妖怪，既没有人的形状也没有人的意义。此刻那位教授只不过是一捆在汉普斯特德石南荒原上的燃烧着的柴把而已。很快我本人的愤怒就得到了解释并被去掉了，但是好奇仍然存在。教授们的愤怒怎么解释呢？他们为什么愤怒？须知当轮到分析这些书籍所留下来的印象时，总是有一种高温的成分。这种高温呈现出许多形式，它在反讽、感伤、好奇、谴责中把自己表现了出来。但是还有一种成分，它经常出现但又不能被立即识别出来。愤怒，我称其为愤怒。但它又是这样一种愤怒，它钻到了下面并与所有其他种类的情感混合在一起。从其古怪的效果来判断，它是乔装打扮而又复杂的愤怒，而不是简单而又率直的愤怒。

我审视着那一大堆书，想到，不管那是什么原因，对于我的目的来说这些书都是毫无用处的。这就是说，尽管从关系到人类方面来看它们充满了教导、兴趣、厌倦，以及有关斐济群岛居民的非常古怪的事实，但从科学上讲它们是没有价值的。它们是在

情感的红光而并非真理的白光之内被写出的。因而它们必须被送回到那个中央的桌子上去，重新回到在那个巨大的蜂巢中自己的巢室中去。从那个上午的工作中我所检索到的一切信息，便是那个愤怒的事实。那些教授们——我把他们这样归并在一起——愤怒了。可又是为什么呢？我还了书以后自问道，为什么呢？我重复道，此时我是站在柱廊的下面，周围是鸽子和史前时代的独木舟，他们为什么愤怒呢？我一边问着我自己这个问题，一边溜达着出去找个地方吃午饭。我此刻称之为他们的愤怒的东西，其真正的性质是什么呢？直到在大英博物馆附近什么地方的一家小餐馆里等到饭菜被送上来以前，这个难题会一直持续下去。某个在我之前吃午饭的人把晚报的午饭版留在一把椅子上了，于是我在等着有人送饭来的时候，开始无所事事地读着报上的大标题。一行非常大的字母像一条缎带一般横贯报纸。有人在南非获得极大成功。小一点的字母声称，奥斯汀·张伯伦爵士[①] 正在日内瓦。一把上有人的毛发的肉斧在一个地窖里被发现。某某法官先生在离婚法庭上对妇女的伤风败俗作了评论。还有别的新闻星星点点地散布在报纸各处。一位电影女演员被人从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峰巅上掉了下来，悬挂在半空中。近日将是多雾天气。我想，就是来到这个星球的一位最为匆匆的过客，若是拿起这张报纸，甚至只是从这分散的证据，也不可能意识不到英国是在男性政体的统治之下的。没有一个头脑健全的人会看不出那位教授所占有的支配地位。他是权力、金钱、影响。他是报纸的业主、主编、审稿人。他是外交部长、法官。他是板球运动员，他拥有赛马用的马和游艇。他是那家给其股东200％利息的公司的董事。他把几百万英镑捐给他所管理的慈善机构和学院。他把那位女电影演员悬

① 张伯伦（Sir Austen Chamberlain，1863～1937），1921～1922年任英国保守党领袖，1924～1929年任英国外交大臣。获1925年诺贝尔和平奖。

挂在半空中。他将裁决那把肉斧上的毛发是不是人的毛发；他将宣告那位凶手无罪或者宣判他有罪，是把他吊死还是把他放了。除了雾之外，他似乎控制一切。然而他却愤怒了。由于这个原因，我知道他是愤怒了。当我读他的有关女人的著作时，我想到的并不是他所说的话，而是他本人。一个争论者若是冷静地进行争论，那就表明他只是想着他的论证，而读者也不能不想到那个论证。倘若他是冷静地写着女人，用无可争辩的论据来确立他的论证，并且并无迹象表明他希望结果是此而非彼，那么我也就不会愤怒。我就会承认事实，就像承认豌豆是绿的、金丝雀是黄的这个事实一样。若是这样我就会说，就那样吧。可是我愤怒了，因为他愤怒了。不过当我翻着那张晚报的时候，我想到，一个有这些权力的人竟会愤怒，未免有些荒诞无稽了。我纳闷，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愤怒是听凭权力驱使的一个为人所熟悉的幽灵？例如，有钱人经常生气，因为他们怀疑穷人想夺取他们的财富。教授们，或者说是年高德昭的老人们，须知这样称呼他们或许会更为精确，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为那个原因而生气，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是因为一个在表面上不那么明显的原因而生气。也许他们根本也不“生气”，确实，他们经常赞赏他人，待人忠实，在私生活中堪称楷模。也许教授在稍微过于强调地坚决认为女人低劣的时候，他所感兴趣的并不是妇女的低劣，而是他本人的优越感。这就是他相当暴躁而又过于强调地予以保护的东西，因为对他来说那是一块价格最为罕见的宝石。对于两个性别的人来说——这时我看着他们，他们正在人行道上挤来挤去——生活是艰苦的，困难的，是一场永恒的斗争。它要求有巨大的勇气和力量。既然我们是存有幻想的生物，所以也许生活更要求我们对自己怀有信心。若是没有自信，我们就是摇篮里的婴儿。然而我们又怎能最快地产生出这种无法估量而又极其可贵的自信呢？那就是仰赖于感到别人逊于自己。依赖于感到自己比别的人有某种

天生的优势——那优势可能是财富，或者地位，或者一个挺直的鼻子，或者是由罗姆尼[1]画的一幅祖父的肖像画——须知人类想象力的那些可怜的花样是无穷无尽的。这样一来，对一位须征服他人、统治他人的年高德昭的老人来说，那种认为数量众多的人们——实际上是人类的一半的人们——天生就逊于他本人的感觉，也就极其重要。这种感觉一定是他的权力的一个主要来源。但是我想，还是让我把这个评论的角度转向真实生活吧。它是不是有助于解释人在日常生活的边缘中所注意到的那些心理上的令人困惑之处？它是不是对我的惊讶作出了解释？我的惊讶是：几天前，Z是最有人情味的人，是男人中最谦虚的人，他拿起丽贝卡·韦斯特[2]的某一本书，读了其中的一段，然后惊叫道，“这个傲慢的女权主义者！她说男人是势利小人！”这个惊叫，是如此令我吃惊——为什么韦斯特小姐因为对另外一种性别作了一个可能是真实的、即使是贬损的陈述，就成了一位傲慢的女权主义者？那不仅是受到了伤害的虚荣心所发出的喊声，而且是一种抗议，抗议对他自信的权力的某种侵犯。几百年来，女人一直被用做镜子，那镜子具有把男人的外形以其自然大小两倍的方式给照出来的似魔术而又令人愉快的力量。倘若没有那种力量，地球就会仍然是沼泽和丛林，我们所有的战争的光荣就会无人知晓，我们就会仍然在羊骨头上画着鹿的图形、或者仍然用火石来换取羊皮，或者任何迎合我们质朴趣味的不管什么简单的装饰品。超人和主宰命运之手也就会从未存在过，俄国沙皇和德国皇帝也就会从未戴上皇冠或者失去皇冠。不管镜子在文明化的社会里会有什么用途，对于一切暴力和英勇的行动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这就

[1] 罗姆尼（George Romney，1734～1802），英国肖像画家。

[2] 韦斯特（Dame Rebecca West，1892～1983），英国小说家、评论家，原名Cicily Isabel Fairfield Andrews。

是为什么拿破仑和墨索里尼两人都如此强调地认为女人低劣，因为如果女人不低劣的话，他们也就不能再自我扩张了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男人常常需要女人。而且这也有助于说明，在女人的批评下男人是多么焦躁不安，而且若是她对他们说，这本书不好，这幅画没有骨气，或者可能不管是什么毛病，与男人作出同样的批评相比，那就不可能不带来更大的痛苦和激起更多的愤怒。因为如果她开始说出真相的话，镜子里的身影就会缩小，他的人生之够格就会减少。除非他在早餐和正餐上能够把他本人看得起码有他的实际身材两倍那么大，否则的话他又怎能继续作出判断、教化土人、制定法律、撰写书籍、在宴会上穿着礼服并滔滔不绝地演讲呢？我就是这样思索着，同时把我的面包捏碎，搅动着我的咖啡，并且时而看着街上的人们。那个镜子上的幻象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因为它激发着生命力，刺激着神经系统。若是把它拿走，男人就可能死去，就像瘾君子被剥夺了其可卡因一般。我朝窗外望去，心中想，人行道上一半的人正是为那个幻象所迷惑，而迈着大步前去工作。早晨，他们在那个幻象令人愉快的光线之下戴上帽子，穿上外套。他们一天的开始是充满信心、精神振奋的，相信自己会被邀请参加史密斯小姐的茶会；走进房间时他们自言自语道，我是这儿一半人的上级，因而他们就带着那种自信、带着那种自持讲着话，那种自信和自持在公共生活中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并且在私人头脑的空白上留下了极其奇特的标记。

但是对另外一种性别的心理这个危险而又有极大吸引力的话题所作出的这些贡献——我希望，当你自己一年有500英镑时你将调查这些贡献——却因必须付账而被打断了。账款是五先令九便士。我给了服务员一张十先令的钞票，于是他去给我找钱。在我的钱包里还有一张十先令的钞票，这我注意到了，因为它是一个仍然令我激动得透不过气来的事实——即我的钱包有自动产生

出十个先令钞票的力量。我打开钱包，钱在那儿。社会给了我鸡肉和咖啡、床和住所，来换取我姑姑所留给我的数目为若干张的纸，这些纸留给我只是因为我和她的名字一样，再没有其他原因。

我必须告诉你们，我的姑姑玛丽·贝顿，是在孟买骑马外出去呼吸新鲜空气时，从马上跌落下来而死去的。我获得遗产的消息传到我这儿的那个晚上，与国会通过给妇女以选举权的法案大致是同一个时间。律师的一封信丢进了邮筒里，当我打开信时，我发现她永久性地每年留给我 500 英镑。在那二者——选举权和钱——之间，我承认，似乎钱在极大程度上更加重要。在那以前，我谋生的手段是从报社里乞讨些零活干，报道这儿的骑驴大赛或者是那儿的婚礼；我曾替人写信封，读书给老太太们听，制作纸花，在幼儿园里教小孩子们学念字母表，以此挣上几个英镑。这就是在 1918 年以前向妇女敞开大门的主要职业。恐怕我没有必要描述那艰苦工作的任何细节，因为你们也许认识做过这种工作的女人；也没有必要描述当挣到这笔钱时靠那笔钱来生活的困难，因为你们可能已有所尝试。不过仍然留在我身上的比上述二者更为糟糕的伤害，就是当时在我身上所产生出来的恐惧和辛酸的毒物。首先，总是在做自己不愿意做的工作，而且是像奴隶一样工作，同时又谄媚、奉承，也许并非总是有必要去谄媚奉承，但又似乎有这种必要，而且若是冒险，赌注又似乎太大。然后就是想到，那种才能，是死亡将其掩盖起来了，那是种小小的才能，不过对拥有者来说却弥足珍贵，那种才能毁灭了，而随之毁灭的还有我的自我，我的灵魂——所有着一切都像锈菌一样，吃掉了春天的花朵，从心里把树木毁掉。然而，我已经说过，我的姑母死了，而每当我兑换一张十先令的钞票时，那种锈菌和腐蚀作用的生成物也就被擦掉了一点儿，恐惧和辛酸也就离去。我把那块银币塞进我的钱包，记起了那些辛酸的日子，于是想到，

一笔固定的收入会把脾气改变得这么多，这确实是引人注目。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这500英镑给夺去。食物、房子和衣服永远是我的。因而，不仅勉力劳作停止了，而且仇恨和辛酸也停止了。我不必仇恨任何人，因为他不能伤害我。我不必奉承任何人，因为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因而不知不觉之间，我发现自己对人类的另外一半采取了一种新的态度。任何阶级或者任何性别，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予以责备都是荒诞的。巨大的人群从不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负责。他们被他们所不能控制的本能所驱使。那些年高德昭的老人们、教授们，他们也有无穷无尽的困难，也有可怕的障碍须予以全力对付。他们所受的教育在某些方面与我所受的教育一样有缺陷。那种教育在他们身上产生了同样巨大的毛病。固然，他们有钱有势，可是其代价却是在其胸中收养着一只鹰，一只兀鹰，那兀鹰总是在撕裂肝脏，啄剥肺叶——那就是那种要占有的本能，那种要获得的狂怒，这驱使他们渴望要永远地获得别人的田地和货物，驱使他们划定疆界、制造旗帜、制造战舰和毒气，驱使他们把他们自己的生命和他们子女们的生命奉献出来。你若是走过海军部大楼的拱门（我已经来到那个纪念门了），或者走过任何一条全是战利品和大炮的大道，便可反省在那儿所称颂的那种光荣。或者在春天的阳光里注视着股票经纪人和大律师，他们走进室内去挣钱，挣越来越多的钱，而事实上一年500英镑就足以使人生活在阳光之中了。我经深思后认识到，这些是使人不愉快的本能。它们是生活条件的产物，是教化欠缺的产物，我想到，同时看着坎布里奇[①]公爵的雕像，尤其是看着他的帽檐向上卷起的三角帽上的羽毛，大概以前从未

① 坎布里奇公爵（Adolphus Frederick，1st duke of Cambridge，1774～1850），英王乔治三世的第七子，1801年封坎布里奇公爵，1802年任枢密官，1813年晋升陆军元帅，1816～1837年任汉诺威王国总督。

有人像我那样死盯着它们看。而且，鉴于我已意识到了这些欠缺，因而恐惧和辛酸也就渐渐地自我缓和为怜悯和宽容，然后再过上一两年，怜悯和宽容也会消失，代之而来的便是那个最大的解脱，那就是能按照事物自身的状况来思考事物的自由。比如说，那座大楼，我是否喜欢它？那幅画美还是不美？在我看来那是本好书还是坏书？确实，我姑母的遗产把天空向我揭示了出来，并且用空旷的天空景象取代了一位绅士的高大而又气度不凡的身影，弥尔顿就建议我要永远崇拜那身影。

我就是这样思考着，猜测着，同时取道返回我在河边的家。灯已经点上了，从上午到此刻整个伦敦起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变化。那就好像那台巨大的机器，经过一天的劳作以后，在我们的帮助下，制造出了几码长的非常令人激动、非常美丽的某种东西——一块有着红色眼睛闪烁其间的像火一般的织物，一个喷着热气咆哮着的黄褐色的怪物。甚至风在拍击着房子、吹得围篱咯咯作响时，也像一面旗子在飞扬。

然而，在我那条小小的街道上，占上风的却是家庭生活。房屋油漆工人正在从梯子上下来。保姆正在小心翼翼地把婴儿车推进去，又推回到儿童室给小孩吃茶点。煤炭装卸工人正在把空麻袋折叠起来，一个个地摞在上面。那个开蔬菜水果店的女人手上戴着红色的露指长统女手套，正在把当天的进款加起来。可是由于我全神贯注地思考着你们搁在我肩上的问题，结果在我甚至看见这些寻常景象时，也不能把它们归纳到一个中心去。我想，与甚至一个世纪以前相比，要说出这些工作当中哪一种更为高尚、更为必要，现在是愈加困难了。是像煤炭装卸工好呢，还是做保姆好？那位养育了八个孩子的打杂女佣对这个世界所具有的价值，是不是小于那位挣十万英镑的律师？问这个问题是没有用处的，因为无人能够回答。这不仅仅是因为打杂女佣和律师的相对而言的价值每隔十年便涨落一次，而且也因为我们并无标尺可用

来衡量他们甚至在此刻的实际状况。我要求我的教授在他的有关妇女的论证中，为我提供有关这一点或那一点的“无可争辩的证据”，这实在是愚蠢。即使此刻有人能够把任何一种天赋的价值给陈述出来，那些价值也会改变，一个世纪以后它们大有可能会完全改变。除此之外，当我来到我的家门口时，我想到，一百年以后，妇女将不再是被保护的性别。可以推想而知，她们将参加曾一度将她们拒之门外的一切活动和努力。保姆将会去装卸煤炭，开铺子的女人将会去开火车。以在妇女是受到保护的性别时所观察到的事实为根据而确立的一切臆断，都将消失——例如(现在正有一小队士兵走过这条街道)，大家总是臆断，妇女、教士和园丁比别的人长寿。如果把那种保护取消，让她们作出同样的努力和参加同样的活动，让她们当士兵、水手、火车司机和码头工人，那么妇女就不仅比男人更早地相继死去，更迅速地相继死去，而且甚至人们在说“今天我看见了一个女人”时，就像以前说“我看见了一架飞机”一样。当做女人不再是一种被保护的职业时，什么事情也就都可能发生，我这样想着，同时打开了房门。不过所有这一切与我的论文题目“妇女与小说”又有什么关系呢？我问道，同时走了进去。

第 三 章

晚上没有带回重要的论述、可信的事实，未免让人扫兴。女人比男人穷，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也许现在最好是放弃寻求真理，并且轻而易举地接受山崩似地压来的见解，它们像熔岩一样炽热，像洗碗水一样脏。最好是拉上窗帘，排除分心的事儿，点上灯，缩小探究的范围，请记录事实而并非见解的历史学家描述一下，妇女是生活在什么状况之下，而且不必包括所有的时代，只谈谈英国，比如说在伊丽莎白时代。

这是因为，在那个每两个男人中就有一个似乎能写韵文或者

十四行诗的时代，却没有一位妇女写过一句，来参与那非凡的文学盛事。何以如此，长期以来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妇女生活在什么状况之中呢？我问我自己，须知小说既然是想象的作品，也就并非像卵石一样忽然落在地上——科学倒是可能那样落地。小说像蜘蛛网，也许始终只是轻微地挂靠，但却仍然四个角都依附于生活。这种依附往往难以为人们所察觉，例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就似乎完全不依附他物地飘浮着。但是当这个网被扯歪，边上被钩住，或中间被撕开时，人们就会记得，这些网并不是由无形的生物在空中织成的，而是受苦受难的人的作品，并且依附于大体上是物质的事物，如健康、金钱和我们所居住的房屋等。

因而，我走到放历史书的书架前，取下一本最新的历史著作，即特里威廉教授[①]的《英格兰史》。我又一次在索引中查找“妇女”一语，找到了“其地位”一栏，并翻到它所指出的有关页码。“打老婆”，我读道，“是男人的一种得到公认的权利，不论高低贵贱，大家都打老婆而不觉得羞耻。……同样，”这位历史学家继续写道，“女儿拒不嫁给父母所选择的夫婿，就有可能被关起来，在屋里被打来打去，而绝不会引起公众舆论的震惊。婚姻并不是关乎个人情感的事情，而是关乎家庭贪心聚财的事情，在‘具有骑士之风的’上流社会当中尤其是如此。……往往一方或者双方还在摇篮里就已经订婚了，还没有完全脱离保姆的照顾就已经成婚了。”那大致是1470年，乔叟时代刚结束不久。下一次提到妇女的地位是大约200年之后，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由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妇女自己选择丈夫，仍属例外，而丈夫一被指定，他就成为一家之主，起码法律和习俗承认他是一家之主。然而即使如此，”特里威廉教授断言道，“不论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还是可信的17世纪回忆录中的女性，比如说

① 特里威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1876～1962），英国历史学家。

弗尼夫妇的回忆录和哈钦森夫妇的回忆录中的女性，似乎都并不缺乏个性和特色。”当然，克娄巴特拉，我们可以设想，必定有自己的癖性；麦克白夫人，我们会推测，有着自己特有的意志；罗莎林德，我们可以断定，是一位媚人的姑娘。特里威廉教授评论说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似乎并不缺乏个性和特色时，他只不过是说了实情。我们既然并非历史学家，也就甚至可以进而说，自最早期起，在所有诗人的作品之中，妇女都像烽火般燃烧着——在剧作家的笔下，有克吕涅斯特拉、安提戈涅、克娄巴特拉、麦克白夫人、菲德拉、克瑞西达、罗莎琳德、苔丝狄蒙娜、马尔菲公爵夫人；还有在散文作家的笔下，有米勒芒特、克拉丽莎、蓓基·夏泼、安娜·卡列尼娜、爱玛·包法利、盖芒特夫人——在脑海中这些名字纷至沓来，而且她们绝不会使人想到妇女“缺乏个性和特色”。确实，倘若妇女只存在于由男人所写的虚构作品之中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想象妇女是最为重要的人，千姿百态，既崇高又卑贱，既光彩照人又令人沮丧，既美艳绝伦又极端丑陋，像男人一样伟大，有人认为甚至比男人还要伟大。[1]但这是虚构中的妇女。诚如特里威廉教授所指出的，实际上妇女是被关起

---

[1] “在雅典娜的城市，妇女作为奴婢或者做苦工的人，处于一种几乎是东方式的压制之下，然而戏剧舞台却居然创作出了这样的人物，如克吕涅斯特拉和卡珊德拉、阿托莎和安提戈涅、菲德拉和美狄亚，以及主宰着‘患厌女症的’欧里庇得斯的一部又一部戏剧的所有其他女主人公，这一直是一个奇怪的、几乎是不可解释的事实。在那个世界里，在实际生活中一位受尊敬的妇女几乎不能单独在街上抛头露面，可是在舞台上妇女又与男人平等，或者更胜过男人一筹，这种自相矛盾之处从未得到满意的解释。在现代悲剧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不管怎样，对莎士比亚的作品作一非常粗略的研究也就足以揭示出（韦伯斯特的剧作与此相似，不过马洛或者琼森的剧作则不同），妇女的这种主导地位和主动权是怎样从罗莎琳德持续到麦克白夫人的。拉辛也是如此，在他的悲剧中，有六部以女主人公的名字作为剧名，而在他笔下的男性人物当中，又有谁能与埃米尔奥纳和安德罗玛克、贝蒂妮丝和罗克珊、菲德拉和阿达莉相媲美呢？易卜生同样是这种情况，我们能有什么男人来与索尔维格、娜拉、赫达、希尔达·吐格尔以及丽贝卡·韦斯特相匹敌呢？”——F·L·卢卡斯，《论悲剧》，第114～115页。——原注

来，在屋里被打来打去。

这样一来，一种非常奇怪的复合人就出现了。在想象中，她最为重要，而实际上，她则完全无足轻重。从始至终她都遍布在诗歌之中，但她又几乎完全缺席于历史。在虚构作品中，她主宰了国王和征服者的生活，而实际上，只要父母把戒指硬戴在她手上，她就是任何一个男孩的奴隶。在文学中，某些最有灵感、某些最为深刻的思想从她的唇间吐出，而在实际生活中，她却几乎不识字，几乎不会拼写，而且是她丈夫的财产。

由先读历史、再读诗作而构想出的女人，当然是一个奇特的怪物——长着鹰翅的蠕虫，在厨房里剁板油的生命与美的精灵。但是这些怪物不管想象起来多么有趣，事实上却并不存在。若想使她活起来，人们就必须既充满诗意又平淡无奇地进行思考。既与事实保持接触——也就是说，她是马丁太太，36 岁，穿蓝衣服，戴黑帽子，穿棕色的鞋；但又不忘记虚构——也就是说，她是一个容器，内有各种各样的精神和力量，在不断地运行着，闪烁着。然而，人们一把这个方法用于伊丽莎白时代的妇女，事实的缺乏便令人望而却步，这个方面的阐述也就无法进行。有关她，人们所知的没有一件是详尽的、完全真实的和实质性的。历史几乎没有提及她。于是我又求助于特里维廉教授，看看历史对她意味着什么。我翻看他的历史著作各章的题目，发现历史对他意味着——“采邑宅第和公田农业的耕种方法……西多会修士[①]与养羊业……宗教战争……大学……下议院……百年战争……玫瑰战争……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修道院的瓦解……农村的及宗教中的冲突……英国海上势力的发端……西班牙无敌舰队……”等等。偶尔也有某个妇女被提及，一位名叫伊丽莎白的女

---

① 西多会系天主教隐修院修会之一，1098 年创立于法国第戎附近的西多旷野，故名。西多会主张全守本笃会严规。

人，或者一位名叫玛丽的女人，一位女王或者贵妇。但是除了脑力和品德之外再无他物可以由自己支配的中产阶级妇女，就绝无可能参加任何伟大的运动，而那些运动的集合，就构成了历史学家对往昔的见解。我们也不会在任何轶事集中发现她。奥布里[①]难得提到她。她从不写自传，几乎不记日记，现存的只有她的几封信。她没有留下我们可以据以对她作出评价的戏剧或者诗歌。我以为，人们所需要的是大量的信息：她什么年龄结婚，她一般说来有几个孩子，她的住宅是什么样子，她有自己的房间吗，她下厨吗，她会有一个仆人吗——在纽纳姆学院或者格顿学院，怎么就没有某个才华横溢的学生提供这些资料呢？所有这些事实大概是在教区记事录和账簿上。伊丽莎白时代普通妇女的生活一定是散见于某些地方，倘若能把它们收集起来，就能写成一本书。在书架上寻找那些架上没有的书之时，我想，向这些名牌大学的学生建议说他们应该重写历史，是超出我的胆量的奢望，尽管我认为，现有的历史似乎有点儿古怪，不真实，不平衡；不过他们又为什么不应该为历史加上一个补遗呢？给那补遗一个不惹人注目（这是当然的）的名字，让妇女可以不违礼法地出现在其中，这又有何不可？须知人们经常在伟人的传记中瞥见她们，她们匆匆而过消失在背景中，有时我想，她们隐藏了一个眼色，一声大笑，也许还有一滴泪水。毕竟，我们有足够的简·奥斯汀的传记，而且似乎无必要再次考虑乔安娜·贝利[②]的悲剧对埃德加·爱伦坡诗歌的影响，而就我本人而言，如果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的家和她经常光顾的地方向公众关闭100年以上，我不会在乎。但是，当我继续在书架上四处寻找时，我发现，有关18世纪以前

---

① 奥布里（John Aubrey，1626～1697），英国文物专家、作家，出版过一本杰出人物的传记集。

② 乔安娜·贝利（Joanna Baillie，1762～1851），苏格兰剧作家、女诗人。

的妇女，一切都不得而知，这令我哀叹。在我的脑海中并没有一个可令我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反复思考的例子。我要问的是，为什么在伊丽莎白时代妇女不写诗歌，而且我也不清楚，她们是怎样受到教育的，她们是否被教会写字，她们是否有自己的起居室，有多少妇女在21岁以前就有了孩子，简单地说，她们从上午八点到晚上八点做什么。他们显然没有钱；按照特里威廉教授的说法，不管她们愿意不愿意，她们还没有走出儿童室就已经嫁人了，大有可能是在十五六岁时出嫁。凭上述情况，我断定，若她们当中有人突然写出了莎士比亚的剧本，反倒是极其古怪的。我又想到一位老绅士——他现在已经死了，但我想他曾是位主教——他宣称，任何女人，不论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都不可能拥有莎士比亚的天才。他为报纸撰文阐发此见，他还告诉一位向他咨询的女士，事实上猫上不了天国，尽管——他补充道——猫也拥有某种灵魂。这些老绅士用了多少心思来拯救我们啊！他们一到，无知的疆界便怎样地退缩了！猫上不了天国，妇女写不了莎士比亚的戏剧。

不管怎样，当我看着书架上的莎士比亚作品的时候，我却不能不想到，那位主教起码在这一点上是对的，就是说，让任何妇女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写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不可能的，完全不可能的。既然事实是如此难以获得，那就让我想象一下吧。假如莎士比亚有一个具有惊人天赋的妹妹，比如说名字就叫朱迪思，那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莎士比亚本人很可能上了文法学校——须知他母亲是一位女继承人，在学校里他可能学了拉丁文——读了奥维德、维吉尔和贺拉斯的作品，并学了基本的语法和逻辑。谁都知道，他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孩子，偷猎过兔子，也许还射过鹿，并不得不年纪轻轻就过早地娶了街坊里的一个女子，那女人婚后远未到10个月就给他生了一个孩子。这种越轨行为把他送到了伦敦去寻找出路。他似乎对戏剧有特殊的爱好，他先是在剧

院门口给人们牵马。不久他就在戏院找到了工作，成了一位有成就的演员，并且生活在世界的中心，会见每一个人，什么人都认识，在舞台上实践着他的艺术，在街上运用着他的才智，甚至进入女王的宫殿。而同时，我们可以设想，他的具有非凡天赋的妹妹却呆在家里。她就像他一样喜欢冒险，一样富于想象，一样渴望着了解世界。但是她没有被送去上学，她没有机会学习语法和逻辑，更不要说阅读贺拉斯和维吉尔的作品了。她有时拿起一本书，也许是他哥哥的一本书，并且读上几页。但接着她的父母就走进来，吩咐她去补袜子，或者是照看一下炖肉，而不要痴迷地看书读报。他们说话时严厉而又慈祥，他们是家境殷实的人，知道女人的生活状况并且爱他们的女儿——确实，极有可能她是父亲的掌上明珠。也许她偷偷地在存放苹果的阁楼上涂写过几页什么，但要么是仔细地把它们藏起来，要么就是把它们烧掉。不久，年仅十几岁的她就被许配给街坊里一位羊毛商的儿子。她强烈反对，说她讨厌结婚，因此又被父亲狠狠打了一顿。然后他不再斥责她，而是乞求她，求她不要伤害他，不要在婚事上使他蒙受耻辱。他说，他会给她一串珠饰，或者一条漂亮的裙子，而且他的眼里含着泪水。她又怎能不听从他呢？她又怎能伤他的心呢？但天赋的力量驱使她违抗父命。她把自己的物品包成一个小包袱，在一个夏夜攀着绳子下了楼，取道去了伦敦。她还不到 17 岁。在树篱中唱歌的鸟儿不比她更具有音乐才能。对于词语的声调，她拥有最敏捷的想象力，类似她哥哥的天赋。像她哥哥一样，她也对戏剧有特殊的爱好。她站在剧场的门口，说她想当演员。男人们当面笑她。经理——一位多嘴的胖男人——狂笑起来，他大叫大吼地说了一通长卷毛狗跳舞和妇女演戏——他说，女人不可能成为演员。他暗示——你能够想象他暗示的是什么。她不能够训练她的技艺。难道她能到酒馆求客饭，或者是半夜在街头徘徊吗？但是她的天才是在虚构想象方面，渴望从男人和女

人的生活以及对他们的癖性的研究中摄取丰富的养分。最后——须知她非常年轻，脸庞奇妙地像诗人莎士比亚，长着同样的灰眼和弯眉——最后演员经理尼克·格林动了怜悯心；于是她发现自己怀上了那位绅士的孩子，因而——当诗人的心被女人的躯体所拘囚、所纠缠时，又有谁能估量出其中的炽热和狂暴呢？——因而她在一个冬夜自杀了，埋在某个交叉路口，位置就在现在公共汽车在“大象与城堡”酒馆外面停车的地方。

我以为，倘若在莎士比亚时代有一位妇女具有莎士比亚的天才的话，那么她的故事就会大体上是这个样子。不过就我而言，我倒赞成那位已故主教——如果他的确是主教的话——的看法，即在莎士比亚的时代会有某位妇女具有莎士比亚的天才，这是难以置信的。因为像莎士比亚那样的天才不是在劳动的、未受过教育的、做奴仆的人们当中诞生出来的。在英格兰，它不是诞生在撒克逊人和布立吞人[1] 当中。在今天，它不会诞生在工人阶级当中。那么，它又怎么能在妇女中产生呢？要知道按照特里威廉教授的说法，她们在走出儿童室以前就已开始了工作，她们的父母逼迫她们，而法律和习俗的各种力量又把她们约束在这类工作中。妇女中必定也存在某种天才，正如它必定存在于工人阶级当中一样。时而有一位艾米莉·勃朗特或者一位罗伯特·彭斯[2] 一时闪耀夺目，证明了天才的存在，但这种天才肯定从未诉诸于笔墨。然而，每当读到一名女巫被人们所回避，或者某女被魔鬼所附身，或者一个聪明的女人在卖药草，或者甚至某个杰出的男人有位母亲时，我就想到，我们是碰到了一位迷途的小说家的踪迹，一位被压抑的诗人的踪迹，某个沉默而又湮没无闻的简·奥

---

① 撒克逊人和布立吞人均为古代英国居民，后在外族人侵时曾处于被压迫地位。

② 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苏格兰著名的农民诗人，一生贫困。

斯汀或者艾米莉·勃朗特的踪迹，她在荒野把自己的头撞破，或者在大路旁作鬼脸怪相，因为她的天赋折磨着她，使她发狂。确实，我倒乐意冒昧猜测，那写了许多诗歌却又不署名的古代无名氏，多半是妇女。我以为这令人想到女性的爱德华·菲茨杰拉德[1]，她创作了民谣和民歌，向她的孩子们低声吟唱，用这些民谣和民歌帮助她度过纺线的时光，或者消磨漫长冬夜。

这也许是真，也许是假——谁能说得清呢？但是在回顾我所杜撰的莎士比亚妹妹的故事时，我觉得，其中的一点是真实的，即在16世纪出生的任何一位具有了不起天赋的妇女都必然会发狂、杀死自己，或者在村外的某个孤独茅舍里了结一生，半是女巫，半是术士，为人们所惧怕又为人们所嘲笑。因为只要精通心理学即可确知，一个试图将其才能用于诗歌创作的极有天赋的姑娘，一定会遭到其他人的反对和阻挠，并会被她本人的矛盾本能所折磨和撕裂，结果她无疑会丧失健康和健全的神志。没有一个姑娘能够走到伦敦，站在剧场门口，闯到演员经理的面前，而不使自己受到侮辱并蒙受痛苦。这痛苦也许是非理性的——因为贞节可能是某些社会出于未知的原因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崇拜对象——但又是不可避免的。贞节在当时，甚至在现在，都在妇女的生活中具有一种宗教式的重要性，并且被神经和本能团团裹住，因而若要把它解放出来并置于光天化日之下，也就需要有最为罕见的勇气。对一位女性诗人和剧作家来说，在16世纪的伦敦过自由的生活也就意味着精神紧张和进退两难，而那种处境完全可能置她于死地。倘若她幸存下来的话，那么她所写的东西，不管是什么，都会是扭曲的、变形的，是从一种勉强而又病态的想象中产生出来的。看着没有妇女的剧作的书架，我想，毫无疑问她

① 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英国作家，他从波斯文译的《鲁拜集》成为英国文学名著。

的剧作不会有署名。她一定会以匿名作避难所。正是贞节感的遗威令妇女甚至迟至19世纪仍隐姓埋名。柯勒·贝尔[1]、乔治·艾略特[2]、乔治·桑[3]，她们的作品证明她们是内心冲突的牺牲品，她们寻求使用男人的名字把自己遮掩起来，虽然并不成功。这样一来，她们也就向习俗表示了敬意——那种习俗如果不是由另一性别的人所牢牢树立起来的话，也是他们大加鼓励的。那习俗认为，妇女引起公众注意是令人厌恶的。（伯里克利[4] 说，一个女人的主要光荣就是不被人们谈及，而他本人则是为人们所大量谈论的一个人。）匿名在女人的血液中流动。想把自己遮掩起来的欲望控制着她们。甚至现在她们也不像男人那样关心自己声誉的健康。一般说来，她们走过墓碑或者广告柱时，并不会感到有将自己的名字镌刻其上的不可抗拒的欲望。这就与阿尔夫、伯特或者蔡斯们不同。这些男人一定会遵从本能行事，若是看见一位漂亮女人走过，或者甚至是一条狗，那本能就会低语道：这狗是我的。当然，涉及的也可能并不是狗，我想，我记起了议会广场、西吉斯林阴道，以及其他的林阴路；它可能是一块地，或者一个长着黑色卷发的男人。而女人甚至能够走过一个非常漂亮的女黑人却并不希望把她变成英国人，这是做女人的一个巨大的优势。

因而，那个16世纪诞生并具有诗歌天赋的女人，就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一个与自身相冲突的女人。要释放出她脑子里的东西（不论是什么），须有一种心境，然而她的全部生活条件，她所有的本能，都与那种心境相冲突。不过我要问，什么是最有利

---

① 柯勒·贝尔是夏洛蒂·勃朗特的化名。她和妹妹艾米莉和安妮于1846年出版了一部诗集，书名为《柯勒·贝尔、埃利斯·贝尔、阿克顿·贝尔诗集》。

② 乔治·艾略特的真名是玛丽·安妮·埃文斯。

③ 乔治·桑（George Sand，1804～1876），法国女小说家，以笔名乔治·桑闻名于世。

④ 伯里克利（（Pericles，公元前495～前429），古雅典政治家。

于创作行为的心境呢？人们能够了解促进那种奇怪的活动、使之成为可能的心境吗？这时我打开了内有莎士比亚悲剧的那卷书。例如，当莎士比亚写作《李尔王》和《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时，他是处于何种心境呢？那自然是古往今来最有利于诗歌写作的心境了。不过莎士比亚本人对此只字未说。我们只是无意中偶然知道，他“从未涂抹过一行字”。也许直到18世纪，有关自己的心境，艺术家事实上从未说过一个字。也许卢梭是说出自己心境的第一人。无论如何，到19世纪自我意识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结果在忏悔录和自传中描述自己的心境成为文人的习惯。他们的传记纷纷写出，他们的信件也在死后被印行。这样一来，尽管我们并不知道莎士比亚在写作《李尔王》时经历了什么事情，我们却知道，卡莱尔在写作《法国革命》时经历了什么事情，福楼拜在写作《包法利夫人》时，或者济慈[①]试图以写诗来对抗死亡的到来和世人的冷漠时，经历了什么事情。

从这数量巨大的现代忏悔和自我分析文学中，人们推断出，写出一部天才作品几乎永远是极其困难的壮举。天地万物都使那天才作品无法完完整整地从作家的头脑中娩出。一般的物质环境与之相悖。狗会吠叫，人们会打扰，钱必须得挣，身体会垮掉。此外，使得所有这些困难加剧并令人更难受的，是这个世界的臭名昭著的冷漠。这个世界并不要求人们写诗歌、小说和历史。它并不需要这些。福楼拜是否找到了合适的用字，或者卡莱尔是否严格认真地核实了这个或那个事实，这个世界均不感兴趣。自然，它也不会为它所不需要的东西付钱。因而作家们，济慈、福楼拜、卡莱尔，也就注意力分散，心情沮丧，在从事创作的青年时期里尤其如此。一种诅咒，一种极度痛苦的呼喊，从这些分析和忏悔的书里升起。“伟大的诗人在不幸中死去”——这是他们

① 济慈（John Keats，1795－1821），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歌吟的主题。如果尽管经受了这一切还是有某些作品最终完成了，那就是奇迹了，而且大概没有一本书在诞生时与当初的构想完全一样而毫无残缺。

但是，在看着空空的书架的时候我想到，对妇女来说，困难必定更加令人畏惧。首先，直到19世纪初，她要自己的一间屋子也是办不到的，更不要说是一间安静的、隔音的屋子了，除非她的父母格外富有或者身份格外高贵。她的零用钱依赖于她父亲的仁慈，既然这零用钱仅够她有衣服可穿，她也就不能拥有那些、甚至光顾诸如济慈或丁尼生或卡莱尔之类的穷男人的慰藉，如：徒步旅行；到法国作一小小的漫游；或享有单独的房间——那住房即使寒伧，也可以使男人们免受其家庭的种种强求和专横之苦。有形的困难令人生畏，但无形的困难甚至更糟。济慈和福楼拜以及其他的天才人物发现世人的冷漠难以忍受，轮到女人时就不只是冷漠，而是敌意。世人对那些人说，你要是愿意写就写吧，这和我无关。但世人不对她说这话，却哄笑道：写作吗？你写作又有什么用处？我再次看着书架上的空白处，心里想，纽纳姆和格顿的心理学家可以来帮助我们了。因为，现在无疑是应该衡量阻碍和挫折对艺术家的精神所产生的影响的时候了，我就曾见过一家乳品公司衡量普通牛奶和A级牛奶对老鼠的身体所产生的影响。他们把两只老鼠放在并排放置的笼子里，其中一只老鼠鬼鬼祟祟，胆小而又个小，另一只老鼠则毛色光亮，胆大又体硕。那么，我们又给作为艺术家的妇女提供什么食物呢？我问道，我想我记起了那份由李子干和蛋奶糕构成的客饭。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只需打开晚报，并且读一下伯肯黑德勋爵的见解——但实际上我并不打算费神把伯肯黑德勋爵有关妇女写作的见解抄录出来。英奇教长所说的话我也不想动用。哈利大街[1]的

[1] 伦敦街名，著名外科医生的聚集地。

专家尽可以用他的聒噪激起哈利大街的回响，而我却依然心平气和。然而我将引述奥斯卡·布朗宁先生的话，因为奥斯卡·布朗宁先生曾经是剑桥的一位大人物，过去常常对格顿和纽纳姆的学生进行考试。他常宣称，“看过任何一组试卷之后，他的印象都是，不管他可能给的分是多少，最优秀的女性在智力上都劣于最差的男人。”在说了这些话之后，布朗宁先生又返回他的房间——而正是这个随后而来的事使得他讨人喜欢，并使得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既高大庄严而又通情达理的人物——他返回他的房间，发现一个小马倌正躺在沙发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双颊凹陷并呈菜色，牙齿是黑的，看上去他并没有充分使用他的四肢。……‘那是阿瑟’（布朗宁先生说道。）‘他是一个志向确实极其高超的可爱的孩子。’”在我看来，这两幅图画始终相辅相成。而令人高兴的是，在这个传记的时代，这两幅图画经常确实是在相辅相成，这样我们阐释伟人的见解就能够不仅听其言论，而且也观其行止。

不过尽管现在可能这样做，但在50年前从重要人物口中吐出的那种见解一定是令人畏惧的。让我们设想，有一位父亲出于最高尚的目的，不希望他女儿离家当作家、画家或者是学者。他就会说，“瞧，奥斯卡·布朗宁先生是怎么说的。”而且不仅有布朗宁先生，还有《星期六评论》，还有格雷格先生——“女性存在的本质，”格雷格先生强调说，“就在于她们为男人所赡养，又为男人所支配”——还有为数众多的男性的见解，大意是说，在智力上不可对妇女抱有任何期望。尽管做父亲的并没有把这些见解大声宣读出来，任何姑娘也可自己读到，而这种阅读，即使是在19世纪，也一定会伤了她的元气，并对她的工作产生深刻的影响。总会有那种断言——你不能做这个、你没有能力做那个——须由人们向其提出抗议，加以克服。也许对小说家来说，这种病菌不再具有太大的威力，因为已经有了一些杰出的女小说家。但是对画家来说，这病菌一定仍有一些作用；而对音乐家来

说，我料想，它甚至现在还是活跃的，并且极有毒性。女作曲家现在的地位，就相当于女演员在莎士比亚时期的地位。我想起来，尼克·格林说过，女人演戏令他油然想起狗跳舞；这时我记起了我所编造的有关莎士比亚妹妹的故事。两百年以后，有关妇女布道，约翰生说了同样的话。这儿，我打开一本音乐书，说道：在这个体面的1982年，针对试图作曲的女性，那些话又再次被使用了。"关于热尔梅娜·泰勒费尔小姐，我们只需重复约翰生博士就一位女传道士所发表的权威意见，只不过把它换成音乐术语而已："先生，女人作曲就像狗用后腿走路。做的并不精彩，但令你吃惊的是，它竟然做出了。'"[1]历史就是这样精确地重复着自己。

这样，我合上奥斯卡·布朗宁先生的传记并把其他的传记推到一边，我断定：显然，甚至在19世纪，妇女要做艺术家也得不到鼓励。相反，她受到冷落、非难、训斥和规劝。由于必须反对这个、不赞成那个，她的精神一定很紧张，她的精力一定遭到耗损。这里，我们再次来到那种十分有趣而又模糊的男性情结的范围之内，那种男性情结对妇女的行动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那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欲望，与其说是希望她低人一等，毋宁说是希望他高人一等。那种欲望使他无处不在，不论人们朝何处看——他不仅挡在艺术的面前，而且还拦住了通往政治的道路，即使在他本人所冒的风险似乎微乎其微、而恳求加入者既谦卑又虔诚时也是如此。我记起，甚至贝斯巴勒女士，尽管她对政治怀有满腔的热情，却也不得不谦恭地弯下腰来，写信给格兰维尔·莱维森-高尔勋爵："……尽管我对政治热烈关注，而且对此说了这么多的话，我却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认为任何一位妇女都不应该更深地介入政治或者任何别的严肃的事情，最多只能说说她的见解（如果有人问她的话）。"这样她就在那极其重要的话题——格

① 塞西尔·格雷：《当代音乐概述》，第246页。——原注

兰维尔勋爵在下议院所作的首次演说——上继续消耗着她的热情，在这里她的热情不会遇到任何障碍。这无疑是一个奇怪的景象，我想。男人反对女人解放的历史，也许比妇女解放的历史本身更为有趣。如果在格顿或者纽纳姆的某个青年学生愿意收集范例并演绎出一种理论，那就有可能写出一本有趣的书来——不过她需要戴上厚手套，需要有棒子，以保护纯洁高尚的她。

但是合上贝斯巴勒女士的书时我又想，现在引人发笑的事情，一度却需极认真地对待。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些现在被收于一本大家认为荒唐无稽的书中、被留下准备在夏夜里给一群优秀的听众读一读的种种见解，却曾经令人热泪盈眶。在你们的祖母和曾祖母当中，有许多人曾为此哭得死去活来。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在极度痛苦时曾大声尖叫。[①] 除此之外，你们已经上了大学并有了自己的起居室——或许只不过是寝室兼起居室？你们有理由说，天才应该置这些见解于不顾，天才应该超然于他人的议论。不幸的是，正是天才的男人和女人最在乎人们说了些什么。请记着济慈，请记着他在他的墓碑上所刻的字。请想一想丁尼生，请想一想——不过我没有必要再增加例子证明这个不可否认的、虽说非常不幸的事实了，那就是，过分在乎人们说了些什么正是艺术家的天性。文学中到处都是那些不理智地在乎别人看法的倒霉鬼们。

返回到我最初的问题，即何种心境最有利于创作，我想，他们的这种敏感是加倍的不幸。因为，看着那本在《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处翻开的书时，我揣度，为了将自己心中的作品完整地全部释放出来，需做极其巨大的努力，为此艺术家的头脑就必须

---

① 见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卡珊德拉》，转引自 R. 斯特雷奇的《事业》。——原注

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英国女护士、近代护理学和护士教育的创始人，以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改善病员护理工作而闻名。

同莎士比亚的头脑一样炽热澄明。他的头脑必须没有障碍，一切异物都必须被消耗尽。

这是因为，尽管我们说我们对莎士比亚的心境一无所知，但即使我们在这么说的时候，我们也道出了莎士比亚的某种心境。我们之所以对莎士比亚所知如此之少——这是与多恩、本·琼森或者弥尔顿相比而言——也许就在于，他的怨恨、恼怒和反感都隐藏不见了。并没有某种"启示"使我们想起作家，使我们停顿阅读。想要抗议、传道、诉怨、报复，想使世人成为艰辛或怨情的见证等一切欲望，都从他身上烧掉了，消耗掉了。因而，他的诗歌也就自由地、不受妨碍地从他身上流淌了出来。如果说曾有一个人使他的作品得到了完全的表达，那个人就是莎士比亚。在又转向书架的时候，我想，如果说曾有一个头脑炽热而澄明，不受妨碍，那就是莎士比亚的头脑。

第四章

人们会发现，在16世纪显然不可能有具备那种心境的女人。只需想一想伊丽莎白时代墓碑上那些全都紧握着手跪着的孩子，想一想他们的夭折，看一看他们那阴暗狭窄的住所，就可意识到，当时没有女人能写得出诗来。人们渴望能发现的，是晚些时候也许有个了不起的女士会利用她相对的自由和舒适，冒着被视为怪物的风险，发表署有她的名字的某些东西。当然，男人并非势利之徒，我继而想，小心翼翼地避开了丽贝卡·韦斯特小姐的"彻头彻尾的女权主义"；不过他们多半是带着同情对一位伯爵夫人写诗的努力表示欣赏。人们可以设想，有头衔的贵妇所遇到的鼓励，比当时默默无闻的奥斯汀小姐或者勃朗特小姐所会得到的要多得多。人们也可望发现，她的头脑受到恐惧和仇恨等与诗格格不入的情感的干扰，而且她的诗歌也显示出那种干扰的痕迹。

例如温奇尔西夫人[1]，我想，并且把她的诗集取了下来。她生于1661年，系贵族出身，又嫁给贵族，无子女；她写诗，人们只需打开她的诗，就可发现她为妇女的地位而义愤填膺：

我们多么堕落！因错误的规则而堕落，
更多是受到教育的愚弄而非天生愚顽；
我们迟钝——人们如此期望，如此设计，
不让我们的头脑得到改善；
如果有人有热情的想象，为壮志驱使，
竟而至于出人头地，
反对的集团仍强大无比，
而成功的希望永不能压倒恐惧。

显然她的头脑决非已“将一切障碍消耗掉并变得炽热澄明”。相反，她的头脑因仇恨和怨情而受到折磨，变得混乱。人类在她看来分裂成两派。男人是那个“反对集团”；男人受到她的仇视，为她所畏惧，因为男人有权力阻止她做她想做的事情——那就是写作：

哎！一个试笔的女人，
被视为狂妄放肆之徒，
纵有美德，其过失也无从救赎。
他们告诉我们，我们错认了性别和行为方式；
良好的教养、时装、舞蹈、化妆、游戏，
才是我们应当属意的成就；
写作、读书、思考，或者探究，

① 温奇尔西（Ann Finch Winchilsea，1661～1720），英国女诗人。

会玷污我们的美丽，耗费我们的光阴，
使我们青春的俘虏望而却步，
而乏味地管理一栋房子和满室奴仆，
却被人认为是我们最大的艺术和用处。

确实，她须假定，她所写的东西将永远也不会出版，以此来鼓励自己进行写作；她须用这悲伤的歌曲来安慰自己：

向几个朋友、向你的悲伤歌唱吧，
月桂树从来不是为你而生长；
甘心呆在你的树荫下吧，不论那儿多么昏暗。

显然，假如她能够把仇恨和恐惧排遣出去，不把辛酸和不满堆满头脑，那么她心中的诗火就是炽热的。时不时的会有纯粹诗情的话语流淌出来：

也不会用褪色的丝线编织，
隐约地再现那不可模仿的玫瑰。

——这些诗句得到了默里先生的公正的称赞，而且据认为，蒲柏记住了下述诗句并在自己的诗中使用它们：

现在水仙花战胜了衰弱的头脑；
我们在芬芳的痛苦下昏倒。

能够写出这样的诗句的女人，其精神转向自然和内省的女人，居然被逼得抒发愤怒和悲痛，实是太大的遗憾。但是当我想象到那些鄙夷和嘲笑、谄媚者的逢迎以及专业诗人的怀疑，我不禁又问

道：她又怎能不如此？她一定是把自己关在乡下的一间屋子里写作，也许又因悲痛和顾虑而心神分裂，尽管她丈夫是最和蔼的人，而且他们的婚姻生活完美无瑕。我之所以说她“一定”如何，是因为当人们开始寻找有关温奇尔西夫人的事实的时候，人们照例地发现，对于她几乎一无所知。她极受忧郁之苦。她告诉我们，如果忧郁缠身，她就会想象出下述诗句所描述的情况，我们了解这一点，也就可以起码对她的忧郁作出某些解释。

> 我的诗行遭到诋毁，我的工作被看做
> 一种无用的愚行或放肆的过错。

而就人们所能够了解的情况而言，遭到这般非难的，就是那在田野里漫步和梦想的无害的工作：

> 我的手欣喜地探查非同寻常的事物，
> 偏离开那已知的、普通的方式，
> 也不会用褪色的丝线编织，
> 隐约地再现那不可模仿的玫瑰。

自然，如果这就是她的习惯，这就是她的欣喜，那么她就只能等着受嘲笑；而且据说蒲柏或者盖依[①]也就相应地讽刺她为“一位渴望涂鸦的女学究”。也有人认为，她曾因嘲笑盖依而冒犯了他。她说，他的《琐事》表明，“他更适合于抬轿子，而不是乘坐它”。默里先生说，这完全是“靠不住的流言蜚语”，而且“无聊”。不过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我倒甚至乐于获得更多的靠不住的流言蜚语，这样我就可能发现或者拼凑出这位忧郁女士的某种

① 盖依（John Gay，1685～1732），英国诗人、剧作家。

形象。她喜欢在田野里漫游，思考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并且极其卤莽地、不明智地奚落了“乏味地管理一栋房子及满室奴仆”。但是默里先生说，她变得散乱芜杂了。她的天赋上长满了杂草、为荆棘所缠绕。她没有机会把自身那种优秀卓越的天赋展示出来。我把她的诗作放回书架，又转向另一位了不起的女士，也就是兰姆所爱的那位公爵夫人，那位浮躁的、想入非非的纽卡瑟尔的玛格丽特。玛格丽特比温奇尔西夫人年长，但是她的同时代人。她们两人极为不同，但又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她们都出身高贵，都无子女，而且都嫁给了最好的丈夫。在两人身上都燃烧着相同的创作诗歌的激情，而且都由于相同的原因而毁了容。只要打开这位公爵夫人的书，就可发现相同的狂怒的爆发，“妇女像蝙蝠或者猫头鹰一样生活，像牲畜一样劳役，像虫子一样死去。……”玛格丽特本来也会成为诗人的。在我们的时代，那种活力最终都会转动某一个轮子的。但实际上，又有什么能使她那种疯狂的、充裕的、天真未凿的智力受到约束，被驯服并变得文雅起来，从而为人类所用呢？那智力杂乱无章地倾泻出来，滔滔形成韵文和散文、诗歌和哲学的洪流，它们凝结在无人读过的四开本和对开本书籍中。她本来是应该让人在她手中放一把显微镜的。她本应该被教会观看星星并进行科学的推理。她的智力是靠孤独和自由来驱动的。没有人阻止过她。没有人教导过她。教授们奉承她，在宫廷里人们又奚落她。埃杰顿·布里奇斯爵士抱怨她粗野——说那是“出身名门又在深宅大院里长大的女人的”粗野。她把自己独自一人关在韦尔贝克。

想到玛格丽特·卡文迪什，脑海中会浮现出怎样一幅孤独而又骚动的景象啊！就好像有棵巨大的黄瓜将其枝蔓覆盖在花园里所有的玫瑰和康乃馨之上，使它们窒闷而死。这个女人曾写道：“最有教养的女人是那些头脑最文明的女人”，但却竟然在草率涂写废话之中消耗自己的时间，并愈来愈深陷于昏迷和愚行之中，

结果她出门时，人们竟蜂拥在她的四轮马车四周围观，这是一种多么大的浪费啊！显然，这位疯公爵夫人成了一个用来吓唬聪明女孩子的怪物。我把这位公爵夫人的书放在一边，又打开多萝西·奥斯本[①]的书信集，我记得，这是多萝西写给坦普尔的谈论公爵夫人新书的信。“无疑这个可怜的女人是有点精神错乱了，否则，她不会那么荒唐，去冒险写书，而且还是写诗歌，我就是两个星期不睡觉，也不会那样做的。”

既然有见识而又谦虚的女人不能写书，而多萝西又敏感忧郁，在性情上恰与那位公爵夫人相反，于是多萝西就什么也没有写。书信不算数。一个女人可以坐在她父亲的病榻旁写信。她可以在炉火旁、在男人们交谈的时候写信，而又不打搅他们。我翻着多萝西的书信集，想到，奇怪的是，那位无师自通的孤独姑娘拥有着何等的遣词造句、塑造场景的天赋啊。请听她继续说：

“午饭后我们坐着谈话，说到B先生，后来我就离开了。炎热的白天在阅读和做活儿中度过，大约六七点钟的时候，我走了出去，来到就在我们家附近的一块公地上，有许多乡村姑娘正在那犯放牧牛羊，坐在树荫下唱民歌。我朝她们走去，把她们的美貌和声调与我所读到的古代牧羊女同样天真无邪。我同她们交谈，发现她们是顶顶快活的，惟一欠缺的只是她们不知自己乃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当我们交谈时，常有一位村姑四下观看，瞅见她的母牛去了麦田，于是她们都跑开，好像脚下长了翅膀一般。我没有那么灵活，于是呆在后面，当我看见她们赶着牲口回家时，我想我也该回去了。吃完

---

① 奥斯本（Dorothy Osborne，1627～1695），英国女作家，以书信闻名于世。威廉·坦普尔爵士是英国政治家兼外交家，后与奥斯本结婚。

晚饭后，我去了花园，又来到花园边的一个小溪旁，我坐了下来，希望你和我在一起。……

人们可以确信，她身上已具有了作家的素质。但是，“我就是两个星期不睡觉，也不会那样做的”。当人们发现，一位具有巨大写作才能的女人竟也说服自己相信写书荒唐可笑，甚至会使得自己显得精神错乱，这时人们就可衡量出，到处流行的反对妇女写作的见解有多强了。我把那薄薄一卷多萝西·奥斯本书信放回书架。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贝恩① 太太。

随着贝恩太太，我们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我们把那些孤独的贵妇留在身后，她们写作既无读者又得不到批评，只是为了给自己带来乐趣，她们和自己的对开本一起被禁闭在自家的花园里。现在我们来到城里，和街上的普通人相接触。贝恩太太是中产阶级妇女，拥有平民的种种美德：幽默、活力和勇气。由于丈夫的死亡和她本人的某些不幸的冒险活动，她不得不靠智慧谋生。她必须以和男人同等的条件工作。她通过非常努力的工作，挣出了维持生活的钱。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在分量上超过了她实际上写出的任何东西，甚至超出了那篇出色的《我折磨了千百人》或者《爱神坐在神奇的胜利之中》，因为这儿开始了思想的自由，更精确地说是开始了那种可能性，即随着时间的推移，精神将会获得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自由。既然阿弗拉·贝恩已经这样做了，姑娘们也就可以到父母面前说，你们不用给我生活费了，我可以用我的笔挣钱。当然，在以后的许多年里那回答都是：是的，过阿弗拉·贝恩那种生活！死了也比那强！而且门则砰的一声关闭得比以往更快。这里，很值得讨论一下那个极有趣

① 贝恩（Aphra Behn，1640－1689），英国戏剧家、小说家、诗人，第一位以写作为生的英国妇女。

的课题，即男人对女人贞节的重视以及这对她们的教育的影响，如果格顿或者纽纳姆的学生有意探讨这一问题，就可能写出一本有趣的书。达德利夫人戴着钻石首饰坐在蚊虫纷飞的苏格兰荒野里，这个形象或许可以用作书的卷首插图。不久前的某一天达德利先生去世时，《泰晤士报》载文说，达德利勋爵是"一位趣味高尚、多才多艺的人，乐善好施，慷慨大方，但古怪专横。他坚持让他太太身着盛装，甚至在苏格兰高地最偏僻的狩猎小屋里也不能例外；他让她戴上大量的灿烂夺目的珠宝，"等等。"他给了她一切——却始终不给她任何责任。"后来勋爵中风了，从此以后，夫人一直护理着他，并以最出众的能力治理着他的庄园。那种古怪专横在19世纪也仍然存在。

还是回到原先的话题。阿弗拉·贝恩证明了，如果以牺牲也许是某些令人愉快的品质为代价，是能够通过写作来挣钱的；因而久而久之，写作也就不仅仅是愚蠢和精神错乱的迹象，而且也具有实际的重要性。丈夫可能会死去，某种灾难可能会袭击家庭。在18世纪中有数百名妇女开始通过翻译或者撰写不可胜数的蹩脚小说来增加私房钱，或者在紧急时刻救助家庭，那些小说现在甚至教科书里也不再提起了，但是仍可在查令十字街的廉价书摊上偶然发现。在18世纪后半叶，妇女们头脑极端活跃——谈话、聚会、撰写论莎士比亚的文章、翻译经典作品——头脑活跃的基础是这个可信赖的事实，即妇女能够通过写作来挣钱。钱使没有报酬便显得微不足道的事情获得了尊严。或许仍然有理由讥笑"渴望涂鸦的女学究"，但也不能否认，她们能够把钱放进自己的钱包里。这样一来，到18世纪末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变化，我若是重写历史的话，我会认为这个变化比十字军东征或者玫瑰战争更为重要，并且对它进行更详尽的描述。这变化就是，中产阶级妇女开始写作了。如果《傲慢与偏见》重要的话，如果

《米德尔马奇》、《维莱特》和《呼啸山庄》[1] 重要的话，那么一般的妇女——而不仅仅是关在乡下大宅之内的被其对开本和恭维者所包围的孤独的贵妇们——开始写作这一事实的重要性，也就远非我在一个小时的论述中所能表达。如果没有这些先驱者，简·奥斯汀和勃朗特姐妹以及乔治·艾略特就不可能写作，就像如果没有马洛，莎士比亚就不可能写作一样；或者像如果没有乔叟，马洛就不可能写作；如果没有那些铺平了道路并使处于自然蛮荒状态的语言得到驯化的已被遗忘的诗人，乔叟也不可能写作。须知杰作并非单一地、孤独地诞生；杰作是多年共同思考的产物，是一群人思考的产物，因而在一人声音的背后有着群体的经验。简·奥斯汀应该在范妮·伯尼的坟墓上放置一个花圈，而乔治·艾略特则应向伊莱扎·卡特[2] 强壮的幽灵表示敬意——那位勇敢的老妇人把铃系在床架上，为的是能够早起以便学习希腊文。所有的妇女都应该把鲜花撒在阿弗拉·贝恩的坟墓上。贝恩的坟墓骇人听闻地但又很恰如其分地坐落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之内。正是她为妇女赢得了说出自己思想的权利。尽管她有点来历不清且又多情，但正是她使我得以今晚对你们说“用你们的智力一年挣上500镑吧”而不显得十分荒诞离奇。

这时我们已来到了19世纪早期，这儿，我首次发现有几个书架格板完全由妇女的作品占据了。然而在我浏览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不禁要问，为什么除了极少的例外，这些作品全都是小说？须知最初的冲动是创作诗歌的冲动，“歌曲的最高领袖”是一位女诗人。不论是在法国还是在英格兰，女诗人都先于女小说家。除此之外，当我看着那四个著名的名字时，我又想到，乔治·艾

---

① 《米德尔马奇》是乔治·艾略特的作品，《维莱特》是夏洛蒂·勃朗特的作品，《呼啸山庄》是艾米莉·勃朗特的作品。

② 即伊丽莎白·卡特（Elizabeth Carter，1717－1806），18世纪有名的女学者，精通多种语言。

略特与艾米莉·勃朗特有何相似之处？难道夏洛蒂·勃朗特不是完全不能理解简·奥斯汀吗？除了她们都没有孩子这个可能相关的事实之外，在一个房间里相聚的任何四个人简直是不可能比她们更不相同了——以至于虚构她们之间的一场会晤和对话成了颇具吸引力的事。然而却由于某种奇怪的力量，当她们写作的时候，她们都不得不写小说。我问道，这是否与出生于中产阶级有关；是否与艾米莉·戴维斯小姐稍后一些时候如此引人注目地揭示出来的下列事实有关，即19世纪早期的中产阶级家庭成员只拥有一个起居室？如果一位妇女写作，她就得在公用的起居室里写。而且，诚如南丁格尔所强烈抱怨的那样，"妇女从未有……能称之为属于自己的半个小时"——她总是被打断。虽说如此，在客厅写散文和小说还是比写诗歌或者戏剧容易，因为不需要那么集中精力。简·奥斯汀一直到生命的结束都是这样写作的。"她能完成所有这一切，"她的侄子在回忆录中写道，"真是令人吃惊，因为她没有单独的书房可去，大多数工作须在共用的起居室里完成，受制于各种各样偶然的打扰。她小心翼翼，不让仆人或客人以及任何家庭成员之外的人猜到她所从事的活动。"[1]奥斯汀把手稿藏起来，或用吸墨纸将它们盖住。再者，在19世纪早期一位妇女所获得的全部文学训练，均在于对性格的观察和对情感的分析。几个世纪以来，她的情感一直受到公用起居室种种影响的教化。人们的感情给她以深刻的印象，个人的关系始终展现在她的眼前。因而，当中产阶级妇女开始写作时，她自然就写小说，即使这儿所谈到的四位著名妇女中的两位就其本性而言似乎显然并非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本来应该写诗剧，而当创作的冲动被用于历史或传记时，乔治·艾略特头脑中横溢的才思就可得以施展。然而，她们写了小说；我把《傲慢与偏见》从书架上取下

[1] 《简·奥斯汀回忆录》，作者为她的侄子詹姆斯·爱德华·奥斯汀-利。——原注

来，说，人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说她们写了优秀的小说。我们可以说《傲慢与偏见》是本好书，而不至于显得在吹牛或者给另一性别带来痛苦。无论如何，在写《傲慢与偏见》时被他人偶然撞见，是不应该感到羞愧的。然而令奥斯汀感到高兴的是，门的铰链会吱嘎作响，这样她可以在别人走进门以前，把手稿藏起来。在奥斯汀看来，写《傲慢与偏见》有某种不光彩之处。我很想知道，若是简·奥斯汀并不觉得有必要把她的手稿藏起来不让客人看到的话，《傲慢与偏见》是否会成为一本更为精彩的小说？我读了一两页，察看了一下，但却不能发现有任何迹象说明她的境遇曾对她的作品产生了任何程度的伤害。这也许就是其中主要的令人惊异之处。这一位妇女大约在1800年前后从事写作，没有仇恨，没有辛酸，没有恐惧，没有抗议，没有说教。我看着《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心里想，这就是莎士比亚写作的方式。当人们把莎士比亚与奥斯汀相比较时，他们可能是要说明，二者的头脑都把所有的障碍消耗掉了，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就不了解奥斯汀，也不了解莎士比亚；也是由于这个原因，简·奥斯汀渗透在她所写出的每一个字中，莎士比亚亦然。如果说奥斯汀因其境遇而蒙受了任何损失的话，那就在于强加在她身上的狭窄的生活。一名妇女不能独自出门。她从未单独旅行过，从未乘公共马车穿过伦敦，或独自在一家店铺里吃午饭。不想要自己没有的东西，也许正是简·奥斯汀的天性。她的天赋和她的境遇达到了完全的和谐。不过我怀疑，夏洛蒂·勃朗特就不是这样，我说道，同时打开了《简·爱》，并把它放在《傲慢与偏见》的旁边。

我打开该书的第12章，目光被下面的措辞吸引住了："谁爱责备我就责备我吧。"我想知道，他们责备夏洛蒂·勃朗特什么呢？我读到，菲尔费克斯太太在做果冻的时候，简·爱往往爬上屋顶，俯瞰着远处的田野。她渴望——他们正是因此而责备她——

这时候，我渴望有一种能超出那个极限的眼力，让我看到繁华的世界，看到我听说过、却从未见过的城镇和地区。这时候，我希望自己有比现在更多的实际经验，比现在更多地同跟我同类型的人交往，比在这里更多地接识各种性格的人。我珍视菲尔费克斯太太的善良，珍视阿黛勒的善良；但是我相信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些更有生气的善良的类型，我希望亲眼看看我所相信的东西。

谁责怪我呢？毫无疑问，一定有很多人；人家会说我不知足。我没有办法；我生来就不能安静；有时候，这使我很苦恼……

说人们应该对平静感到满足，这是徒然的；人们总得有行动；即使找不到行动，也得创造行动。千百万人被注定了要处在比我更加死气沉沉的困境中，千百万人在默默地反抗自己的命运。谁也不知道。在充斥世界的芸芸众生中，除了政治反叛以外，还掀起了多少其他的反叛。女人一般被认为是极其安静的，可是女人也和男人有一样的感觉；她们像她们的兄弟一样，需要运用她们的才能，需要有一个努力的场地；她们受到过于严峻的束缚、过于绝对的停滞，会感到痛苦，正如男人感到的一样；而她们的享有较多特权的同类却说她们应该局限于做做布丁、织织袜子、弹弹钢琴、绣绣口袋，那他们也未免太心地狭窄了。如果她们超出习俗宣布女人所必需的范围，去做更多的事、学更多的东西，他们因而就谴责她们，嘲笑她们，那也未免太轻率了。

我这样一个人呆着的时候，并不是不常听到格莱斯·普尔的

笑声……[1]

这是一个难堪的中断，我想。突然碰上格莱斯·普尔，真令人不安。连续性被打断了。我把这本书放在《傲慢与偏见》的旁边，继续想，人们可能会说，写出这些书页的那位女人有比简·奥斯汀更多的天才，但是如果把这几页仔细阅读一下，注意到它们包含的那种激烈、那种愤慨，就会看到，她永远也不会把她的天才完完全全地表现出来。她的书将会是变形的，扭曲的。在本应该平静地写的时候，她却在盛怒中写作；在本应该明智地写的时候，她却愚蠢地写作；在本应该写笔下的人物时候，她却写她自己。她在与她的命运作战。她除了受压制，被挫败，英年早逝，又能如何？

人禁不住暂时要玩味一下下述想法，即倘若夏洛蒂·勃朗特一年有比如 300 英镑的话，那又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但是这个愚蠢的女人当即就以 1500 英镑的价格把她的小说的版权卖掉了——倘若夏洛蒂·勃朗特拥有更多的有关这个忙碌的世界、有关充满生机的城镇和地区的知识，倘若她有更多的实践经验，与她的同类有更多的交往，并更多地结识各种各样性格的人，那又可能会发生什么呢？在说出那些话的时候，她不仅精确地指出了她本人作为小说家的弱点，而且也精确地指出了那时全体女性的弱点。她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倘若她的天才不是耗费在孤独地眺望远方的田野，倘若赐予她经验、交游以及旅行的话，她的天才就会得到多么巨大的增益。但是并没有赐予她这些，相反却拒不给她机会。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即所有这些优秀的小说——《维莱特》、《呼啸山庄》、《米德尔马奇》——系由妇女写出，其阅历并不超过一位可敬的神职人员的家庭所可能有的经验。她们在家庭的公用起居室里写作，而且又是如此之穷，一次

---

① 《简·爱》，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年版。

只不过能买得起几刀纸，用以写《呼啸山庄》或者《简·爱》。固然她们当中有一位，也就是乔治·艾略特，在经过多方磨难之后得以逃脱了，但也不过是逃进圣约翰森林一座僻静的别墅而已。在那儿，她在世人非难的阴影中安顿了下来。“我希望人们会理解，”她写道，“他们若不要求，我将不会要求他们来看我”；因为，难道她不是与一位有妇之夫一起生活在罪恶之中，不是瞥她一眼就会伤害史密斯太太或者任何一位碰巧被称之为史密斯太太的人的贞节吗？必须向社会惯例屈服，并且“与世隔离”。而同时，在欧洲的另一侧，有一位青年正自由地与这位吉卜赛人或那位贵妇生活在一起，在当兵，在不受妨碍、不被挑剔地获得多彩多姿的人生经验。而当后来他开始写书的时候，这经验也就给他提供了极其出色的素材。我想，倘若托尔斯泰与某位已婚的女士隐居在小修道院里，“与世隔离”，那么，不管其道德教训是多么给人以启迪，他也难以写出《战争与和平》。

或许可以稍微更深入地探讨一下小说写作以及性别对小说家的影响。如果人闭上眼睛，把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来予以考虑的话，那么小说似乎就是一个与生活有某种镜像般相似处的创造物，尽管自然带有无数的简化和歪曲。不管怎么说，它都是某种在精神的目光中留下的一个形体的结构，时而成方块状，时而成宝塔形，时而伸展出侧翼和拱廊，时而就像在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一样坚固紧凑而又带有穹顶。回想起几部著名的小说，我想，这形体把我们身心中与之相适应的情感给激发起来了。但是这情感又立即与其他的情感混在一起，因为那“形体”并非由石头与石头之间的关系构成，而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这样一来，小说也就在我们身上把各种各样对抗的和对立的情感给激发起来了。生活与某种并非生活的东西相冲突。由此，有关小说也就难以达到一致的意见，私人的偏见也就在极大的程度上支配了我们。一方面，我们感到，你——主人公约翰——必

须活着，否则我将陷于深深的绝望之中。但另一方面，我们感到，哎呀，约翰，你必须死去，因为书的形式要求如此。生活与某种非生活的东西相冲突。那么既然它在某种程度上是生活，我们也就把它当作生活加以判断。有人说，詹姆斯是我最厌恶的那种人。或者，这是一种荒诞的大杂烩。我本人则从未能有任何这种感觉。回想任何著名小说，显而易见，其整体结构是无限复杂的，因为它是由如此众多的不同的判断构成，是由如此众多的不同的情感构成。令人惊异的是，一本这样撰写出来的书竟能够不止一两年保持整体性，它的意义，对英国读者、俄国读者或中国读者来说居然有可能是同样的。但是它们偶然确实是非常显著地保持了完整。在这些罕见的长存的例子中（我想到了《战争与和平》），使它们得以保持完整的，是某种被人称之为忠正（integrity）的品性，尽管这里指的不是不拖欠或在非常时刻举止高尚。就小说家来说，所谓忠正，也就是他给人以这就是真相这一信念。是的，人们感到，我绝不会想到竟是如此；我不知道人的举止竟能是那个样子，但是你却使我相信它确是如此，它是这样发生的。人在阅读的时候，把每一个短语、每一个场景带到一道灵光的面前——因为，非常神奇，造化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道内在的光，我们凭借着这道光来对小说家的完美无缺或一无可取作出判断。或者也可更精确地说，造化在处于最非理性的状态时，用隐形的墨水在精神的墙壁上勾勒出了将由伟大的艺术家来证实的某种预兆。这是一个草图，只要把它带到天才的火焰面前它就会被人们看见。人在使它这样显露出来并看见它苏醒时，就会欣喜若狂地欢呼起来：这就是我始终感觉、知晓并渴望的东西！我们兴奋不已，而且带着敬畏合上书，好像它是某种非常珍贵的东西，好像只要人活着就可不断地向它寻求支持，这时我们就把它放回书架，我这样说道，拿起《战争与和平》并把它放回原地。而另一方面，如果人们抽出来并予以检查的那些可怜的字

句先以其鲜明的色彩和炫耀的姿态激起迅速而又热切的反响，却又只限于如此，似乎有某种东西阻碍了它们的发展；如果它们只是把角落中的某个模糊的潦草字迹和那边的一个污渍暴露出来，而并无完整的事物出现，我们就发出叹息，并且说道，又是一个失败。这部小说已在某个地方出了岔子。

而绝大部分小说确是在某个地方出了岔子。想象被滥用，不堪重负。洞察力被搞得迷乱，再不能分辨真假，再也不能继续进行那种时刻要求使用众多不同才能的艰巨劳动。但是，看着《简·爱》和别的书，我思忖着，小说家的性别又怎样影响所有这一切呢？难道性别会以任何方式妨碍女小说家的忠正——那种被我看做是作家的支柱的忠正品性吗？在我从《简·爱》中所引用的片段中，愤怒显然损害了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的忠正。她离开了她本应完全专心致力的故事，转而描述某些个人的不平。她记起被剥夺的本应享有的经验——她被塞在一个教区牧师的住所补袜子，从而失去活力，而她渴望的却是自由地在世界上漫游。她的想象因义愤而偏转，而且我们感觉到了它的偏转。除了愤怒之外，还有许多别的影响在牵扯着她的想象，是它从其轨道上偏离开去。例如无知。罗彻斯特的画像是在暗昧中绘出的。我们在其中感觉到恐惧的影响，正如我们不断地感觉到，有一种由压迫造成的刻薄，有一种郁积在她的激情的下面闷烧着的痛苦，有一种使那些书发生痉挛阵痛的积怨，尽管那些书是出色的。

既然小说与真实生活有这种对应性，那么小说中的价像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真实生活的价值。但是显然，妇女的价值观经常与另外一种性别的人所制造出来的价值不同，这是很自然的。然而占上风的却是男性的价值观。粗略地说，足球和体育是“重要的”，而对时装的崇拜和买衣服则“微不足道”。而且这些价值观念必然从生活转移到小说。批评家断定某书重要，因为它写的是战争；某书无足轻重，因为它写的是在起居室里女人的感情。战

场上的场景比商店里的场景重要——价值的区别到处可见，而且那区别又愈加细微。对女人而言，19世纪早期小说的整个结构是由这样一种头脑建立起来的，它被稍许拉离正直之道，又因遵从外部的权威而改变了其清晰的眼光。只需浏览一下那些已被忘却的旧时的小说，并且倾听一下小说的调子，就可看出，作家遇到了批评，她时而挑衅、时而取悦的文辞披露了这一点。她在承认她"只不过是个女人"，或者在申明她"就像男人一样优秀"。她按照她的性情的指引迎接批评，或者温顺羞怯，或者愤怒高声。到底是怎样并无关紧要，问题是她在想艺术自身之外的某些事情。她的书落在了我们的头上。书的中心有个瑕疵。于是我想到了所有那些散见在伦敦旧书店里的女人写的小说，它们有如散落在果园中的有疤瘢的小苹果。正是中心的那个瑕疵使它们腐烂了。她已遵从别人的意见而改变了自己的价值观。

但是若要她们丝毫不向右或向左移动，又是多么地难啊。在纯父权制社会当中，面对所有那些批评，要坚持她们的见识而不退缩，需要怎样的天才、怎样的忠正品格啊。做到这一点的，只有简·奥斯汀，还有艾米莉·勃朗特。而这是她们的又一个可自豪的成就，也许是最好的成就：她们像女人那样、而不是像男人那样写作。在当时写小说的上千名妇女当中，只有她们完全不顾那永恒的教师爷的重复不停的告诫——该写这个，该想那个。只有她们对那重复申说的声音充耳不闻，它时而抱怨、时而高高在上，时而盛气凌人，时而悲痛，时而震惊，时而愤怒，时而像叔伯长辈，那声音不肯让女人安生片刻，就像某位过于尽职的女教师一样纠缠她们，就像埃杰顿·布里奇斯爵士[1]一样，恳请她们

[1] 疑指撒姆尔·埃杰顿·布里奇斯爵士（1762－1836），英国作家，在传记写作上有所成就。

文雅一些；甚至把对性别的批评拖进对诗歌的批评中去；[1] 并劝诫她们，若要举止得体并赢得某种闪闪发光的奖赏的话，那就得——我猜想——呆在上述绅士认为合适的某些范围之内："……女性小说家应该只是通过勇敢地承认她们性别的局限，来追求卓越。"[2]这也就把事情简明扼要地说清楚了，而如果我告诉你们，这句话并不是于1828年8月而是于1928年8月写的，当令你们颇为吃惊吧。我想你们会同意，不管现在这句话是多么讨我们喜欢，在一个世纪以前它都代表着更为有力、更坦率直言的一派强大的意见——我并非想翻这些旧账，我只不过是抓住飘在我脚边的机会。若是一位青年女性在1828年能无视所有那些冷落、责骂以及关于奖励的许诺，她必须非常刚毅才行。一个人必须几乎是个煽动作乱者，才能够对自己说，哎，不过他们总不能把文学也买了去。文学是向每一个人敞开大门的。尽管你是教区差役，我也不许你禁止我走进草地。你要是乐意你尽可以把你的图书馆关闭，但你却没有门、锁或门闩，可以禁锢我自由的精神。

不管阻碍和批评对她们的创作有什么影响——我相信它们的影响非常巨大，但与当她们着手将自己的思想付诸笔墨时所面对的其他困难相比（我仍然在考虑那些19世纪早期的小说家），这影响就不重要了。所谓其他困难，就是说她们的背后没有传统，或者说传统是如此短暂而又不完整，结果无甚助益。须知如果身为女人的话，我们就只能通过母亲来思考过去。不管我们能在伟大的男作家那儿找到多少乐趣，若想到他们那儿寻求帮助却是毫

---

① "（她）具有一种玄学的目的性，而这是一种摆脱不了的危险的执著，对妇女来说尤其是如此。因为妇女很少拥有男人对修辞的健康的热爱。这发生于在别的事上更为原始、更为唯物的性别身上，实为一种奇怪的欠缺。"引自《新标准》，1928年6月号。——原注。

② "如果你就像那位记者一样，认为女小说家应该只是通过勇敢地承认她们性别的局限，来追求卓越，（简·奥斯汀［已］表明能够多么优美地做到这一点）……。"引自《生平与书信》，1928年8月号。——原注

无收获。兰姆、布朗、萨克雷、纽曼、斯特恩、狄更斯、德·昆西——不管是谁——尚从未帮助过一位妇女，尽管她可能会学了他们的几个技巧，并加以利用。男人头脑的分量、速度和步幅与她本人的情况太不相像，使她难以成功地从他那儿挖掘出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效颦者离得太远了，难以亦步亦趋。也许当她把笔置于纸上时，她发现的第一件事，就是并无可供她使用的公用的语句。所有伟大的小说家，如萨克雷、狄更斯、巴尔扎克，都写一种自然的散文，灵敏而不马虎，富于表现力而不矫揉造作，具有他们自己的色彩而又不失为公共财产。他们以当时流行的语句为其散文的基础。19 世纪初流行的句子也许多少是这个样子："他们的作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其中的一种立论，它并不突然停止，而是不断延伸。除了砥砺艺术以及不断产生真与美之外，他们不可能有更高的激动或满足。成功激发人努力，而习惯则促进成功。"这是男人的语句，在它背后人们能够看见约翰生、吉本和其他的人。它不适于妇女使用。夏洛蒂·勃朗特尽管具有出色的散文天才，却也由于手持笨拙的武器而绊跌摔倒。乔治·艾略特因此所铸成的舛误，笔墨难以形容。简·奥斯汀则看着它，嘲笑它，而且设计出一种适合于她自己使用的完全自然美观的句子，并从未偏离。这样，尽管她的写作天才逊于夏洛蒂·勃朗特，她却说出远为更多的东西。确实，既然自由而又充分的表达是这门艺术的精髓，那么这种传统的欠缺，这种工具的不足和不适用，就一定对妇女的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外，一本书并不是由首尾相接地排列在一起的句子组成，而是由被建成拱廊和穹顶（如果这意象有助的话）的句子组成。而这个形态也是由男人出于自己的需要、为自己的使用而造成的。没有理由认为，史诗或者诗剧的形式比语句更适合于妇女。但是当妇女成为作家时，所有旧的文学形式已根深蒂固，固定难变了。只有小说尚年轻，运用起来还柔软可塑——也许这是她之所以写小说的另外一个原

因。然而迟至今日有谁能说“小说”[①]（我用引号把这个词引了起来，以表明我认为该词是不当的），这个所有的形式当中最易驾驭的形式已被塑造得适合她使用了呢？毫无疑问，当她能够自由地使用她的四肢的时候，我们将看到她把小说敲打成形，并且为她身心中的诗意提供某种不一定采用诗韵形式的新的表达工具。因为得不到宣泄的，恰恰是诗情。我继而默想，现在一位女性会怎样写一部五幕诗悲剧，是用韵文，还是宁可用散文？

但是这些是伏在未来晨曦中的困难的问题。我必须离开它们，哪怕仅仅因为它们使得我偏离开我所讨论的话题，而进入我将会迷失道路并极有可能会被野兽吞掉的荒无人迹的森林。我并不想开始讨论那个极令人沮丧的话题，即小说的未来，而且我相信你们也不想让我开始这种讨论，因而这儿我只暂停片刻，请你们注意就妇女而言物质状况在未来所一定会起到的重大作用。书必须多少与身体相适应，因而也就可以贸然地说，女人的书应该比男人的书短，也更为浓缩，并且其构造适合于女性，从而不需要长时间的不中断的持续工作就可完成。须知总是会有打扰的。还有，给思想提供滋养的神经似乎男女也有不同，你若欲使神经工作得最为出色、最为努力，你就必须搞清楚怎样处理才适合于它们——例如，据说是数百年前由僧人所制定出的授课时间是否适合于它们；它们需要什么样的工作与休息的更替安排，如果不将休息阐释为无所事事，而是在做某事，某种不同的事；而那不同又应该是怎样的呢？这一切都应被讨论，被发现，这一切都是妇女与小说的问题的一个部分。然而，当我再次走近书架的时候，我又想到，我将从哪儿找到由妇女写出的对妇女心理所做的那种翔实的研究呢？如果由于妇女没有能力踢足球，就也不被允许行医的话——

① 小说（（novel）在原文中有“新”之意。

幸运的是，我的思绪现在又转向了另一个问题。

第五章

在这样信步闲逛的过程中，我最后来到了放着在世作家作品的书架面前，那是女人和男人写的书，因为现在女人写的书几乎就像男人写的书一样多。或者如果说这并非十分真实，如果说男人仍然是善于辞令的性别，那么至少毫无疑问的是，女人不再仅仅是写小说而已了。有简·哈里森的希腊考古学著作，有弗农·李[1] 的美学著作，有格特鲁德·贝尔[2] 的波斯游记。有论及所有种类的课题的著作，而一代人以前还没有一个女人能够有所涉足。有诗集、剧本和批评著作，有史书、传记、游记以及种种有学术性和研究性的著作，甚至还有几本哲学著作、自然科学著作和经济学著作。尽管小说占绝大多数，但小说自身由于与完全不同的书籍产生了联系，也就大有可能已有了变化。那种自然的单纯——也就是妇女写作上的史诗时代，可能已经成为过去。阅读与批评可能已给予妇女一个更宽的领域，一种更大的深奥之处。那种想写自传的冲动可能已经用尽了。她可能已开始把写作用做一种艺术，而并非自我表现的方法。在这些新小说当中，人们可能会找到对几个这样的问题的答案。

我随便地在它们当中取下了一本。它立在书架的最末端，书名是《人生的冒险》之类的题目，是玛丽·卡迈克尔写的，而且就是在这个10月里出版的。它似乎是她的第一本书，我对自己说道，不过人们必须把它当成一套相当长的丛书的最末一本来

---

① 弗农·李（Vernon Lee, 1856－1935），原名维奥莱特·佩吉特，英国女散文作家。

② 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 1868－1926），英国女旅行家。晚年在巴格达创立考古博物馆。

读，它是我一直在浏览的所有那些别的书的继续——温奇尔西夫人的诗集、阿弗拉·贝恩的剧作，还有四大小说家的小说。须知尽管我们习惯于把书分别来予以评论，但书是相互继续的。因而我也必须把她——这位不出名的女人——看做所有那些别的女人的后裔，我一直在瞥视着她们的境况，现在要看看她从她们身上继承了什么特征和束缚。因而，我坐了下来，拿着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铅笔，看看我从玛丽·卡迈克尔的第一部小说《人生的冒险》中能了解些什么。我叹了口气，因为小说所提供的往往是一副镇痛剂而不是解毒剂，它使人渐渐陷入麻痹的睡眠之中，而不是用燃烧的烙铁把人惊醒。

首先，我把这一页从上到下匆匆看了一下。我说，我要先领会她的句子的意义，然后再去记什么蓝眼睛、棕眼睛，以及在克洛伊和罗杰之间所可能存在的关系。我得先认定她手中拿的是钢笔还是丁字镐，然后才能有功夫管那些事。因而我就试着念了一两个句子，很快就显见有点什么不够妥当。句子与句子之间流畅的滑动被打断了。有的东西在撕裂，有的东西在发着刮擦声；这儿一个字、那儿一个字像火把一样在我的眼前闪现。就像人们在旧剧本里所说的，她是在“使自己获得自由”。她就像一个划着一根划不着的火柴的人，我想。可是为什么简·奥斯汀的句子对你就不适宜呢？我问她，就好像她就在面前一般。难道因为爱玛和伍德豪斯先生[①] 死了，她的那些句子就必须被抛弃吗？居然会是这样，真是令人惋惜，我叹息道。须知奥斯汀好像是写出一个又一个的优美的旋律一般，就像莫扎特写出一首又一首的歌曲一样，而读这本书却像乘一条无甲板的小船出海一般。人忽而升了上去，忽而沉了下来。这样的行文简洁，这样的简短扼要，或许会意味着她惧怕某个东西，也许是惧怕被称之为“感伤”，要

① 爱玛和伍德豪斯先生均是奥斯汀小说《爱玛》中的人物。

不然就是她记得妇女的作品被人说是辞藻华丽，因而就加上了并非必需的棘刺进去。但是等到我略微仔细地读完一节之后，我无法搞清楚她究竟是她本人还是别的人。我更仔细地读了一下，想到，无论如何，她并没有降低人的生命力。但是她却把太多的事实堆积了起来。在这么大部头的一本书里，她连那些事实的一半都用不完（此书大致是《简·爱》篇幅的一半）。然而，她却得以以某种方法把我们所有的人——罗杰、克洛伊、奥莉维亚、托尼和比格姆先生——装进一只独木舟里，朝河的上游行进。等一下，我在椅子里后仰着说道，我得把整部作品更仔细地看一下，然后方可更进一步。

我对自己说，我几乎可以断定，玛丽·卡迈克尔是在开我们的玩笑。我的感觉，就像人在铁路的之字爬坡路线上那样，本来以为车厢会降下去，但车厢却一个急转弯升了上来。玛丽是在搅乱那个预期的顺序。她先是破坏了句子的格局，现在她又破坏了顺序的格局。那好吧，她尽可以这么做，只要她这么做的目的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创造。不过一直要到她写出一个复杂紧要的情节之时，我才能够确定他究竟是在破坏还是在创造。我说，我将给她以选择那将是何种情节的一切自由，只要她愿意，她满可以用马口铁罐头和旧水壶来制造出那个情节，但是她必须使我信服，她相信那是一个复杂紧要的情节，而且当她把这个情节制造出来时，她就必须面对它。她必须跳跃。我决定对她尽我作为读者的责任，只要她对我尽到作为作者的责任，因而我翻到了一页，读着……对不起，我这么突兀地中断了。是不是没有男人在场？你们能向我保证，在那边那个红帷幔的后面并没有藏着查特里斯·拜伦爵士的身影吗？你们能向我担保我们都是女人吗？那么我就可以告诉你们，我下面读到的话就是——“克洛伊喜欢奥莉维亚……”不要吃惊，不要脸红。容我们在私下的社交圈子里承认，这些事情有时是会发生的。有时女人确实喜欢女人。

"克洛伊喜欢奥莉维亚"，我读着，然后又突然想到，这儿有一个多么大的变化。克洛伊也许是在文学史中第一次喜欢奥莉维亚。克娄巴特拉并不喜欢屋大维娅，而倘若克娄巴特拉喜欢屋大维娅的话，那么《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就会完全变了个样[①]。我让我的思维稍微偏离开《人生的冒险》，想到，就照这个样子，如果人敢于把它说出来，那么恐怕整个事情也就荒诞地简化了，符合惯例了。在娄巴特拉对屋大维娅所怀有的惟一的情感就是嫉妒。她是不是比我高？她的头发梳成什么样子？也许这部剧作不会需要更多的东西了。但是倘若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的话，那会是多么有趣。我迅速地回想起小说中的那个光彩夺目的妇女群，心中想，在女人之间的所有这些关系都是过于简单了。有这么多东西被遗漏了，未被尝试过。我尽力回想，在我所读过的书中是否有两个女人被展现为朋友。在《十字路口上的黛安娜》[②] 中有过这样的尝试。当然，在拉辛[③] 的悲剧和希腊悲剧中，她们是知己。她们偶尔是母女关系。不过几乎毫无例外表现的都是她们与男人的关系。试想，直到简·奥斯汀的时代之前，小说里的所有伟大女性不仅是由男性来予以理解，而且还只是由与男性的关系来予以理解。而那又是一个女人生活中的一个多么小的部分，而当一个男人透过性区别戴在他鼻子上的黑色的或者玫瑰色的眼睛来予以观察时，他对那个部分的了解又是多么之少。因而也许这就是小说里的女人的独特性质，她的美和可怕都极端得令人吃惊，不是善良得超凡人圣，就是堕落得穷凶极恶

① 克娄巴特拉和屋大维娅均是莎士比亚剧作《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中的人物。屋大维娅是安东尼之妻，后离异。克娄巴特拉是埃及女王，貌美，后与安东尼结婚。

② 《十字路口上的黛安娜》是英国小说家乔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 1828～1909）的一部小说。

③ 拉辛（Jean Baptiste Racine，1639～699），法国剧作家、诗人，法国古典主义悲剧代表作家之一。

——因为一个情人就是依照他爱情的升降沉浮、成功和不幸来这样看待女人。当然，19 世纪的小说家所写的并非完全如此。在 19 世纪的小说中，女人是更为多样也更为复杂。确实，也许正是那种要写女人的欲望，才导致男人们逐渐放弃了诗剧——诗剧由于太狂热，所以能够使用女人之处甚少——而发明出了小说，把它当作一个更为适宜的容器。即使如此，甚至在普鲁斯特[1]的作品中，仍然可以显见男人对女人的认识还是极其受限制的和偏颇的，如同女人对男人的认识一样。

而且，当我低下头再次看着这一页时，我继而发现，除了对家庭生活的长期兴趣之外，妇女如同男人一样，也有别的兴趣。"克洛伊喜欢奥莉维亚。她们合用一个实验室……"我接着读下去，发现这两个年轻的女人正在切猪肝，似乎猪肝是用来治恶性贫血的。不过她们当中有一个人已经结了婚，而且有了两个小孩子——我认为我陈述这一点是正确的。当然，所有这一切都须删掉，而这样一来，小说中女人光彩夺目的肖像也就过于简单，过于单调。例如，假定男人在文学中只被展现为女人的情人，而从来不是男人的朋友、军人、思想家、梦想家，那么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能够分配给他们的角色又该是多么的少，而且文学又是多么的减色！我们也许会有大部分的奥赛罗、相当多部分的安东尼，但却会没有了凯撒、布鲁特斯、哈姆雷特、李尔王、贾克斯[2]——文学就会贫乏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确实，由于朝妇女们关上了大门，文学的贫困已非我们所能估计。她们违心地嫁人，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只有一种职业，这样一来，戏剧家又怎能描写出她们完整的、有趣的或者是真实的形象呢？爱情是惟一

① 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法国小说家，以七卷本的《追忆逝水年华》而名闻世界。

② 这些均是莎士比亚戏剧中脍炙人口的人物。

可能的表达，诗人不得不激情满怀或者满腹辛酸，除非他是故意要"仇视女人"，而这又多半意味着他对女人并不具有吸引力。

如果克洛伊喜欢奥莉维亚而且她们又合用一个实验室，这自身就将使她们的友谊更具有了变化而且也更持久，因为这个友谊不那么涉及隐私；如果玛丽·卡迈克尔知道如何去写而且我又开始欣赏她的风格中的某些性质；如果她有自己的一间屋子，对此我并不太清楚；如果她一年有自己的500英镑收入——不过这还有待于证明，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就认为某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就发生了。

须知如果克洛伊喜欢奥莉维亚而且玛丽·卡迈克尔又知道如何把它表达出来，那么她就会在那间尚未有任何人住过的大屋子里燃起一支火炬。那儿全是柔和昏暗的光线，以及像那些蜿蜒的洞穴似的很深的黑影，人们点着蜡烛走进那些洞穴，上上下下地窥探，不知道自己是走到了哪里。我又开始再次读那本书，读到克洛伊注视着奥莉维亚把一个罐子放在架子上，并且说，她该回家看她的孩子了。我惊叫道，这是一个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人看见过的景象。而且我也是很好奇地注视着。因为我想看一看，玛丽·卡迈克尔是怎样着手抓住那些未被记录下来的姿态、那些未被说出或者未被完全说出的话语，当女人单独呆在一处、没有受到男人变化无常的带有偏见的光芒照耀的时候，那些姿态和话语也就形成了，也许就像天花板上飞蛾的影子一样难以察觉。我往下读着，说道，如果她要这样的话，她就须屏息静气，因为对凡是在其背后没有明显动机的兴趣，妇女都要怀疑，而且妇女又是极其习惯于掩盖和抑制，因而在目光敏锐地朝她们的方向一闪之时，她们就立即离开了。我对玛丽·卡迈克尔说，好像她就在我面前一般，我想，你所要做的惟一的事情，就是谈点别的事情，同时从容地看着窗外，并且这样记下来，并不是用铅笔记在

笔记本里，而是用最迅速的速记，用几乎未用音节表示的词语，去记下来，当奥莉维亚——这个有机体这100万年以来一直呆在那块大石头的阴影下面——感到光阴落在那块大石头的下面，并且看到有一块奇怪的食品给她送了过来，那食品就是知识、冒险、艺术，这时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目光再次从那一页上抬了起来，我想，她伸出手来去拿那食物，并且须设计出她的才智的某种完全新的结合，以便把这新的东西吸收到旧的东西中去，而又并不打乱整体的极为错综复杂而又精巧细致的平衡，须知她的才智已为别的目的而得到了高度的发展。

但可叹的是，我已做了我曾决心不要做的事情，我无意中不动脑子地赞美起我本人的性别来了。"高度的发展"，"极为错综复杂"——这些无可否认是赞美的话语，而赞美自己的性别总是不可信的，往往是愚蠢的。除此之外，在这个情况中，人何以能证明是言之成理呢？人们不能走到地图的面前，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而且哥伦布是个女人，不能拿起一个苹果，说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而且牛顿是个女人，不能朝天空望去，说飞机在头上飞而且飞机是女人发明的。墙上并没有一个刻度可以用来测量女人的确切高度。并没有匀称地刻画着一寸一分的码尺，来用以衡量一位良母的性质，或者女儿的孝心，或者姊妹的忠实，或者家庭主妇的能力。甚至现在，也没有几个女人被分在大学的各个年级里。各种职业的磨难，如陆军、海军、商业、政治、外交，几乎没有试验过她们。此刻她们甚至仍然几乎是无性别的。但是如果我想知道，例如说一个人能够告诉我的有关霍利·巴茨爵士的一切，我只需翻开《伯克氏联合王国贵族谱系录》[①] 和《德布雷

① 《伯克氏联合王国贵族谱系录》（Burke' s Genealogical and Heraldic History of the Peerage, Barontage, and Knightage [London]），由约翰·伯克于1826年编制刊行，是惟一目前仍在出版并能提供全部世系的贵族系谱。

特氏贵族名鉴》[1]，便可知他获得了某某学位，拥有一个府第，有一个嗣子，是某个委员会的秘书，曾任英国驻加拿大大使，并且接受了若干个学位、官职、奖章以及把他的功绩不可磨灭地显示出来的别的荣誉。只有上帝才能对霍利·巴茨爵士了解得比这更多。

因而，当我说妇女“高度发展”和“极为错综复杂”的时候，不论是在惠特克的名鉴、德布雷特的名鉴，还是在高等学校情况一览中，我都无法证实我的话。在这种困境之中我能做什么呢？于是我再一次看着书架，书架上有传记：有约翰生、歌德、卡莱尔、斯特恩、柯珀、雪莱、伏尔泰、勃朗宁以及许多别的人的传记。我开始想到所有这些伟人，他们曾由于某种原因而倾慕过女人、找过女人、与女人共同生活过、向女人吐露过秘密、向女人求过爱、写过女人、信任过女人，并且表现出只能被描述为对异性的某个人的某种需要和依赖的关系。我不敢肯定所有这些关系都纯粹是柏拉图恋爱式的[2]，而且威廉·乔因森·希克斯爵士大概也会否认。但是如果我们坚持说这些杰出的人们从这些联系中除了安慰、恭维和肉体上的快乐之外别无所获的话，那就是大大地冤枉了他们。显然，他们所获得的是他们自己的性别所不能提供的某种东西，而且用不着征引诗人的毫无疑问狂热的话语，便可进一步把它看做只有异性的天赋才能给予的某种刺激、创造力的某种更生，这样来予以界定也许并不太卤莽。我想，他只要打开客厅或者儿童室的门，就会发现她也许正和她的孩子们呆在一起，或者是膝上放着一块刺绣品——无论如何，那是生活的某种不同的秩序或者系统的中心，他本人的那个世界可能会是法庭

---

① 《德布雷特氏贵族名鉴》(Debrett' s Peerage [London])，初版由英国出版家约翰·德布雷特于1903年编纂出版。

② 柏拉图恋爱即精神恋爱。

或者下议院，而在这个世界和他本人的那个世界之间的对照，就会立即使他精神振作，生气勃勃；然后，甚至在最简单的谈话中，就会有令他头脑中干枯的思想又会再次获得肥料的一种自然不同的见解；而且看见她以一种与他本人不同的方法来进行创作，也就会极大地活跃他的创造力，使他贫瘠的头脑再次开始构思，而且他就会找到当他戴上帽子访问她时尚付阙如的那个短语或者场景。每一位约翰生都有他的斯雷尔[1]，并且由于某些像这样的原因而忠实于她，而当斯雷尔嫁给她的意大利音乐教师时，约翰生由于狂怒和厌恶而几乎发疯，这不仅是因为他将不再会有在斯特里特汉姆[2] 的愉快的夜晚了，而且也是因为他的生命之光将会"如同熄灭一般"。

而且用不着是约翰生博士、或者歌德、或者卡莱尔、或者伏尔泰，人也能感觉到在女人当中的这种错综复杂的性质和这种高度发展的创造才能的力量，虽然他的感觉和这些大人物大为不同。人走进房间——但是英语语言的资源须得到很大的滥用，而且词语的整个奔泻需要不合法地飞行着产生出来，然后一个女人才能说得出，当她走进房间时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房间是这样迥然不同，它们或者是安静，或者是如雷鸣一般；或者是面对大海，或者是相反，是通往监狱的院子；或者是挂着洗好的衣服，或者因其乳白玻璃和丝织品而富有活力；或者像马鬃一样坚硬，或者像羽毛一样柔软——人只需走进任何街道里的任何一个房间，便可感到女性的那种极为复杂的力量整个地扑面而来。它怎

① 斯雷尔指赫斯特·林奇·斯雷尔夫人（Mrs. Hester Lynch Thrale，婚前姓Salusbury，1741－1821），斯雷尔夫妇均是塞缪尔·约翰生的密友，曾于1774年和1775年共同游历威尔士北部和法国。斯雷尔去世三年后，斯雷尔改嫁她女儿的音乐教师——意大利歌唱家和作曲家加布里埃尔·皮奥齐（Gabriel Piozzi），约翰生还为此写了一封信。斯雷尔夫人著有《已故塞缪尔·约翰生博士最后20年轶事》等。

② 斯特里特汉姆（Streatham），即斯雷尔夫妇的家庭所在地，有一段时间约翰生呆在这个家里，成为他们家庭生活的一分子。

么会是别的样子呢？须知这几百万年以来妇女一直是坐在屋子里，因而到此刻连墙壁都渗透着她们的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又使得砖瓦砂浆大为负载过重，因而它必须用写作、绘画、商业、政治把自己约束起来。但是这种创造力与男人的创造力又大不相同，而且人们必须得出如下结论，即倘若这种创造力受到了阻碍或者是被浪费了的话，那就会是遗憾之至，因为这种创造力是通过几个世纪的最为严酷的磨难才赢得的，而且没有什么东西能取而代之。倘若女人写作像男人、生活像男人、长得像男人的话，那会是遗憾之至，因为如果两种性别都不太够格，那么考虑到世界的巨大和多样性，我们要是只有一种性别又怎能应付得了？难道教育不是应该带来并且增强区别而并非相似之处吗？因为实际上我们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而且如果有一位探险家回来，带来消息说，有别的性别的人从别的树的树枝当中看着别的天空，那么他就是对人类作出了最大的贡献，而且我们还拥有了那种巨大的欢乐，注视着 X 教授冲过去找他的码尺，以证明他本人是“优越的”。

我仍然在那一页上方的一段距离上逗留着，心想，玛丽·卡迈克尔将只是作为一位观察者来写出她的作品。我真怕她会因诱惑而成为我认为是小说家那一类人中的比较无趣的一派——自然主义小说家，而不是好沉思的小说家。有这么多新的事实要由她来观察。她将没有必要再将自己局限于中上阶级的体面家庭里。她将不必出于仁慈或者纡尊降贵，而是以伙伴关系的精神，走进那些洒了香水的房间里，那里坐着交际花、妓女和抱着哈巴狗的贵夫人。她们现在仍穿着不讲究的现成的衣服坐在那儿，因而男作家必然要拍着她们的肩膀。但是玛丽·卡迈克尔将会把她的剪子拿出来，把衣服修剪得每一个角和凹陷处都合身。当轮到看见这些女人的真实面目时，那会是一个奇特的景象，但是我们必须稍微等一下，因为玛丽·卡迈克尔将仍然会为在“罪孽”面前的

自我意识所累，那种“罪孽”是我们的性野蛮的遗产。她的脚上将仍然戴着古老而劣质的阶级镣铐。

然而，大多数女人并不是娼妓，也不是交际花，而且她们并非在夏天整个下午坐着把哈巴狗紧抱在灰尘覆盖的丝绒上。可是，那么她们做什么呢？于是我的脑子里立即显现出河南岸某个地方的那些长长的街道中的一条街道，那儿无数排的房子里住着无法胜数的人们。我用想象的目光，看见一位非常年老的妇人正在穿过街道，手挽着一位中年妇女，那大概是她的女儿，她们两人都非常得体地穿着靴子和毛皮衣服，因而她们那天下午那一番打扮一定隆重得如同仪式一般，而且那些衣服也一定年复一年在夏天的各个月里是收在柜子里并且放了樟脑。她们穿过街道的时候正是上灯之时（因为她们最喜欢薄暮时分），她们一定年复一年都是这个时候出去。那位年长者差不多有80岁了，但是如果有人问她，她的一生有何意义，她一定会说，她记得那些街道曾为巴拉克拉瓦战役[①]而灯火辉煌，或者听见海德公园为爱德华七世[②]的诞生而鸣炮庆祝。但是如果有人希望能准确地记下日期和季节，于是问她，在1868年的4月5日，或者1875年的11月2日，你在做些什么，她一定会显得茫然，说什么也记不得了。因为她每天都做饭、洗盘子和杯子，送孩子上学，然后送他们走向世界。这一切什么也没有留下，一切都消失了。没有一本传记或者史书对此赞过一词。而小说，则又是毫无例外地说了谎，虽然其本意并非如此。

所有这些无比默默无闻的生命仍有待于记载下来，我说道，

---

① 巴拉克拉瓦战役（battle of Balaklava），1854年10月25日的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一次战役，英法军队与俄军的战斗，此战胜负难论，英国轻武器旅（Light Brigade）损失达40%。

② 爱德华七世（Edward the Seventh，1841～1910），1901～1910年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国王。

是对玛丽·卡迈克尔说话，就好像她在场一般。我继而沿着伦敦的街道思考下去，用想象去感觉那种沉默的压力、感觉未被记载下来的生活的那种累积，这或者是来自那些站在街头巷尾的女人，她们双手叉着腰，戒指深嵌进肥胖臃肿的手指里去，就像莎士比亚词句的韵律一般指手划脚地说着话；或者是来自卖紫罗兰的和卖火柴的女孩子，以及坐在门洞下的干瘪老太婆；或者是来自那些闲逛的女孩子们，她们的脸就像在阳光和乌云下的浪涛一般，标志着男人和女人们的到来，以及商店橱窗的灯光在闪烁。我对玛丽·卡迈克尔说，所有这一切你都须探索，同时你的手要牢固地举着你的火把。尤其是，你必须照亮你本人的灵魂，以及你的灵魂的深刻和浅薄、虚荣和宽宏，并且说出来，你的美丽或者你的平常姿色对你意味着什么，你与那个总是变化而又日新月异的世界有什么关系，那是个手套、鞋子和药品的世界，它们在来自药房的药瓶的淡淡气味当中上下摆动着，那气味又一直来到假大理石地面的卖衣料的拱廊当中。因为我在想象之中走进了一个商店，商店铺着黑白相间的地板，悬挂着的彩色丝带美得惊人。我想，玛丽·卡迈克尔在走过的时候完全可以看上一眼，因为这个景象就像安第斯山脉的任何一个积雪的山峰或者岩石构成的峡谷一样适合于形诸于笔墨。而且还有柜台后面的那个女孩子——我会乐意了解她的历史，就像对待拿破仑的第 150 种传记、或者论济慈及其对弥尔顿式的倒装句法的使用的第 70 种研究论文一样，老 Z 教授之流正在撰写此著作。然后我小心翼翼地继续走着，完全像是踮起脚走（因为我太胆怯了，太害怕曾经几乎打在我肩膀上的那一鞭子），小声说道，她也应该学会不带怨恨地嘲笑男人的虚荣——毋宁说是怪癖，因为这个词不那么令人不快。因为在头的背面有一个先令大小的斑点，自己是永远也看不见的。两性之间能完成而且达到互惠的任务之一，便是描述那个

在头的背面的有一个先令大小的斑点。请想一下，由于玉外纳[1]的评论，由于斯特林堡[2]的批评，妇女获得了多少利益。请想一下，从最早的时代开始，男人们曾用什么样的仁慈和才智，向女人指出了在头背面的那块黑的地方！而如果玛丽是非常勇敢、非常诚实的话，她就会走到男性的背后，并且告诉我们她在那儿发现了什么。在女人把那个一个先令大小的斑点描述出来之前，男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真实图画是永远也不能被画出的。伍德豪斯先生和卡苏阿博恩先生就是那样大小、那样性质的斑点。当然，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怂恿她去有目的地讥消和嘲弄——文学表明，以那种精神而写出的东西是徒劳无益的。人们会说，只要真实，那么结果就一定会令人吃惊地有趣。喜剧性就一定会得以丰富，新的事实就一定会被发现。

然而，现在应该再次看这一页了。最好是不要去猜测玛丽·卡迈克尔会写些什么，应该写些什么，而是看一下玛丽·卡迈克尔事实上写了些什么。因而我又读了起来。我记得，我对她有几点不满之处。她把简·奥斯汀的句子给分解开了，因而也就使我没有机会炫耀我的纯正的趣味、我的爱挑剔的耳朵。因为如果我不得不承认在她们之间并无相似之处的话，那么倘若说，"是的，是的，这很好，不过简·奥斯汀写得比你好多了"，也就毫无用处。然后她又往前走了一步，打破了顺序——亦即预期的顺序。也许她是无意识地做出这一点的，如果她像女人那样写作的话，那么她就只不过是把其自然的顺序给予事物，女人就会这样写。但是其效果却是多少令人困惑，人们看不到有波浪在涌起，看不到有危机行将发生。因而我就不能炫耀我的感情之深刻，我对人心的了解之深邃。因为每当我就要在通常的地方感觉到通常的事

---

① 玉外纳（Juvenal，60？－140？），罗马讽刺诗人。
② 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瑞典戏剧家、小说家。

情时，感觉到爱与死时，那个恼人的家伙就把我猛地拉到一边，就好像那重要的一点就在前面一点儿的地方。这样一来，她就使得我不可能滔滔不绝地说出那些夸张的词句，如“基本的感情”、“人性的普通本质”、“人心的深处”，以及所有那些词句，它们支持了我们的下述信念，即不管我们表面上会是多么灵巧，但在内心我们却是非常严肃、非常深刻而且非常有人情味。而她却相反，使我觉得，人并不是严肃的、深刻的和有人情味的，而是有可能只不过是思想懒惰，而且还因循守旧——这个想法实在太不具有魅力了。

但是我继续读下去，并且注意到某些别的事实。她决非“天才”——这是显而易见的。她并不拥有她的前辈的那种对大自然的爱、那种火一般的想象力、那种无羁的诗情、那种横溢的才华、那种沉思的智慧，那些前辈有温奇尔西夫人、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简·奥斯汀和乔治·艾略特；她不能用多萝西·奥斯本的音乐美和庄严来写作——实在说来，她只不过是个聪明的姑娘，她的书将毫无疑问在十年后被出版商化为纸浆。然而，尽管如此，她却拥有某些优势，而天赋大得多的女人甚至在半个世纪以前还欠缺这些优势。对她来说，男人不再是“反对派”了，她用不着浪费时间去抱怨他们，她用不着爬上房顶，并因为渴望旅行、渴望获得经历和拒不给予她的有关世界和人的性格的知识，而毁掉她平静的心境。在她对男性的处理中，恐惧和仇恨几乎都消失了，或者说恐惧和仇恨的痕迹只是在对自由的欢乐的轻像夸张中表达了出来，这是一种趋于刻薄反讽的倾向，而不是趋于浪漫精神的倾向。因而可以说，作为一个小说家，她毫无疑问拥有某些高层次的自然的优势。她有着一种非常广泛、非常热烈而且非常自由的感受性。这感受性对几乎察觉不出的触及都作出反应，它就像一株刚刚站立在空气中的植物，尽情享用着所不期而遇的每一个景象和声音。它也非常微妙、非常奇怪地伸

展在未知的和未被记载下来的事物当中。它注意到小事情，并且表明，也许它们一点儿也不小。它把被掩埋的东西又发掘了出来，并且使得人们纳闷，当初有什么要掩埋的必要。她写得累赘，而且并没有意识到她承担着悠久的传统，那种传统使得萨克雷和兰姆一摇钢笔便写出令人快乐的文字，但尽管如此，我却认为，她已经学会了这伟大的第一课；她像一个女人那样写作，但又是像一个忘记了自己是女人的女人那样写作，结果她的书里充满了那种只有在性别并未意识到自身时才出现的奇特的性别特征。

所有这一切都是好的一面。但是她必须用转瞬即逝的和个人的东西建造出那个仍未被丢弃的持久的大厦，否则不管有多少感受性和细腻的感知都无济于事。我已经说过，我要等着"一个复杂紧要的情节"摆在她本人的面前。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要等着她通过召唤、示意和聚集，证明她并非仅仅是表面的浏览者，而且还朝下看到了深处。在某个时刻她会对自己说，现在就是不用像出任何激烈的举动，我便能把所有这一切的意义表明出来的时候了。而且她就会开始——那种加快又是何等明白无误——开始示意和召唤，于是在记忆中就会出现那些几乎已被忘掉的、在别的章节里被遗漏掉的也许是非常琐碎的事情。而且她就要在某个人做针线活或者抽烟斗时，让这些事情尽可能自然地亮相，而且当她继续写作的时候，人们就会感到，自己就好像来到世界的顶端一般，并且看见这个世界在下面非常壮丽地伸展开来。

无论如何，她是在尝试。当我注视着她持续地做着这个实验的时候，我看见了，不过却希望她并没有看见，那些主教们和教长们、博士们和教授们、族长们和教书先生们都朝她喊出警告和忠告。你不能这样做，你不得这样做！只有研究员和学者才可走在这个草地上！女士们没有介绍信不得人内！有抱负、优雅的女小说家们这边来！他们就是这样缠住她不放，就像赛马场上栅栏边的人群一样，现在就看她能否不用左顾右盼就跳过栅栏去。如

果你停下来去咒骂，你就失败了，我对她说道；如果你停下来大笑，你也同样失败了。你如果犹豫或者摸索，你也就毁灭了。你只是想着要跳跃，我恳求她，就好像我把我所有的钱都押在她身上一般，而她就像一只鸟一样飞了过去。可是在前面有一道栅栏，而且在那前面还有一道栅栏。她是否有那种耐力，我颇为怀疑，因为掌声和喊声令人神经紧张。不过她是尽力而为了。鉴于玛丽·卡迈克尔决非天才，而只不过是一个不出名的女孩子，在她的卧室兼起居室里写作她的第一本小说，那些有利的东西，如时间、金钱、闲情逸致，都不够用，因而我想，她做的也算是差强人意了。

我读着最后一章——人们的鼻子和赤裸裸的肩膀在繁星点点的天空下面完全显露了出来，因为有人已把客厅里的窗帘给拉开了——同时得出结论：如果再给她100年的时间，如果给她一间自己的屋子和一年500英镑的人款，如果让她把她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并且把她现在已写进去的东西删掉一半，那么有一天她就会写出一本更好的书来。我把玛丽·卡迈克尔《人生的冒险》放在书架的一端，同时说道，再过100年，她就会成为一位诗人。

第六章

第二天，10月清晨的光线以一条条灰尘弥漫的太阳光柱，从没有遮上窗帘的窗子里照射了进来，街上传来了车辆行人的嘈杂声。此刻伦敦又兴奋了起来，工厂骚动了起来，机器开动了起来。读了半天书之后，就忍不住要朝窗外望去，看一看在1928年的10月26日的上午，伦敦在做些什么。那么伦敦在像什么呢？好像并没有人在读《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看来伦敦对莎士比亚的戏剧是全然漠不关心。对于小说的未来、诗歌的死亡或者一个寻常女人去创造一种能完全表达她的思想的散文风格，谁都是毫不在乎——我并不责怪他们。如果有关这些事情的任何一项意见被用粉笔写在人行道上，谁也不会弯下腰去读。无动于衷

的匆忙的脚步在半个小时之内就会把它们擦掉。这儿来了一位供差遣的童仆，那儿一个女人用皮带拴着狗。伦敦街道的迷人之处就在于，绝无两个人相像；每个人都似乎定有他的某件私事要做。有那些带着小皮包办事认真的人，有那些用手杖把庭院栏杆敲得格格作响的流浪汉，有那些把街道用做俱乐部聚会室的亲切友善的人，他们和车上的人打招呼，不用人问便告诉人家消息。还有人在出殡，这使人们突然想起他们自己有一天也会死，于是他们便朝送葬的队伍举帽致意。然后有一个气度不凡的绅士从台阶上缓步走了下来，为了避免与一位匆忙的女士相撞又停下了脚步，那女士不知用什么办法搞到了一件华贵的皮上衣和一束帕尔马[1]紫罗兰。他们似乎都各不相关，自我专注，忙着自己的事。

在这个时候，行人车辆全都安静下来，暂时停止了，这种情况伦敦经常出现。街上什么也没有，无人通过。一片叶子从街头的那棵悬铃木树上脱落下来，并且在那个平静和暂停中落了下来。不知怎的，它就像是一个信号在落下，是一个指出了人在事物中所视而不见的一种力量的信号。它似乎是指向一条河流，那条河流隐而不见地流过街道的拐角，沿着街道流去，把人们卷了起来，使之随波逐流，就像牛津和剑桥的那条河把船上的大学生和死去的树叶带走一样。现在它带着一个穿着漆皮皮鞋的姑娘从街的一侧斜穿过马路，然后又带着一个身穿褐紫色大衣的青年男子穿过马路，它还带来一辆出租车。它把这三者全都带到直接在我窗下的一个地点，出租车停了下来，那个姑娘和那个年轻人停了下来，他们钻进出租车，然后出租车静静地开走了，就好像被水流冲到别的地方一般。

这个景象实在是司空见惯，奇怪之处在于，我的想象力赋予了它一种有韵律的秩序，以及下述事实，即两个人钻进出租车这

---

[1] 帕尔马（Parma），意大利北方城市。

一寻常景象会有一种力量，能将他们自己的似乎的满足多少传达出来。我注视着那辆出租车转了个弯，匆匆离开，心中想，看见两个人沿街走来，在街角相遇，似乎能减缓心理的某种紧张。也许把一种性别看得与另外一种性别不同是一件费力的事情，而这两天我就是一直在这样看。它妨碍了头脑的和谐。现在看见两个人走在一起，钻进了一辆出租车，那种费力的事情也就告终，头脑的和谐也得到了恢复。我把头从窗口缩了回来，心中反思着，脑子当然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器官，有关它我们全然是一无所知，可是我们又是完全依赖于它。为什么我感到头脑中有隔离、有对立，就像由于明显的原因身体产生紧张一样呢？"头脑的和谐"是什么意思？我沉思着，因为显然头脑具有一种在任何时刻集中在任何一点上的非常巨大的力量，因而它似乎绝非只有一种单一的存在。例如，它能够将自身与街上的人们分离开来，而且当从上面的窗子俯瞰他们时，又能认为自己是与他们隔开的。或者，它又能与别的人同时进行思考，譬如说，在人群中等着某条新闻被读出来时，情况就是如此。它能够通过其父辈们或者母辈们往回进行思考，诚如我所言，进行写作的妇女就是通过她的母辈往回进行思考。而且，如果一个人是个女人的话，那么她就经常因为意识的一种突然分裂而感到惊讶，譬如说，当她走在怀特霍尔大街[1]上时，她本来是那种文明的自然的继承者，但此时却反而位于那种文明之外，与其间离而又对其持批评态度。显然，头脑总是在改变其焦点，并将世界置于不同的眼光之中。但是在这些心境中有几种，即使是在被自发地采用之时，也似乎不如其他的心境舒服。为了使自己继续怀有那些心境，人也就无意识地把某种事情隐瞒下来，而逐渐地，那种抑制也就成为一种费力的事情。不过也可能有某种心境，人能够继续处于那种心境而又无须

[1] 怀特霍尔（Whitehall），伦敦的一条街，英国主要政府机关所在地。

费力，这又是因为并不要求隐瞒任何事情。我从窗户边走了进来，心中想，这也许就是那些心境中的一个。因为当然，当我看见那两个人钻进出租车时，头脑的感觉就好像是在被分离开之后，又在一种自然的融合之中再次聚在一起。其明显的原因就是，两性之间进行合作是自然的事情。人们具有一种深刻的、如果说是非理性的本能，那本能赞成下述理论，即男人和女人的结合有助于造成最大的满足，造成最完美的幸福。不过看见那两个人钻进出租车，以及这景象所给我带来的满足，使我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在头脑里也存在着相当于身体上的两性的两种性别，而且是否头脑里的两性也需要结合起来，以便获得完全的满足和幸福？于是我继而外行地画出了一张灵魂的图案，这样一来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都有两种力量在统辖着，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在男人的头脑里，男人胜过女人，在女人的头脑里，女人胜过男人。正常而又舒适的存在状态，就是在这二者共同和谐地生活、从精神上进行合作之时。如果一个人是个男人，那么头脑中的那个女人的部分也仍然一定具有影响；而一个女人也一定和她头脑中的男人有着交流。柯勒律治[①]说，伟大的脑子是雌雄同体的，他这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只有在这种融合产生之时，头脑才能变得充分肥沃，并且使用其所有的功能。我想，也许一个纯男性的头脑不能进行创造，正如一个纯女性的头脑不能进行创造一样。但是最好暂时停下来，考察考察一两本书，从而检查一下，人们在谈到有男子气的女性以及反过来谈到有女子气的男性时，到底是什么意思。

柯勒律治说一个伟大的脑子是雌雄同体时，他的意思当然并不是说，那个脑子对女人怀有任何特别的同情，那个脑子从事于女人的事业或者专心致力于对女人进行阐释。也许与单性的脑子

① 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英国诗人、批评家。

相比，雌雄同体的脑子更不倾向于作出这些区别。也许他的意思是说，雌雄同体的脑子是能引起共鸣的、可渗透的，它能没有障碍地转达情感，它天生是具有创造性的、光辉绚丽的、未被分开的。事实上，作为雌雄同体的典型，也就是有男子气的女性的典型，人们又返回到莎士比亚的脑子，虽然若想说出莎士比亚对女人有何想法那是不可能的。如果说得到充分发展的头脑的一个表征就是，它并不是特别地或者分开地想到性别，假如果真如此的话，那么现在要达到这种状态也就比以往不知要困难多少。这儿我来到了那些在世作家的作品面前，并且停了下来，心中纳闷，不知这个事实是否就是长期以来令我困惑的某件事情的根源。没有一个时代能够像我们自己的时代这样令人恼火地具有性意识，大英博物馆里由男人写的有关女人的不可胜数的书就是一个证据。这无疑应归咎于妇女参政运动。它一定是在男人当中激起了一种要逞能的非同寻常的欲望，它一定使得他们要强调他们自己的性别及其特征，倘若没有受到挑战的话他们是不会费心去想这些事情的。如果一个人以前从未受到挑战，那么当他受到挑战时，哪怕只是几个头戴黑色女帽的女人的挑战，他也会相当过分地进行报复。这也许就解释了我记得是在这儿所发现的一些特征。我这样想着，同时又取下了由A先生所写的一本新小说，A先生正处在年轻有为之时，并且显然很是为书评家们所看好。我把书打开。再来看男人的作品确实令人愉快。看过女人的作品以后，就发现男人的作品是如此直截了当而且坦率。它显示出这样自由的思想、这样自由的人、这样的自信。在这种得到良好滋养、良好教育的自由的头脑面前，人们也意识到了身体上的健康，这个头脑从未受过挫折或者被反对过，而是自出生以来就享受着充分的自由，自由地向它所喜欢的不管什么方面去发展。所有这一切都是值得称道的。但是看过一两章以后，就觉得书上似

乎横着一条阴影。那是一条黑色的直杠，一个样子多少像字母“I”[1]的阴影。人们开始左右躲闪，以便能瞥见在它后面的风景。那究竟确实是一棵树还是一个女人在行走，我不太确定。人老是被召唤回去，去看那个字母“I”。人开始对“I”感到厌倦了。虽然这个“I”是一个最为体面的“I”，它诚实而且符合逻辑，像果核那么坚硬，而且由几个世纪的良好教养和良好饮食给琢磨得非常光泽。我是从心底里尊敬和赞赏那个“I”。但是——这儿我翻了一两页，寻找着某个未知之物，结果却发现，最糟糕的是，在字母“I”的阴影之中一切都像雾一般没有形状。那是不是一棵树？不，那是一个女人。但是……我注视着菲比走过海滩——菲比是她的名字，这时我想，她身体里一根骨头都没有。然后艾伦站了起来，而艾伦的影子立即把菲比的影子给涂抹掉了。这是因为艾伦有见解，而菲比则在他的洪水般的见解中被消灭了。然后我想，艾伦有激情；现在我一页页地飞快翻过去，感到紧要关头就要来了，而且也果然如此。那紧要关头就发生在阳光之下的海滩上。它是非常坦白地写了出来，非常有力地写了出来，最不雅的莫过于此了。但是……我的“但是”说得太多了。人不能老是说“但是”。我自我谴责道，人总得设法把句子说完才行。我要把那个句子说完吗？“但是——我厌倦了！”但是我又为什么厌倦呢？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字母“I”拥有的优势以及那种枯燥乏味，字母“I”就像一棵巨大的山毛榉一般，把那种枯燥乏味掷于它的阴影之下。那儿什么也不会生长。而在某种程度上又是由于某种更为朦胧的原因。在A先生的头脑里似乎有某种障碍物，有某种妨碍物，它把创作力的源泉给堵塞住了，把它送到狭窄的范围之内。想起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午餐会、香烟的烟灰、马恩岛猫、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全聚

---

① 字母“I”意为“我”。

在一团，似乎那种妨碍物在那儿是有可能的。当菲比走过海滩时，他不再压着嗓子吟哦着，“一滴晶莹的泪珠落了下来，落自门口的那株西番莲花”，而当艾伦走近时，她也不再回答道，“我的心像一只歌唱着的鸟，它的巢在一根被弄湿的嫩枝上”，那么他又能做些什么呢？既然是诚实得如同白昼，符合逻辑得如同太阳，因而只有一件事他能做。而且说句公道话，他确是把那件事做了又做（我说道，同时又翻了好几页过去），做了又做。我意识到那个忏悔的可怕性质，又补充道，这似乎多少有点儿乏味。莎士比亚的粗野不雅之处根除了人的头脑中的一千件别的事情，而且绝不乏味。但莎士比亚这样写是为了获得乐趣，而A先生则如同护士们所说，是故意这样写的。他是为了抗议而写。他以断言他本人的优越，来抗议女性的平等。他因而受到了阻碍，受到了抑制，并且具有自我意识，倘若莎士比亚也认识克拉夫小姐和戴维斯小姐的话，他或许也会如此。毫无疑问，倘若妇女运动开始于16世纪而并非19世纪的话，那么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就会与实际上的情况大为不同。

如果那个脑子有两个面的理论行得通的话，那么这就等于说，现在男子特点已经具有了自我意识——这就是说，现在男人只是用他脑子的男性的那一面进行写作。女人读那些书是个错误，因为这样她就必然是在寻找她将不会发现的某种东西。人们最未能找到的东西便是暗示的力量，我这样想着，同时手拿起批评家B先生的著作，非常仔细、非常尽责地读着他有关诗的艺术的评论。这些评论非常出色、非常敏锐而且博学，但是问题在于，他的感情不再传达了出来，他的头脑似乎分离进不同的房间之中，没有一个声音从一个房间被带进另外一个房间。这样一来，当人们把B先生的一个句子带进头脑时，那个句子便突然沉重地落在了地上——死去了；而当人们把柯勒律治的一个句子带进头脑时，那个句子便爆炸了，并诞生出各种各样的意思，而

这就是那惟一的一种人们能够说它具有了永生秘诀的文笔。但是不管其原因可能会是什么，那都是一个令人们不能不深感遗憾的事实。因为这意味着——现在我来到了高尔斯华绥先生[①] 和吉卜林先生[②] 的一排排书的面前——我们最伟大的在世作家的一些最为出色的作品不为人们所理会。不管一个女人尽可以做什么，她都不能在那些作品中找到批评家们向她保证一定有的那种永生的源泉。这不仅仅是因为那些作品称颂了男性的美德、强调了男性的价值并且描述了男人的世界，而且还是因为，渗透在这些书中的情感是女人所不可思议的。早在结尾以前人们就开始说，那情感来了，那情感已在聚集，那情感就要在人的头上爆发。那个画面将会落在老乔莱昂[③] 的头上，他将因为受到那个震动而死去，那位老教堂执事将会为他说上几句讣词，而泰晤士河上所有的天鹅将会同时突然唱起歌来。但是在这发生之前人们将会匆匆离开，并且躲在醋栗树丛中，因为那种对于男人来说是如此深刻、如此微妙、如此具有象征意义的情感，却令女人惊讶。吉卜林先生笔下的那些转过背去的军官们就是如此，还有他笔下的那些播下种子的播种人、那些单独工作的人们，以及那面旗子，无一不是如此——看见所有这些大写字母[④]，人们不由得脸红，就好像在偷听某种全都是男人的狂饮作乐时被人发觉了一般。其原因就是，不论是高尔斯华绥先生还是吉卜林先生，在他们身上都没有一点儿女性。这样一来，如果可以泛泛而论的话，那么他们的所有性质在女人看来似乎是粗糙而又不成熟的。他们

---

① 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67～1933），英国小说家和剧作家，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② 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③ 老乔莱昂（old Jolyon）是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三部曲中的人物。

④ 在原文中，“播种人”、“播种”、“人们”、“工作”、“旗子”各字的首字母均为大写字母。

欠缺暗示性的力量。而当一本书欠缺暗示性的力量时，那么不管它在脑子的表面打得多重，它都不能渗透到脑子里面去。

我把书拿出来，又看也不看便放回去，我就是以那种焦躁不安的心境开始拟想一个纯粹的、逞能的男子特点的未来时代，教授们的信件（例如沃尔特·罗利爵士[1] 的信件）似乎预示着那个时代的到来，而意大利的统治者们已使那个时代产生了。须知人在罗马，就几乎不能不被那种毫不缓和的男子气概的意识所感染，而且不管毫不缓和的男子气概对于国家会有什么价值，人们却可以就它对诗歌艺术的影响提出置疑。不管怎么说，据报载，在意大利人们对小说怀有某种忧虑。学者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其宗旨是"发展意大利的小说"。日前"出身高贵的人们，或者在金融界、实业界或者法西斯社团里的名人"聚集在一起，讨论了这个事宜，并且给"领袖"墨索里尼打了一份电报，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即"法西斯时代不久就会诞生出一个配得上这个时代的诗人"。我们都可以怀有那个虔诚的希望，不过诗歌是否能够用孵卵器给孵化出来却大可怀疑。诗歌应该有一个父亲，也应该有一个母亲。法西斯诗歌恐怕会是一个可怕的小小的流产胎儿，就像人们在乡镇博物馆里的玻璃瓶里看到的那样。据说，这样的畸胎从来也活不长；人们从未看见过那种奇才在田地里割草。一个身体有两个头并不能使人长命。

然而，如果人们急于责怪的话，那么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对所有这一切都难辞其咎。所有的唆使者和改革家都应负责任：当贝斯巴勒夫人对格兰维尔勋爵说谎时她就要负责任，当戴维斯小姐对格雷格先生说出真相时她就要负责任。那些带来一种性意识的状态的人都应受到责备，当我想在一本书上施展我的才能的时

① 沃尔特·罗利（Sir Walter Raleigh，1554? ~1618），英国探险家、作家，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后被处死，著有《世界史》、散文、诗歌等。

候，正是他们驱使我在书中寻找那个幸福的时代，那是戴维斯小姐和克拉夫小姐诞生以前的时代，那是作家平等地使用他脑子的两个面的时代。这样一来，人又必须返回到莎士比亚，因为莎士比亚是雌雄同体的；济慈、斯特恩[1]、柯珀[2]、兰姆、柯勒律治也是雌雄同体的。雪莱[3] 也是无性别的。密尔顿和本·琼森[4] 身上的男性稍微太多了一点儿，华兹华斯[5] 和托尔斯泰亦复如是。在我们的时代里，普鲁斯特完全是雌雄同体的，如果不是说他身上的女性稍微过多了一点儿的话。不过那种弱点太罕见了，值不得人们去抱怨，因为如果没有那样的某种混合的话，理智就似乎占据了优势，而头脑的其他才能也就会变硬，失去了创造力。然而，我聊以自慰的就是，我想也许这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局面。我曾许诺我要告诉你们我的思想转变过程，并且遵照我的许诺讲了不少话，但其中有不少话似乎已过时了；在我眼前如火焰般燃烧的东西，有不少将会令你们感到可疑，因为你们还没有到岁数。即使如此，我走过去来到书桌旁，拿起那张写着《妇女与小说》的纸，说道，这儿我要写的第一句话就是，任何一个从事写作的人，若是想到自己的性别那就是毁灭性的。对于一个不折不扣的男人或者女人来说，它是毁灭性的；人必须是具有女子气的男人或者具有男子气的女性。一个女人如果最低限度地强调任何不满，如果甚至公正地以任何事业作为口实，如果以任何方式有意识地以女人的身份来说话，那么对她来说，这就是毁灭性的。所谓“毁灭性的”决非比喻之辞，因为带着那种有意识的偏见而写出的任何东西都注定要死亡。它不再是得到了营养。尽管它可能

① 斯特恩（Laurence Sterne，1713－1768），英国小说家。
② 柯珀（William Cowper，1731－1800），英国诗人。
③ 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④ 本·琼森（Ben Jonson，1572～1637），英国剧作家、诗人、评论家。
⑤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诗人。

有那么一两天显得才华横溢而且具有影响、有力而精巧，它却一定会在夜幕降临时枯萎，它不能够在别人的头脑中成长。在头脑中首先须有女人和男人的某种合作，然后创造的艺术才能得以完成。男女之间必须完婚。如果我们要感觉到作家是在完全充分地把他的经历传达出来的话，那么我们的整个身心就一定要完全打开。一定要有自由和宁静的心境。不能让一个轮子吱吱作响，不能让一道光线若隐若现。窗帘一定要拉严。我想，一旦作家的经历写完，他一定要躺下来，让他的头脑在黑暗之中庆祝他的头脑的婚礼。他不可去看正在被做出的事情，也不可对其提出置疑。相反，他必须把玫瑰花瓣摘下来，或者注视着天鹅安详地沿河漂浮而去。而且我再次看见河水载走了那条船和那位本科生以及死叶子；我看见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一起穿过街道，心中想，那辆出租车把他们带走了，我听见远处传来伦敦的行人车辆的轰隆声，心中想，他们被水卷走，进入到那个巨大的洪流中去。

现在玛丽·贝顿住了口。她已经告诉了你们，她是如何得出了那个结论——那个平淡无奇的结论——即如果你要写小说或者诗歌的话，那就有必要一年有500英镑的收入和一间门上有锁的屋子。她已经尽力把导致她这样想的种种想法和印象袒露了出来。她已经要求你们随着她突然闯进一位教区执事的怀抱，在这儿吃午餐，在那儿吃正餐，在大英博物馆里画图画，从书架上取下书，朝窗外望去。当她在做着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们也一定是在观察着她的过失和弱点，并且决定这些事情对她的见解产生了什么影响。你们一直在反驳她，并且做出任何似乎有利于你们的增减。这就是一切，而且它也应该如此，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问题里，只有把许多错误放在一起才能得到真理。最后我将以我个人的名义预言将有两种批评，它们是太明显了，你们不会做不出这两种批评。

你们也许会说，有关两性之间甚至作为作家的相对而言的长处，我并没有表达出任何见解。那是我有意如此，因为，即使在

到了作出这样一种估价的时候——而此刻与就她们的才能作理论探讨相比，知道妇女有多少钱和多少个房间要重要得多——即使是到了此刻，我也并不相信，不论是头脑上还是性格上的天赋能够像糖或者黄油那样给称出重量，即使在剑桥大学也不行，虽说在剑桥人们精于把人分门别类、把帽子戴在他们的头上并把字母放在他们名字的后面。我认为，甚至你们将在惠特克[①]的《年鉴》中所发现的那个皇室表，也不能视为价值的最终顺序，而且也没有充分理由可以认为，最终在赴宴时一位巴思[②]爵士会走在一位精神病专家的后面。所有这一切使一个性别与另一个性别相斗、使一种性质与另一种性质相斗，所有这种自命为优越而中伤他人为低劣的行径，都属于人类生存中的私立学校的阶段，当时人们是分为"派别"的，而且有必要让一派打倒另外一派，而且走到讲台、从校长本人手里接过一个装潢华丽的罐子，也就极为重要。随着人们的成熟，他们也就不再相信派别或者校长或者装潢华丽的罐子。不管怎么说，就有关书籍而言，众所周知，若是把表示优点的标签贴上去而又使它不落下来是困难的。难道当代文学的评论不是判断困难的一个持久的例证吗？"这本伟大的书"，"这本毫无价值的书"，同一本书就有两种说法。赞美和非难同样没有意义。是的，尽管用估价来消遣令人愉快，它却是所有职业中最徒劳无益的，而且屈从于估价者们的判决是奴性最为十足的态度。只要写你要写的东西就行了，至于你写的东西能引起千百年的注意，还是只能引起几个小时的注意，谁也无法说出。但是为了尊重某位手里拿着银罐子的校长，或者某位袖子上挂着丈量用的棒的教授，而牺牲掉你的一根头发般的眼界，牺牲掉其少许色彩，

---

① 惠特克（Joseph Whitaker，1820～1895），英国出版家。《惠特克年鉴》（Whitaker's Almanack）于1868年出版。

② 巴思（Bath）是英格兰西南部一城市，以其温泉著称。

那就是最为可鄙的欺骗，相形之下，那些被说成是人类最大灾难的在财富与贞节上的牺牲，只不过像是被跳蚤咬了一口一般。

下面我想，你们可能会提出异议，认为在我说的话里我太强调物质事物的重要性了。即使为象征主义留下一个慷慨的余地，让一年500英镑的收入代表能沉思的力量，让门上的锁意味着能进行独立思考的力量，你们仍然可能说，思想应该超越这种事物，而且大诗人往往是穷人。那么就让我向你们引用你们自己的文学教授的话，有关什么造就出诗人来他知道得比我多。阿瑟·奎勒-库奇爵士[①] 写道：

> 近百年以来在诗歌上的伟大姓氏是什么？柯勒律治、华兹华斯、拜伦、雪莱、兰多、济慈、丁尼生、勃朗宁、阿诺德、莫里斯、罗塞蒂、斯温伯恩——我们可以止于此了。在这些人当中，除了济慈、勃朗宁、罗塞蒂之外都是大学生；而在那三个人当中，那位夭折了的、年轻有为时死去的济慈是惟一一位家境不甚优裕的。说起来好像很残忍，而且说起来也确是可悲，但铁的事实就是如此，即所谓诗的天才随便在什么地方都能发展，不论贫富都能发展，这种理论并不正确。事实上，在那12个人当中有9个人是大学生，这就意味着他们设法获得了接受英国所能给予的最好教育的财源。而在剩下的三个人当中，勃朗宁家境富裕也是铁的事实，而且我敢说，倘若他家境不富裕，他就不能得以写出《扫罗》和《指环与书》，正如倘若罗斯金[②] 的父亲

① 奎勒-库奇（Sir Arthur Quiller-Couch，1863～1944），英国诗人、小说家、选集编者，以编纂《牛津英国诗选》和《牛津歌谣集》著称。

② 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艺术评论家、社会改革家。

> 不是生意兴隆的话，罗斯金就不能得以写出《现代画家》一样。罗塞蒂有笔小小的不公开的收入，而且除此之外，他还卖画。现在只剩下济慈了，命运三女神之一阿特洛波斯在他年轻的时候就把他杀死了[1]，她同样在精神病院里把约翰·克莱尔[2]杀死了，而詹姆斯·汤姆森[3]则是用鸦片剂来麻醉失望而殒命。这些是可怕的事实，但我们要面对它们。对于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来说，不论它是什么样的耻辱，但不争的事实却是，由于我们国家的某种过错，今天穷诗人没有最起码的机会，而且200年来一直是如此。请相信我的话——我用了十年中的大量时间观察了大约320所小学——我们尽可以侈谈我们的民主，但是实际上，英国的穷孩子就像雅典奴隶的儿子一样没有机会得到智力上的自由，而只有那种自由才能产生出伟大的作品。

谁也不能把这一点说得更清楚了。“今天穷诗人没有最起码的机会，而且200年来一直是如此……英国的穷孩子就像雅典奴隶的儿子一样没有机会得到智力上的自由，而只有那种自由才能产生出伟大的作品。”诚哉斯言。智力上的自由依赖于物质上的事物。诗歌又依赖于智力上的自由。而女人又历来是贫穷的，不仅仅是200年来，而且是有史以来就穷。女人的智力上的自由比雅典奴隶的儿子还要少。因而，女人也就没有最起码的机会去写

---

① 济慈于1821年因肺病逝世，年仅25岁。

② 克莱尔（John Clare，1793－1864），英国诗人。1837年他被诊断患有精神病而送入精神病院，1841年逃脱，又再次被诊断患有精神病而送入精神病院，遂在精神病院度过余生，但被给予大量自由。

③ 汤姆森（James Thomson，1834～1882），英国诗人，以表现人的孤独和失望的诗篇《暗夜之城》而闻名。

诗。我之所以这样强调金钱和自己的一间屋，其原因也就在于此。然而，由于以往那些无人知晓的妇女们的辛劳工作——但愿我对她们的了解能多一些，也由于那两场战争——这是很奇怪的，即克里米亚战争①，它使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走出了客厅，还有欧战，它在大约60年以后替普通妇女打开了大门。由于上述原因，那些弊端才逐渐得到了改进。否则的话，今天晚上你们就不会来到这儿，而且你们要一年挣上500英镑的机会，虽然恐怕现在仍然是靠不住的，也就会极其微小了。

也许你们仍然会提出异议，说你为什么把妇女著书立说看得这样重要呢？因为据你所说，妇女著书立说就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也许会导致对自己姑母的谋杀②，几乎总会使人吃午饭迟到，而且可能使人与某些非常善良的人产生非常严重的争议。请容我承认，我的动机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私的。像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的英国女人一样，我喜欢看书——什么书都喜欢看。最近我的饮食变得有点儿单调乏味：历史书里战争太多，传记太着重于写大人物，我以为诗歌已展现出了一种贫瘠的倾向，而小说呢——不过我已充分地暴露出了我作为一名现代小说批评家的无能，所以我不再对小说发表意见。因而，我愿意请你们写各种各样的书，不论题目是多大多小都不要犹豫。不管用什么方法，我都希望你们能拥有足够的钱，好去旅行，去无所事事，去冥想世界的未来或者过去，去看书梦想，在街头巷尾徘徊，并且让思想的钓鱼线深深地沉入到河水中去。须知我绝非把你们限制在小说里。如果你们愿意让我高兴——还有成千上万像我这样的人——你们就可以写游记、历险记、研究著作和学术著作，写历史著作和传记、

① 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1853～1856年俄国与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王国之间的战争。

② 当然这是戏言，指前面所提到的，由于姑妈骑马坠落意外死亡，使她得到了每年500英镑收入的遗产。

批评、哲学以及科学著作。这样做，你们就一定会使小说的艺术获益匪浅。须知书有一种互相影响的方式。小说和诗歌以及哲学紧靠在一起就一定会好得多。除此之外，如果你们考虑一下以往的大人物的话，如萨福[①]、如紫式部[②]、如艾米莉·勃朗特，你们就会发现，她是一位继承者，又是一位创始者。而且她之所以得以存在，是因为妇女最终自然地拥有了写作的习惯，这样一来，即使就算是诗的序曲，你们的这种活动也会是非常珍贵的。

不过当我回过头来看这些笔记并且批评我本人在作这些笔记时的思路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动机并非全然是自私的。在这些评论和离题话中贯穿着一种信念——或者说是本能——认为好书是值得拥有的，而且好的作家，即使他们表现出了人的每一种堕落，也仍然是好人。这样一来，当我请你们写更多的书的时候，我是在敦促你们去做将有利于你们和整个世界的事情。不过怎样去证明这种本能或者信念是有道理的，我并不知道，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话，那么哲学术语也就倾向于靠不住。"现实"是什么意思？它似乎是某个非常漂移不定、非常不可靠的东西——时而可以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找到，时而可以在街道上的一小块报纸上找到，时而又是阳光下的一朵水仙花。它能使屋里的一群人快乐起来，并使不经意说出的一句话被人牢记。它使在星光下步行回家的人不知所措，并且使得静默的世界比说话的世界还要真实——然后它又出现在喧嚣的皮卡迪利大街[③]上的公共汽车里。有时它又似乎存在于离我们太远的形体里，使我们看不清那些形体是什么性质。可是不论它触到了什么，它都固

① 萨福（Sappho），古希腊女诗人，作品有抒情诗9卷，哀歌1卷，仅有残篇传世。

② 紫式部（Murasaki Shikibu，978？—1031？），日本平安时代女作家，宫中女官。主要作品是《源氏物语》54卷，为日本最早的长篇小说。

③ 皮卡迪利大街（Piccadilly），伦敦的一条大街，以其时髦的商店、俱乐部、旅馆和住宅著称。

定下来并且长久不便。这就是当白昼的外表被掷进树篱之中时所剩下来的东西，这就是逝去的岁月以及我们的爱恨所剩下来的东西。我认为，现在作家比其他人更有了在这种现实的面前生活的机会。把这个现实寻找出来、搜集起来并且传达给我们其他人，是作家的责任。至少这是我通过阅读《李尔王》、《爱玛》或者《追忆逝水年华》而推断出来的。因为阅读这些书，也就好像是在感官上做了一个奇特的用压下术除去白内障的手术，手术后人看得更深刻了，世界似乎被剥去了其遮盖物，生命力似乎更强烈了。与非现实不和的人是令人羡慕的，被不经意地或不在乎地做出的事情敲在头上的人是可怜的。所以当我请你们去挣钱和拥有自己的一间屋的时候，我是在请你们在现实的面前生活，那种现实会是一种充满生气的生活，不管人们能否把这种生活给传达出来。

我想就此停止，但是惯例的压力却注定每一个演讲必须以结论告终。而且你们也会同意，对妇女演讲所作出的结论应该有某种尤其令人激动、使人高尚之处。我应该恳求你们记住你们的责任，要更加高尚，更加注重精神生活，我应该提醒你们，有多少事情要依赖于你们，而且你们能对未来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我以为，这些激励可以由男性来作出而绝对不会错，他们一定会、而且也确实已用远非我能拥有的更为流利的口才把这些话说出来了。当我在我自己的头脑里搜寻的时候，我并没有发现那些高尚的情感，即成为伙伴、成为与他人平等的人，以及给世界以影响使之达到更高的目标。我发现自己是在简短地、平淡无奇地讲着话，因为保持自我比任何别的事情都要更为重要。倘若我知道如何把话说得崇高的话，我就会说，不要梦想去影响别人。要想到事物的自身。

而且当我随便翻阅报纸、小说和传记的时候，我也再次联想到，当一个女人对女人讲话的时候，她应该胸中怀有某种非常令人不快的事情。女人对女人是不客气的。女人不喜欢女人。女人——不过难道你们对这两个字还没有听得烦死了？我可以向你们

保证，我是烦死了。这样一来咱们就会持一致的看法，认为一篇由女人向女人宣读的论文应该以某种尤其令人不快的话作结。

但是又怎么说呢？我能想到什么呢？真相是，我经常是喜欢女人的。我喜欢她们的不从习俗。我喜欢她们的完整。我喜欢她们的默默无闻。我喜欢——不过我不能这样说下去。那儿的那个碗橱——你们说那里面只放着干净的餐巾，可是如果阿奇博尔德·博德金爵士躲在餐巾当中又怎么办呢？那么就让我用严厉些的口吻来说话。在前文中，我已经把人类的警告和非难充分地向你们传达了吗？我已经告诉你们，奥斯卡·勃朗宁先生对你们评价甚低。我已经指出，拿破仑曾经对你们有什么看法，以及现在墨索里尼的看法。然后，说不定你们当中有人有志于小说创作，我也出于对你们有利而把那位批评家的忠告抄录了出来，它涉及的是要勇敢地承认你们性别的种种局限。我提到了 X 教授，并且清楚地介绍了他的说法，即妇女在智力、道德和身体上都逊男人一筹。我已把我并未寻找而不期而遇的一切都传达了出来，这儿是最后一个警告——这是约翰·蓝登·戴维斯先生①的警告。约翰·蓝登·戴维斯先生警告妇女，“等到不再想要小孩子的时候，女人也就完全不需要了”。我希望你们记下这句话。

我能怎样进一步鼓励你们忙于人生呢？我会说，女孩子们，请你们注意，因为结论正在开始作出，在我看来，你们无知得可耻。你们从未做出过一个有任何重要性的发现。你们从未震撼过一个帝国或者领军打仗。莎士比亚的戏剧并不是你们写的，你们也从未让一个野蛮的民族得到文明的教化。你们怎样为自己开脱呢？你们完全可以指着地球上的街道、广场和树林，那儿云集着黑色的、白色的、棕色的居民，他们都在忙于往来通行、经营企业和求爱，并且说，我们手头有别的工作。倘若没有我们的工

① 约翰·蓝登·戴维斯著，《妇女简史》。——原注

作，那些大海上就不会有船在航行，那些肥沃的土地就会成为沙漠。我们生育了那16亿2300万人，养育他们，给他们洗澡，教育他们，也许一直到他们六七岁的时候——根据统计数字，这些是当前在世上生存的人，而且就算其中有人得到了帮助，养育这些人总归要需要时间。

你们所说的是实话——我不会否认这一点。不过同时容我提醒你们，自1866年以来，在英格兰至少已有两所女子学院存在了，在1880年以后，法律允许已婚妇女拥有其自己的财产，而且于1919年——那是整整九年以前——她被给予了选举权？容我提醒你们，现在大多数职业已经向你们敞开大门将近有十年了？当你们考虑到，有这么些巨大的特权，而且她们享有这些特权有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事实上，此刻一定有大约2000名妇女能够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一年挣500多英镑，那么你们就会同意，有关缺少机会、培训、鼓励、闲暇和金钱的借口也就不再说得通。除此之外，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塞顿太太的孩子太多了。当然，你们必须生孩子，但却要两三个地生，不要10个12个地生，他们作如是说。

这样一来，由于你们手头上有时间，脑子里有一些书本知识——那另外一种知识你们拥有的已足够了，我猜你们被送去上大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不受教育——因而毫无疑问，你们应该开始你们的非常漫长、非常劳碌而且极其朦胧的生涯的另外一个阶段。有成千支钢笔乐于提出建议，认为你们应该做什么以及你们将会拥有什么效果。我承认，我本人的建议有点儿怪诞，因而，我宁可以小说的形式把我的建议提出来。

在这篇论文中我曾告诉你们，莎士比亚有一个妹妹，不过不要在西德尼·李爵士[①] 所写的莎士比亚传记里去找她。她年纪轻

---

① 李（Sir Sidney Lee，1859～1926），英国作家、出版家。其《莎士比亚传》（Life of William Shakespeare）问世于1898年。

轻就死了——唉，她一个字也没有写过。她埋葬在现在停公共汽车的地方，就在“大象与城堡”酒馆的对面。现在我相信，这位从未写出过一个字并且埋在十字路口上的诗人现在还活着。她活在你们身上，活在今天晚上不在这儿的许多别的女人的身上，因为她们正在洗碟子，送孩子们上床睡觉。但她是活着的，因为伟大的诗人不会死去，而是持续着其存在，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以肉体形式走在我们当中的机会。我认为，这个机会正在到来，给予她这么一个机会是在你们的力量之内。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们再活上一个世纪左右——我说的是共有的生活，也就是真正的生活，而并非我们作为个人所过的那种小小的单独生活——并且我们当中每个人每年都有500英镑的收入，有我们自己的房间；如果我们有自由的习惯和精确地写出我们的想法的勇气；如果我们稍微从普通的会客室里逃脱出来并且不总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观察人，而是以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来观察人，还要观察天空、树木以及任何可能的东西本身；如果我们超越弥尔顿的幽灵来进行观看，因为哪一个人也不应该把视野给遮蔽起来；如果我们面对这个事实——因为它是一个事实，即没有什么可以墨守的权威，而是我们得独自行走，我们的关系是与这个现实世界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与男人和女人的世界的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个机会就会到来，而且莎士比亚的妹妹这位死去的诗人，也就会活在她经常放弃的那个躯体上。她就会像她的哥哥在她之前所做的那样，从她那些无人知晓的前辈们的生命中汲取出她的生命，从面得以诞生。我们不能期望，她会在没有那种准备、没有我们所作出的那种努力、没有当她再生时她定会发现有可能活着和写诗那种决心的情况下到来，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不过我坚持认为，如果我们为她而努力，她就会到来，而且这样的努力，即使是在贫穷和默默无闻之中，也是值得的。